

前 言

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写到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四十四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也就是本书的三个章节。

（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这七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前三年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后四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二）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一般都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前十年称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后十年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关于后十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出现了更大的曲折，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一场灾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我们把这二十年合为一个时期，称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并作为一章，意在突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前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十年。这十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后到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阶段虽然在1957年6月开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总体上讲，成绩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执行了党的八大路线和八大规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二阶段，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到1960年秋。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方针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由于尚未觉悟到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在庐山会议后期纠“左”又中断了，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局面。从总体上讲，这个阶段工作上的失误是主要的，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第三阶段，从1960年冬到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再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这个阶段，全党上下，同心同德，大兴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群策群力，艰苦奋斗，纠正错误，渡过难关。虽然纠正错误是限定在坚持“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雷池之内，纠正得很不彻底。但是，这个阶段，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总的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在恢复经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等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第四阶段，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到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的发出。这个阶段，由于坚持“八字方针”，由于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防止政治斗争对经济工作的冲击，扭转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向一个新

的台阶迈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的试验。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并未得到根本纠正，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并且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逐渐引向党内的高层，步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后十年，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我们以1971年粉碎林彪集团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分前后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二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的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走过了十五年的重要历程。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改革开放十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集中到一句话，就是“上了三个大台阶”，即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第一步战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全同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提前实现小康。

改革开放十五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阶段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第二阶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1981、1982、1983这三年主要在农村进行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沿海经济特区的飞速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三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第四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四大初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勾画了基本的框架，描绘了宏伟的蓝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93）

第一章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10——1956·8）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即着手组织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筹备工作。

从1949年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经过3个月的积极筹备，新政协筹备会于9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确定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共662人。在人民政协的宏大阵容中，不但包括了全国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有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包括以张治中为首的前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全部代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30日闭幕。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指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强调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能够战胜国内外反动派，而且能够在胜利之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中国人民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大文献。

《共同纲领》包括序言、七章六十条。“序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共同纲领》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任务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力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机关，仍是一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

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为政协会议闭幕期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全国领导机关。会议选出 180 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会议选举出 63 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林伯渠、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 56 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从 1840 年以来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会后，毛泽东率领政协全体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执锹铲土，以表示对先烈的崇敬之情。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2 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就职。会议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系统，详见下页表），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首都 30 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典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晚间，首都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随后，全国已解放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统治的完全崩溃，从而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因而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表明，只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能够把那里的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日益强盛的新中国已在东方崛起，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其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丹麦、越南、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有25个国家承认新中国，其中有17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两国有关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并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离莫斯科回国。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政策；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远东和平；对于促进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是对中国很重要的国际支持。

二、全国大陆的统一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南、西南、华东一些地方及沿海岛屿尚未解放。因此，首先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建国初期所面临的迫切军事任务。当时盘踞在上述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约有70余万人，主要是白崇禧集团、胡宗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3页。

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的部队。他们企图长期控制中南、西南地区，妄想等待国际风云变幻，乘机卷土重来。

为了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包围迂回”的作战方针，二野、四野及一野一部于1949年9月开始了向中南、西南的大进军。10月14日解放广州，歼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

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和余汉谋集团残部共17万余人。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2月27日解放成都，歼敌胡宗南集团等部队共40余万人。

与二、四野战军进军同时，第三野战军10月17日解放厦门。一野一兵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到1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在大陆的正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海作战。4月16日至5月1日解放海南岛。5月19日，解放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7月8日、15日，先后解放嵎泗列岛和北鹿山岛等岛屿。到1950年6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30万人，使整个解放战争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到807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

1950年10月17日，开始向西藏进军，藏军第9代本（团）主官桑格旺堆起义。10月19日，歼灭反动藏军约10个代本（团）5700人，解放了通往西藏的战略重镇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进而促使西藏地方当局接受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51年4月下旬，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经过谈判，5月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进驻西藏首府拉萨，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空前未有的统一。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溃败时，留下了一批土匪和特务人员，人民解放军经过1949年至1951年的长期剿匪作战，取得了歼灭匪特240多万人的重大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国民党的匪特武装，使社会秩序得以基本安定，政权得以巩固，生产和社会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各个新解放的地区，首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在由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先由各地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村称农民代表会议），作为当时人民参政的特殊形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与人民政府同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在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立协商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以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实施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进行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从军事管制制度过渡到正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适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在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领

导层人员中，以中共党员为主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基层有效地行使权力的政权。

为了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会议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曾山、粟裕、马寅初、颜惠庆为副主席；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彭德怀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席；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为副主席；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马明芳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邓主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赵寿山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潘自力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杨勇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聂荣臻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贾拓夫为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陈锡联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随后，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次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通则》规定：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市、县人民政府力行使政权的机关，受主管大行政区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在不设大行政区委员会的地区，省人民政府受政务院直接领导；市、县人民政府则分别受所隶属的省、市领导。

1950年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6次会议上，任命：黄敬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程子华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为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为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惠浴宇为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阎红彦为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李大章为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为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廖志高为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任命：于毅夫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康生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为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张苏为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

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任命：杨秀峰为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为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管文蔚为苏南人民公署主任，黄岩为皖北人民公署主任，魏明为皖南人民公署主任。至此，全国省一级人民政权基本建立起来了。

1950年12月8日，政务院第62次会议通过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具体规定了区、乡人民政权的性质、职能和组织机构。

到 1951 年 10 月，即建国两周年时，全国当时的行政区划中 28 个省（未包括台湾省）、8 个相当于省的行署、154 个市和 2068 个县中，有 27 个省、8 个行署、146 个市和 2038 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 17 个省、69 个市、186 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了省、市、县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以及人民政府的委员。到 1952 年底，所有的省、市、县、区、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已分别增至 19 个省、85 个市和 436 个县，绝大部分乡的人民政府委员会已由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这就充分发挥了人民参政的积极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为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人民革命成果，进一步开展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为进一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

三、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国营经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条件。

全国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 2/3 左右。其中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垄断了钢产量的 90%，电力的 67%、煤炭的 33%，有色金属和石油的 100%，水泥的 45%，硫酸的 80%，织布机的 60%，纱锭的 38%，糖的 90%，控制了全国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及 44% 的轮船吨位，另外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企业有一千多家，主要属于美、英垄断集团。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解放城市军管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首先在吉林、辽宁、内蒙古解放区内没收了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接着，在华北、华中已解放的城市中进行。1948 年至 1949 年初，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

党在总结东北和华北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和对待国民党政权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它们的机构，而是“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过来，尽快地恢复生产，然后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194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详细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和政策。到 1949 年底，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有：金融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两局一库”（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业储金局；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 2400 多家，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工矿方面：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兵工及军事后勤系统、四大家族等办的工矿企

业 2858 个，职工 129 万人。交通运输方面：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原中国、中央航主公司在香港的 12 架飞机，也由职工起义，回归祖国。商业方面：复兴、富华、中国茶业、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1951 年 1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针对某些私营企业中还隐藏着一些官僚资本股产的情况，制定了《关于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2 月 4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将原国民政府及其国家经济机关、前敌国政府及其侨民和国民党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在私营企业或公营企业中的股份及财产，均收归人民政府所有。没收的全部财产，据有关方面事后按资产原值估算，约合人民币 150 亿元。至此，没收官僚资本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而接管的官僚资本的金融、工矿企业、构成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

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千多家企业，没有采取没收的办法，而是由我国政府加以监督和管制。这些企业，由于失去了特权，大部处于瘫痪状态。它们或申请歇业，或放弃经营，或要求转让给我国政府以抵偿其在中国的债务，或由我国政府作价收购。1950 年 12 月 16 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英国也追随其后，几次劫夺中国在海外的船只、飞机等财产。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2 月 28 日、29 日，政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及其登记办法。

1951 年 4 月征用了英国在华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及其在上海的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制造厂，征用了美国在上海的三个石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油料，接管了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并代管其全部财产。到 1952 年底，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侵略势力。这些企业转入我国手中后，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我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在没收的官僚资本，收购、征购、征用和没收的外资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再加上解放区原有的公营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集中了国民经济中绝大部分近代化的大工业，控制了社会生产力最先进最强大的部分，这就不仅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而且树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据 1949 年统计，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的固定资产的 80.7%；在全国大型工业的总产值中，占到 41.3%；在全国生产资料生产（包括手工业）中，占 48%；在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电力 58%，原煤 68%，生铁 92%，钢 97%，机器及机器零件 48%，水泥 68%，棉纱 49%。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还控制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现代化运输工具，以及绝大部分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许多重要的物资和工业原料，如粮食、棉花、煤炭、钢

材、铜、钨、锡等，均为国营经济所控制。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为新中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国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各种经济成份（包括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等个体经济）沿着新民主主义轨道，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协调稳步地发展；并为调整社会需求，稳定市场物价，打击投机资本，发展工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保证。

四、稳定市场物价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

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这是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项迫切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其原因：首先，从历史方面说，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以致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新中国从国民党政府接收下来的是全面崩溃了的经济。以1949年与1936年相比，工业产值下降了50%，农业产值约下降25%。据统计，从抗战前1937年6月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的12年间，国民政府的通货增发达到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36807亿倍。新中国成立时，不得不承受这个破烂摊子。其次，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军费开支随之增大。第三，救济经费支出骤增，加重了财政困难。

1949年城市中有400万失业人口，农村有4000万灾民需要救济；加之新解放地区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老解放区公务人员一起，共达900万人，致使行政经费骤增，加之医治战争创伤，重点恢复和重建经济，恢复铁路交通，都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支持。这样一来，1949年国家财政收支出现了2/3的赤字。国家为了解决急需，不得不增加人民币的发行量。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人民币发行量增加约100倍，年高达270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资本家、不法商人，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进行破坏和捣乱，从而加重了经济的困难程度，在全国范围内，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物价涨风，向国营经济发动了猖狂地进攻。

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展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1949年7月，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亲赴上海进行调查，探讨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途径。同年8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解放区稳定人民生活的方针、实施方案和步骤。并决定调动全国的财力、物力，稳定城乡市场，控制物价；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制止投机资本家哄抬物价。为此，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加强金融管理，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人民政府公布了金、银、

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概况》，载《三年来新中国经济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64页。

外币管理办法，严禁金、银、外币计价流通和私下交易，统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在上海，举行了大规模地“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依法逮捕惩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 200 多人。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采取了同样措施，惩办了一批金、银、外币投机分子，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对私营金融机构也加强了管理，坚决取缔了经营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机构，对于一般私营钱庄则在禁止其投机活动的同时，引导其将资金投向生产事业。纳入了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

第二，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系统，控制主要商品，并通过集中抛售商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上海解放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米、棉、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为此，国家必须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等主要商品。正如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多少，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掌握了大批粮食，控制了煤炭供应量的 70%，棉纱的 30%，棉布的 50%，食盐的 60%。以此作为打击投机势力，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当 1949 年 11 月 25 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等，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党和人民政府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使连续近两个月的物价涨风，迅速回落下来。自此，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同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执行了正确的扶持政策，以维持其正常经营和生产。

第三，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国家公布了工商业登记办法，普遍实行工商业登记。未经核准，不得擅自开业。人民政府严格管理市场交易，建立交易所，主要物资集中交易，并运用政权力量，实行市场价格管理，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破坏。还把大宗物资采购工作，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对投机分子予以处理，对正当工商业则予以保护。

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是人民政府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与不法资本家争夺市场的领导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和运用经济力量这两种办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刹住了物价涨风，从而稳定了物价，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并为其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中共中央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1950 年 2 月 13 日至 25 日，在陈云主持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 月 3 日，政务院通过了这个决定。会议确定了 1950 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做目前必须做的事。为此，会议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物资供求、现金出纳的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

统一财经工作，实际上是确立国家统一后的财经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

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第二，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度。为了把分散的物资集中起来，有计划地调节国内供求，控制市场和组织对外贸易，政务院决定，国营贸易机构的业务范围的规定、物资的调度均由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 and 指挥，非经中央贸易部批准，其他部门和下级贸易部门均不得改变中央贸易部的业务计划。国家还决定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库存物资，均由中央财委统一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国家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及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这一决定，立即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从 1950 年 3 月以后，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如以 3 月份的全国批发物价总指数为 100，12 月下降到 85.4，1951 年 12 月为 92.4，1952 年 12 月为 92.6。国家财政收支也趋于平衡，1950 年第一季度财政赤字占支出总数的 43%，第二季度下降为 40%，第三季度下降为 9.8%，第四季度只占支出总数的 6.4%。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稳定市场物价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这是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一胜利，从经济上巩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创造了重要前提；这一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赏，叹为“奇迹”。它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一成就，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五、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经济恢复时期党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在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的情况下，为了全面分析建国以来，特别是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以来的形势，总结工作，明确任务，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 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央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讨论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国内政治、党的组织及整风等问题。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对该报告的说明即《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这也就是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

题的报告》。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在会上发了言，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总结。

毛泽东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形势，明确了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应做好的工作，并详细地阐述了在这些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获得这三个条件，保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任务的实现，必须做好八项工作。这就是：（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提高国家机构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精简行政机构。（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五）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夫业者就业。（六）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七）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报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为创造三个条件，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各阶级的动态，阐明了党关于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少数敌人的战略策略方针。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议批评了在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粗暴对待知识分子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急于进行改革的“左”的情绪，指出这是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错误思想，阐述了在各项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的方针和政策。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初期党中央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的报告、讲话和会议的决议为三年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方向和步骤前进的，并胜利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六，抗美援朝战争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国人民力争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面临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对长期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划分受降范围，商定两国军队以北纬 38 度线（以下简称三八线）为界分别进驻。1948 年 8 月 15 日，南朝鲜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同年 9 月 9 日，朝鲜北方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此，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苏军、美军分别于 1948 年 12 月和 1949 年 6 月撤走后，南北朝鲜继续处于分裂和对立状态，北南两方的军事斗争不断发展。1950 年 6 月 25 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

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介入。6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进行武装干涉，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杜鲁门还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 7 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领土台湾。

6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同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

美帝国主义为使其侵略行径合法化，于 7 月 7 日，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武装干涉朝鲜的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7 月 8 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南朝鲜军队外，先后参加“联合国军”的还有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 16 个国家的军队，大举出兵侵略朝鲜。

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局势极为关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 25 万兵力，组成东北边防军。

8 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 90% 的地区，将美军和李承晚的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9 月中旬，战局急剧逆转。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主要补给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惨重，被迫实行战略退却。9 月 29 日，美、李军进抵“三八”线。9 月 30 日，我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出严正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 月 1 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金日成请求中国尽快派兵援助。

10 月 3 日，周恩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国悍然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如果任何中国人进入朝鲜，他们将肯定地面临灾难”，“简直是自投死路”。10 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入侵朝鲜北部，侵占朝鲜临时首都平壤，并向中朝边境迅速推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我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多次举行会议，讨论援助朝鲜的问题。认为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不仅“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并认为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是可能的，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和增调的第50军、66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随后，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指定彭德怀、邓华为中共志愿军委员会书记、副书记。

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分别在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今集安），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在国内迅速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10月26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全力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亿万人民用努力生产、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制订爱国公约、踊跃参军参干、拥军优属等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西部的云山、温井地区和东线黄草岭一带进行了入朝后第一次战役，歼灭李承晚军队1.5万余人。11月25日至12月24日在新兴洞、德川、军隅里等地再次痛击敌军，歼敌3.6万余人，收复平壤、云山等重镇和三八线以北绝大部分地区。接着，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6月10日，在三七线与三八线之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反击战，共歼敌17.9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总计，在五次战役中，共歼灭美李军23万余人，其中美军11万余人，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47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57页。

美国的失败，加剧了其国内矛盾的激化。1951年4月14日，杜鲁门将麦克阿瑟撤职。“联合国军”总司令一职，由李奇微接替。在此情况下，双方接受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的谈判停火的建议。1951年7月1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10月8日移至开城附近的板门店）举行第一次谈判。自此，朝鲜战争转入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阶段。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交织进行。

1951年8月18日、9月29日，“联合国军”先后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秋季攻势”。与此同时，还凭借其空中优势，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运输线进行大规模的日夜狂轰滥炸的“绞杀战”。美帝国主义还于1952年初，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激起了中朝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克拉克上台后，为挽回败局和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1952年10月又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首先夺取朝中方面金化以北的上甘岭阵地，然后拿下五圣山逼我后撤。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打击敌人。胜利地进行了上甘岭战役，歼敌2.7万人，使敌人以军事进攻来结束朝鲜战争的幻想化为泡影。

为配合停战谈判斗争与在谈判后控制有利阵地，朝中部队从1953年5月13日到7月27日，进行了三次反击作战，歼敌12.3万人，收复240平方公里的土地。遂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于7月27日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代表签订《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样，历时3年零32天的朝鲜战争随之结束。

在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中，中朝人民军队共歼敌109.3万人，其中美军39.7万人，李承晚军队66.7万人，其他帮凶军2.9万人。击落击伤敌机1.2万余架，击沉击伤敌舰257艘。美国虽然动用了其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很大一部分海军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英勇战斗，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表现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在战斗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模范，其中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罗盛教等烈士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和敬仰。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保卫了我国的安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推动了土地改革、镇

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加速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使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经历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取得了现代化战争作战的军事经验，这对于我国建设起一支现代化的海陆空军和其他兵种有着重大的意义。

七、土地制度的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 1950 年冬到 1953 年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约有 2.64 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新区一解放，党就领导人民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从斗争中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培养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为开展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后，政务院还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些法令和文件是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文献。

为了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决定，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第一批，1950 年冬至 1951 年春，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约 1.28 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二批，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在华南、西南约 1.1 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三批，1952 年冬至 1953 年春，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 3000 万农业人口中进行。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是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并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作了某些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对富农采取中立的政策。

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到采取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这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况所决定的。毛泽东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第一，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第二，减少由于土改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党和政府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可以更好地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各地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并认为土改中不动富农可以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收到孤立敌人，团结多数的目的；可堵死损害中农利益的一个重要漏洞；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尽快恢复和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 137—138 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20—123 页。

相抵计算”。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正如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主要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了，富农的政治态度也有了改变，能够争取富农中立，从而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必要的。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党对富农政策的实际转变。

土地改革运动，是按照充分发动群众，建立起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划清农村阶级阵线；进行说理斗争，没收、分配土地，整顿加强农村政权，这样几个基本步骤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地主阶级绝不会自动地放弃阶级剥削、封建特权和交出土地财产，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反抗。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到 1953 年春，全国大陆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顺利完成。全国有 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 700 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此，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年全国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加 28%，1952 年比 1949 年增加 40%，超过抗战前最高年产量的 9%。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已成为农村政权的坚强支柱，并促进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激发起农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的高涨。为此，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9 月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引导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克服分散经营中的困难，迅速发展农业生产。

在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坚决镇压反革命，在《共同纲领》中已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提出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规定了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和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是非常重要的。

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后，还残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武装土匪约有 200 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60 万人，各种特务分子 60 万人。他们不甘于失败，猖狂地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反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 337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 297—298 页。

革命气焰极为嚣张。他们到处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实现反革命复辟。从1950年春至同年秋，全国被惨杀的革命干部、积极分子等约有4万余人。这一年內，反革命分子在广西组织52次暴乱，袭击乡、区人民政府247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7人，更令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准备在1950年国庆大典时，企图炮击天安门检阅台，杀害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真是猖狂至极！

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在一时间和一些地方曾经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管制的管制。毛泽东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坚持稳、准、狠的方针。“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他又指出：“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群众发动相结合的工作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由于政策正确，宣传深入，广大群众迅速发动起来。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达到高潮。反革命分子陷入人民布下的天罗地网。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标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形成全国性高潮以后，为了巩固成绩，避免可能发生的偏差，1951年5月，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总结了镇反经验，确定了今后斗争任务，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议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实行更加完备具体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强调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其后，又清查了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着重打击了反动会道门和水上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到1953年春，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

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杀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70余万人，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历史上从未平息过的匪患，纯洁了国家机关，使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使抗美援朝有了安全可靠的后方，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为我国即将开始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人民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中逐步进行了民

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0年12月 1951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页、45页。

主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建立民主管理制度，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建国初期一部重要的法律。党和人民政府广泛宣传和坚决贯彻《婚姻法》，有效地推进了我国妇女的解放事业。辽开展了坚决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社会现象的斗争，从而使中国的社会面貌、道德风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更加巩固，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有了必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八、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

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到1950年9月底基本完成。

调整工商业，范围很广，包括调整国营与私营、国营与国营、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乡、地区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等。但最突出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

（一）调整公私关系，即调整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当时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49年全国私营工业有12.3万户，职工164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总数的54.6%，生产总值6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2%。私营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产品产量中，棉纱占46%，棉布占40%，面粉、卷烟、火柴均占80%。私营商业，1950年全国共有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商品销售额，批发占全国76%，零售占83.5%。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调整公私关系上，工业方面，主国是通过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把私营工业生产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轨道上来，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逐步消灭其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在商业方面，主要是调整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给以出路。在经营范围上，适当扩大商品品种，在价格政策上，在照顾产、供、销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适当调整价格比例，使私商有利可图。在调整税负上，农业税由原来占农业总收入的17%降至13%，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依率计征，盐税减半征收。同时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予以扶持。调整公私关系是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核心。

（二）调整劳资关系。在处理工人与资本家关系方面，必须遵循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发展生产、用协商方法解决劳资间的纠纷问题三条原则。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改进经营起了很大作用。

（三）调整产销关系。主要是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具体指导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使私营企业逐步走上计划生产的轨道。

薄一波：《若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01—102页。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版人民币和收回1949年通行的旧版人民币。折合比率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此处指折换成的新币。

全国工商业经过合理调整后，市场情况明显好转。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具体规定了私营企业应得的盈余比例为15—30%。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国营工商业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发展道路。全国国营工业总产值，1951年比1949年增长148.8%，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比1950年增长133.2%。私营工业总产值，1951年比1949年增长48.2%，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比1950年增长36.6%。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等8大城市统计，1951年底与同年初比较，私营工商业户增加27%，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比1950年增长135%。实行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增加：1950年占29%，1951年占43%，1952年占56%，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据全国10个城市税收统计：1950年下半年与同年初相比，私营工业税增加90%，私营商业税增加80%。到1951年7月，全国失业工人由166万人降至45万人，就业人数增加了221万人。这说明整个经济状况正在迅速好转起来。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加市场商品供应、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发展资本主义的贪婪欲望，也随之进一步暴露出来。这时，由于主要的工农业产品大部分已被国营经济所掌握，并且对私营工商业的活动已有法令限制，他们已不可能公开地在市场上和国营经济争夺领导地位，于是便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恶手段，向国营经济进攻，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而且对抗美援朝战争造成直接的危害。例如，他们为志愿军制造的镐头等工具质量低劣，不能使用；食品罐头、饼干，甚至根本不能食用。更有甚者，他们用脏烂棉花做成的救急包，致使一些志愿军伤员造成残废，甚至死亡。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甚至用金钱、美女等卑鄙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使其蜕化变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由于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55亿元（折合新币155万元）被开除党籍、依法判处死刑，就是蜕化变质的典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严肃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1年10月至1952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及时地向全党作出了深入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决定，并首先部署了在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年11月—1952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3页。

12月29日，全国政协发出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952年毛泽东在团拜会《元旦祝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军、民内部开展起来。

“三反”运动到1952年3月，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11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并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实行“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方针和政策，对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行为的人员，分别情况作了不同处理。到1952年夏，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初战。“三反”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决定的。“三反”运动中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虽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很快作了纠正。总的说来，“‘三反’斗争……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这样分类处理的结果，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一、二类占70%左右，他们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占25%左右，是争取的对象。这两类加起来，人民政府就团结争取了工商业户的95%左右，将打击面缩小到占5%的第四、五类。而在这5%左右中，又着重打击只占1%左右的第五类。这样就团结了工商界的绝大多数，孤立、打击了极少数。从而，使“五反”运动健康地、深入顺利地进行。经过半年多时间，到1952年6月底，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五反”运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五反”运动后，党和人民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继续发展。

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改革

建国后，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这支队伍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工农群众中培养选拔，这要有一个过程；二是对现有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提高，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

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有爱国心和革命性。他们中的多数人由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0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7页。

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思想上不同程度的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些同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又是不相适应的。他们恳切地希望党和政府给他们以教育和帮助，以便尽快地提高思想觉悟，转变立场，报效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从北京、天津教育界开始。1951年9月下旬，京津两市22所高等学校3000多名教师，开展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周恩来总理向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于是，从1952年2月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店员、工人和守法的资本家进行揭发检举；对违法的资本家交待政策，要他们走坦白立功之路；集中力量围攻大的不法资本家，还逮捕法办了一批反动的不法资本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1952年3月，转入定案处理阶段。3月5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了处理违法户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以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明确规定了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5月9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中央指出：按中央规定好好结束这场斗争，“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子龙的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详细分析了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他希望知识分子要努力“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立即开始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一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53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98页。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50页。

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至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10月开始，逐步由北京扩大到全国整个知识界，并形成高潮。

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方法，一方面，主要是组织各界知识分子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影响，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向组织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并检举所知的反革命分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解决立场问题；另一方面，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实践，例如参加土地改革等运动。通过斗争实践，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运动的进行基本上是健康的。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

整个运动，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运动中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粗暴，因而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

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还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改革。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所属的一切学校，接办和处理了一批原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手中夺回了教育主权。之后，在全国各级学校中，逐步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把旧学校改造成为为工农兵服务的阵地。

1949年1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会上拟订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实施计划和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及各地师范学校的意见。会议还决定逐步改革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师资及出版教育刊物等问题。

1950年6月和9月，先后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高教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课程改革、领导关系等问题草案，后经政务院批准实行。

1951年10月，公布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了切合我国实际的新学制，确立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类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并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人民教育制度，这对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新中国各类建设人才有重大意义。

1952年党和人民政府又进行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改变了旧中国在学校设置、分布和系科分工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脱离实际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次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经过整顿，使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消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十、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就人民生活的初步改善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截止1952年底，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有3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加上解放前已完成土

改的老区，全国共有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工农业产值达到827亿元，比1949年增加77.5%。其中工业343亿元，增加145%；农业484亿元，增加48.5%（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135万吨，原煤6649万吨，发电量73亿度，棉纱362万件，棉布38.3亿米，粮食3278亿斤，棉花2607万担。以解放前最高年产量为100，则钢为146.2，原煤为1074，发电量为121.9，棉纱为147.8，棉布为137.4，粮食为117.9，棉花153.6。即是说，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

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轻工业的产值为73.6%，重工业为26.4%；1952年则轻工业为64.5%，重工业为35.5%。

交通运输方面，特别是铁路的恢复和修建，进展迅速。1952年全国通车里程共达2.45万公里。三年来修复和加强旧线路1万多公里，新建线路1320公里。来睦线（来宾至睦南关）、成渝线、天兰线通车，天成线正在修建。其他公路运输、民用航空、内河航运、邮电事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

水利工程方面，三年来对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水灾较严重的河流，开始进行全流域的治理；对黄河、长江等部分灾情威胁较重的地段，采取了临时性的有效防御措施。

国内贸易方面，1952年社会产品零售总额为276.8亿元，比1949年的140.5亿元增长97%。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都有很大发展。从贸易的公私比重看，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零售方面，1950年为15%，1952年上升为43%；批发方面，1950年为23.8%，1952年上升为63.2%。

对外贸易也有发展，进出口总值增加。商品构成发生变化：进口主要是生产资料。出口主要是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工业品所占的比例由1950年的9.3%上升到1952年的17.9%。

国家财政收支逐年好转。1950年控制住了货币的大量发行，收支接近平衡；1951年财政收入为133.1亿元，财政总支出122.5亿元，收支相抵，结余10.6亿元，首次出现略有结余的可喜局面；1952年结余为7.7亿元。虽然是在进行抗美援朝、加强国防军费支出增加的情况下，但是国家仍将财政总支出中的50%以上用于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全国小学由34.7万所，小学生由2439万人，增加到52.7万所，5110万人；普通中学及中等专业学校由5216所，学生126.8万人，增加到6008所，312.6万人；高等院校学生由11.7万人，增加到19.1万人。其中毕业研究生由107人，增加到627人。各级学校专任教师由93.5万人，增加到159.1万人。业余教育、职工培训、扫盲工作也都普遍展开。其他各项事业，如卫生保健、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电影广播及群众文化事业也都有较大发展。

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逐年提高。三年中，全国职工人数由809万人增加到1603万人。

1951年3月起，实施《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生老病死残实行劳动保险。1952年7月，全国各级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度，同年10月及1953年春，各私立学校的教职工和高校

学生也开始实行。1952年7月5日，进行建国后第一次工资改革。经此改革，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70%。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140元（按1957年价格计算），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同1949年相比，实际收入平均每户一般增加30%以上。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

总之，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工农业生产不论在规模上、速度上、主要产品产量上，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不仅显示了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并且为其后大规模有计划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适应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所以在这个时期提出来，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依靠力量。到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对强大的因素。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党从总结经验中，肯定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大和提高，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第三，这时党已经积累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是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第四，从国际环境来看，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上进行侵略威胁，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资本主义国家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当时，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在我国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经济制度，无疑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之一。

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明确。其后，在《共同纲领》中又作了相应的规定。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同年底，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同年9月24日，在发布庆祝国庆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这条总路线。

1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更为完整的阐述。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这个提纲时，作了这样的概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这条总路线力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接受，并被载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简言之，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它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和辩证关系：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化”与“改”，都规定了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且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当时估计要 15 年时间，加上三年恢复时期，共计 18 年时间。这是较为稳妥的估计。

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个体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总路线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保证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总路线提出以后，迅速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行动纲领。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从 1953 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体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是一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进行的。从 1951 年开始着手。

1952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 1953 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

1953 年 4 月，中央批准下达 1953 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中央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后历时 4 年，经过 5 次修改，到 1954 年 9 月基本定案。1955 年 3 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同年 7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编制“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并对各种比例关系进行深入地探讨。正如陈云所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台比例的”。

“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

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1954 年 6 月 30 日）》，《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28 页。

国家为着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凡一个建设单位，不论其为新建、改建或恢复，它的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小于限额者，即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

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建设规模是宏大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在五年内，各项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占支出总数的55.8%。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计划由1952年的827.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1249.9亿元，增长51.1%，平均每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计划由1952年的270.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35.6亿元，增长98.3%，平均每年增长14.7%。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7.8%；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4%。到1957年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达到：钢412万吨，煤11298.5万吨，发电量159亿度（千瓦小时）。五年内，农业及副业总产值增长23.3%，平均每年增长4.3%；粮食、棉花每年增长速度为3.3%和4.6%，到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856.2亿斤，棉花达到32.7亿斤，分别比1952年增长17.6%和25.4%。五年内，要求交通运输、邮电、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等事业都要有相应的发展；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生产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业人数共增加420万人，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33%，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将提高近一倍；并且要求积极进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一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贯彻总路线，实施“一五”计划，解决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的最重要物资的供求矛盾，1953年10月和1954年7月，国家先后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保障城乡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稳定市场物价，促进三大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一五”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共同愿望。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工业化战线上的主力军，以积极生产的实际行动投身于国家建设。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全国总工会积极响应，号召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高潮。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先后8次改进工具，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都是一级品。

1954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发扬王崇伦的工作精神，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1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第36页、27页。

广大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工业建设。在工业建设中，特别是在矿区建设上，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成为工业建设中的生力军。

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无条件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

正是由于全国亿万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辛勤劳动，努力生产，积极工作，使得农业生产丰收，工业建设战线捷报频传。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相继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此铁路纵贯南北，“天堑变通途”。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同内地的联系。总之，“一五”期间，单是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开工或竣工。建设速度之快，为我国史无前例。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在扎扎实实地不断前进！

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稳步前进

中国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是紧接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就陆续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广泛开展起来。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总结了历史上开展互助合作的经验，制定了建国后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文件下发试行。翌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于3月公布。决议分析了土改后农民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合作两个积极性，指出：要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倡“组织起来”，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决议强调各级领导机关要走在群众的前头，要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这就是，首先建立临时互助组，然后有步骤地发展成常年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这一方针，既要反对否认已经出现的互助合作的各种过渡形式的右倾消极态度；也要反对过早地否定或限制参加农业合作社农民的私有财产的“左”倾急躁态度。中央文件指出：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必须绝对遵守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正确领导方法，反对强迫命令。国家在财力、物力以及技术上要大力帮助互助组和合作社。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农业互助合作才能健康地发展。

在决议精神的指导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较快地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主要是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两种形式，1953年春，互助合作运动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急躁冒进倾向：有的侵犯中农利益；有的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

1953年4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立即予以纠正，坚持决议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使冒进倾向基本上得到纠正。

1953年10月、11月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

总结了建国以来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讨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通过。在会前及会议期间，毛泽东与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农村各项工作的“纲”。在上述讲话和文件中，进一步阐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即引导个体农民经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指明了初级社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日益成为党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提出了对社员加强教育的问题。决议对初级社发展的数量作了规划，要求从1953年冬至1954年秋，由1.4万多个发展到3.85万个，即增加一倍半；到1957年发展到60万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0%。

在决议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指导下，农业合作化获得很大发展，全国农村普遍出现办初级社的热潮。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1953年曾经一度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偏差很快得到纠正。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密切注意和具体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强调在农村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衡量互助合作搞得好坏的标志。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中央文件的规划。1954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10万个，超过1953年12月决议规定的到1954年秋发展指标的1.6倍。在此形势下，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4年4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10月，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两次修订发展规划，决定在1955年春耕前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

从1954年秋到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猛增到67万个，一些地区再次出现急躁冒进倾向，强迫命令、甚至威胁恐吓农民的情况屡屡发生。由于此种情况的出现，再加上1954年粮食统购中多购了70亿斤这方面的原因，不少地区出现党和农民关系紧张的局面。有些省出现了非正常的宰杀牲畜、砍伐林木、生产遭到破坏这类应当引起严重注意的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及时地采取措施，扭转形势，决定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15省、中书记会议上，对合作化运动作出“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的估计，提出“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即所谓“停、缩、发”的方针。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指后解放的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经过初步整顿，全国农业合作社缩减了两万个，由67万个减至65万个，并全部巩固下来。

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个体手工业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其中独立手工业者800万人，农民兼手工业者1200万人。农民所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60—70%来自手工业。1952年统计，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约占13%，加上农民的手工业副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手工制造业和修理业担负着力大工业和农业服务、满足城乡居民生活需要、培养熟练工人，解决人员就业等多方面任务，特种工艺制造业还是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赚取外汇的重要方面。

195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指出，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一样，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对于他们也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引导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积极开展互助合作，由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将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同年11月20日至12月17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建国4年来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和经验，提出了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组织形式：即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要求各地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反对要求过高过急，贪大贪多，盲目发展；也反对放任自流，停步不前。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会议计划在1954年内，使参加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手工业劳动者发展到90余万人，生产总值增加10亿元以上。

195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报告的指示》，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员增加到113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2.7倍。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达4.1万个，比1953年增加了8倍多。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采取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工业中，主要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主要是经销、代销。“五反”运动后，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门，大部分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字调查组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总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情况和经验。随后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调查报告进行了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把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同年9月，政务院正式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积极而又稳妥的进行。10月，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对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步骤等作了详细的阐述。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毛泽东的谈话和李维汉的报告，以及党的具体方针政策，在消除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顾虑，减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压力，产生了相当大的作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页。

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8页。

用。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从 1954 年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了较大的进展。并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企业由 1953 年的 1036 户增加到 1954 年的 1746 户，1955 年又增加到 3193 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 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进行投资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以 1950 年为 100，公私合营工业 1955 年为 314，即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 158，仅增长半倍多。这就充分显示出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实行公私合营，形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

1954 年 12 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合营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1955 年京、津、沪等市一部分行业先后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四、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中国应实行的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经过建国后三年的努力，为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准备了条件。为了加强各项政治建设，加强人民政府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适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结束由全国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52 年 12 月 24 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扩大的第 43 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会议一致赞同和热烈拥护中共中央的建议。1953 年 1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筹备召开全国人大事宜。2 月 1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选举法草案说明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之后，全国开展了普选工作。

与此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954 年 6 月 14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 30 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这部宪法草案的性质、优点、原则、起草方法，作了概括的说明。指出：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的优点：一是总结了经验，二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宪法的原则是人民民主原则，贯串在整个宪法之中。起草的方法是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它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意和拥护。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明确而正确的道路，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讨论。9 月 9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34 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又进行了讨论修正，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1954 年 9 月 15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代表 1210 人。会议的任务是：（一）制定宪法；（二）制定几个重

要的法律；（三）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四）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各项工作的缺点，并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经过热烈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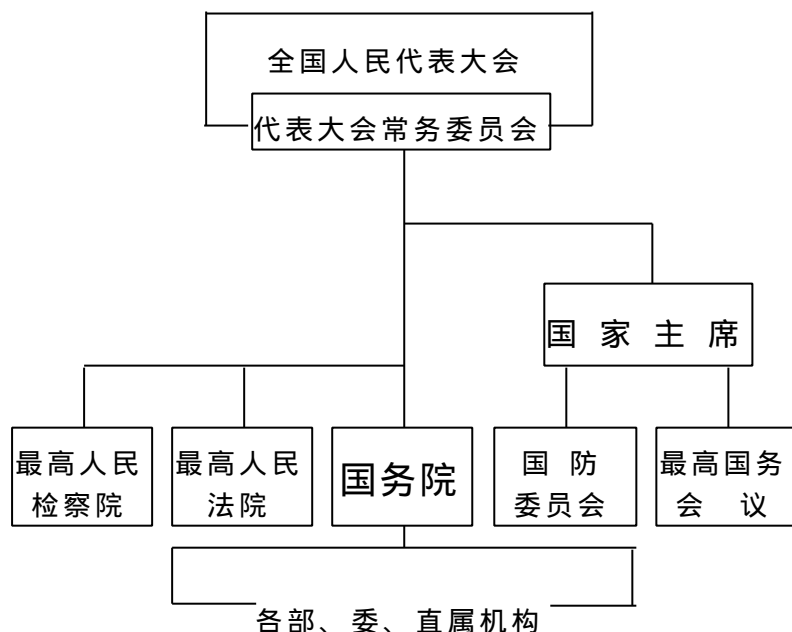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重要法律，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

大会根据宪法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丹增嘉措、赛福鼎等13人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大会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的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大会还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通过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入选的决定。大会于9月28日胜利闭幕。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制定和通过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内容包括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五部分，计四章106条。这部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为新中国诞生而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

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确立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总之，这部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记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胜利成果，指明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宪法规定的我国国家机构，如下表：



这个机构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唯一国家立法机关，常务委员会为其常设机关。常务委员会和国家主席结合行使国家元首职权。国家主席并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国务会议为议事机构，由国家主席召集，所议事项，由主席提交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由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陈叔通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章伯钧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明确指出：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

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需要存在。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人民，并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国内外重大事项和重要人士安排进行协商，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鲍尔汉等 15 人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常务委员 65 人。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组织，它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并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符合宪法规定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

五、加强党的建设和团结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团结，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组织自身的建设。1950 年，针对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党内一部分人中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1951 年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党员条件问题，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对党员要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对每一个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和登记，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和不够条件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这次整党，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到 1954 年春基本结束。经过整党整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划清了党员与非党员群众的界限，先锋队与阶级的界限，并在总数为 650 万党员中共有约 41 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从而纯洁了党的队伍，保证了党员的质量。

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分别于 1952 年底和 1953 年初从东北和华东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有一个产生和发展过程，党中央对他们的阴谋活动的察觉和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是在 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以及这两次会议前后暴露出来的。

1953 年 6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重点是统一全党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检查和纠正财经工作中离开总路线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但是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认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企图扭转会议的方向，有意将 1953 年以来财经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夸大为犯了路线错误，发动对中财委和财政部负责同志的过火斗争，制

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布流言，污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威信，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央领导核心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说什么“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把他自己吹嘘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

同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讨论关于组织工作的任务、培养建设干部、精简机构等问题。高、饶却认为又是一个机会。于是饶漱石极力活动，擅自发动对中央组织部安子文的无理斗争，以达到他们“讨安代刘”的目的。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坚决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

1953年12月，依照前例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高岗出面反对。并私下活动，由他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还要求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高岗的这种阴谋活动，引起了邓小平、陈云的警觉，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篡党夺权的阴谋再次败露。

12月2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了同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严厉警告和批评。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实现，他还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全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与会同志一致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革命警惕。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批准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决定在1954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团结的重大意义。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指出，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全党干部必须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威信、妨碍中央统一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七届四中全会后，为了进一步查清高、饶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并教育和挽救他们，1954年2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总结和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高、饶反党篡权的阴

谋罪行，并且总结了从高、饶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

两个座谈会后，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确凿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改悔，于1954年8月17日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和作了《结论》，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高、饶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彭真、林伯渠、张闻天等，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

粉碎高、饶反党活动对于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内必须光明磊落地随时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以像高、饶那样玩弄阴谋。第二，必须开展反对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斗争，必须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不断地开展对于剥削阶级思想的批评。“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不要向党伸手要官。如果硬要伸手，就必然会身败名裂。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牢牢记住的”。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民主，反对个人专权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要同压制党内民主和个人专权的习气作斗争。第四，必须掌握党内阴谋反党分子活动的特点和手法，及早识别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反党面目，防止高、饶一类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第五，必须正确区分高、饶一类的野心家、阴谋家和受高、饶的影响、欺骗而犯错误的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实行一看二帮的积极态度。毛泽东指出：高岗、饶漱石是坏人，应该坚持打倒，但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对高、饶的问题，“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总之，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党中央处理高、饶问题是稳妥的和慎重的，着重从思想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反对高岗、饶漱石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巩固了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党风党纪的教育，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22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24—325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8页。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258页。

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外交工作的成就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政府总理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坚持的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为着发展同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印度政府的赞同。1954年4月29日，将这些原则正式写入中印会谈公报，并载入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缅甸。6月28日，在周恩来和尼赫鲁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重申在处理各国之间关系时应按照：（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月29日，在周恩来和吴努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两国总理同意关于中国和印度所协议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博得了国际舆论的极高评价。并已成为世界上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给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是美国政府并未认真履行停战协定，不仅未从南朝鲜撤退军队，而且于8月8日同大韩民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此作为美国长期赖在南朝鲜的依据。同时，美国的舰队继续游戈于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还插手印度支那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活动，是同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

1954年4月由于苏联的推动，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从4月27日到6月15日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上，朝鲜、中国和苏联代表团提出：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6个月内撤出朝鲜；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朝鲜的合理主张。周恩来在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强烈谴责了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老挝、柬埔寨。尽管美国政府代表团也极力阻挠，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于7月21日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使持续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于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

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美国坚持奉行敌视和侵略中国的政策。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以此条约使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合法化，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2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蒋条约。宣告美蒋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5国总理发起，共有29个国家政府首脑计340名代表参加的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故又称万隆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亚非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会议。周恩来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及与会各国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为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作出重大贡献。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宣言》中提出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中印、中缅在1954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亦即亚非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同时还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导致中美两国1955年8月开始的大使级会谈。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同国际上的联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充分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我国的国际声誉日益提高，朋友越来越多，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到1958年8月，与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已经达到31个国家。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积极成果。

七、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建国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三次较大的斗争。这就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及胡风事件。

电影《武训传》是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而创作的一部传记片。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影片于1950年12月在上海、北京、天津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

讨论和批判这部影片，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抨击了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严厉地批评了对武训的赞扬。社论一发表,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并发表批判文章,掀起了一个对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由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联合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篇小说《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实际上为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对武训的批判作了总结。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毛泽东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次讨论采取政治批判运动形式是不适当的。对武训本人历史的调查,也带有相当大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

从1954年10月起,又开始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首先是从批判《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开始的。“五四”以来,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虽然在学术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却影响了一批学者。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就是其中的一位。俞平伯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对版本的考证、作者及其身世的研究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但是由于受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错误,并有广泛的影响。他忽视和否认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和反封建的精神。

解放后,俞平伯虽然力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来研究《红楼梦》,并取得一定成绩,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发表文章,批评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他们的文章曾经受到压制。文章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本来学术领域中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批评,包括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的批评,都应视作正常的事情。如何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是文学艺术领域的问题,应当由学术界通过自由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得到解决。毛泽东看了李、蓝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后,把问题提到同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和是否“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高度,在更大规模上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一方面,对李、蓝的文章给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对“阻拦‘小人物’”的“大人物”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号召对俞平伯、同时对胡适的唯心论展开批判。毛泽东的信,引起了党内和学术界很大震动。

10月底至12月上旬,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联席会议,批判俞平伯和《文艺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为此作了检讨。俞平伯也被迫于1955年2月作出“初步检讨”。学术批判实际上发展成为政治围攻,混淆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伤害了俞平伯和其他一些同志,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

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觉悟。为此，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指示》指出，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还指出，清除各个学术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而这种批评和讨论的态度，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而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方法应该是自由讨论的，而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应当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自由和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学术上犯了错误的人，不一定要写检讨文章。在进行思想批判和学术批评讨论时，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了思想批判的深入和发展，并由文艺界迅速地扩大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胡适思想批判全面展开。据统计，到1955年3月，全国省、市以上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共约在200篇以上。把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及其在各个学术领域中的表现初步揭露出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批判。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总的说是成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场战斗，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帮助一大批学者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清思想界限，开始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很难做到深入的学术探讨和评论上的客观、公允与全面，对胡适也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进步作用，及其在学术领域中的贡献缺乏应有的评价和肯定，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在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从1955年初开始，开展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是一位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对左翼文艺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历史上他同一些共产党员文艺作家有过争论。他对文艺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长达30万言的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用很大的篇幅反驳了对他的批评，同时对党的文艺领导工作提出了措词尖锐的批评。在《报告》中，他还提出了自己对文艺领导工作进行改革的意见。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向党中央提出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自己不同意的批评进行反批评，完全是正当的。但是，胡风的行动和意见却遭到误解，被认为是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斗争。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决定公开发表胡风向中央递交的报告中有理论争论和改进文

艺领导的建议两部分（发表时改名为《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交文艺界讨论。中共中央要求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作为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2月，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全面的批判。于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声势浩大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猛烈展开。

对胡风的批判，直至1955年5月以前，还只是限于理论批判范围。更为严重的是5月以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为对所谓胡风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所谓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以没有经过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问胡风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作家）当作“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来斗争的作法，完全混淆了敌我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胡风等一大批人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酿成了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大冤案，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直到1980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平反。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6月18日，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对胡风冤案从政治、历史、文艺思想等方面予以彻底平反。

胡风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这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既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向和原则，注意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和纠正，又要十分注意严格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学术问题，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采取平等的自由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明辨是非，提高认识，要防止简单粗暴、无限上纲、采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对学术理论范畴争论的复杂的认识问题，应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双百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决不能操之过急，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轻率地作出结论，以利于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八、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1955年夏季，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总的来说，在这场争论以前，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的。之后，由于对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尖锐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猛烈地加快了。

1955年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提出计划，要求到1956年春季，农业合作社从经过整顿后保留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个计划。可是毛泽东仍然认为发展的数字太少。他约见邓子恢，提出要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现有的65万个的基础上翻一番，即达到130万个。邓子恢坚持政治局会议批准的发展100万个，即翻半番的主张。邓子恢认为：从1954年秋的10万个社到1955年春的65万个社，发展已经很快，存在问题很多，现有合作社的巩固任务还很繁重，要打好基础，基础搞扎实了，优越性显示出来，对今后实现合作化关系极大；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与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考

考虑到全国各地不平衡状况，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需要逐步提高，要求不能过快过急。实践证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则认为：合作化大发展的形势已经到来，坚决主张加快发展速度和扩大发展规模。他还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对合作化不积极，合作化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纠“左”，而是反右。因此，随后毛泽东在党内发动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其后不久，召开了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都是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它对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论述是正确的，对我国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关系的分析等也有深刻的见解。但是，由于报告的主旨在于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右倾”，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方针，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这样，就把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一类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扩大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农村基层党支部，各地党组织纷纷检查“保守”，反对“右倾”，对合作化运动重新部署，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认为这场辩论的中心是合作社“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是关于“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富农反抗的阶级斗争”。从而，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正常的意见分歧上纲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先例。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成为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肯定“大发展”的方针和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气氛下，从中央到地方滋长了“左”的情绪。同时由于各级党委层层加码加温，合作化运动发展大大超出了毛泽东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确定的发展部署，形成了一轰而起的局面。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持编选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其中有些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论述。但是序言和有些按语，不但对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给予更尖锐的批评，而且认为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中“还是右倾保守思想”

在“作怪”。还把1955年上半年农村的纠“左”情况说成是“乌烟瘴气，阴霾满天”，甚至把党内这场争论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决战相联系，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六中全会后的3个月内，即到1956年1月，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即达到全国总农户的80.3%，基本上实现初级合作化；到5月份，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的初级社，全国即有一半的农户加入高级社；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原来预计用18年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仅用了7年时间，提前11年完成了。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发展的推动下，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也在迅速掀起。到1955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组）已发展到6.8万多个，社员220万人，约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的29%。

1955年12月21日至28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检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1956—1957两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任务。

1956年1月，中央批转了《关于第五次全国手工业合作会议报告》，指示各地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1956年春，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手工业合作化高潮，手工业者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都组织起来。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达到600多万人，占全部手工业者的91.7%，其总产值达117亿元，占当年手工业总产值的93%，基本上实现了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浪潮，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

1955年秋，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全行业合营的新情况，整个行业几十家、几百家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如上海市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等8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合营。北京市的面粉厂、机电厂和棉布店也都实行了全行业合营。天津市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店。

鉴于上述情况，李维汉在研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这些新情况和新经验之后，于10月中旬，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方针的建议。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

10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邀集出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们，就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举行座谈。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希望工商界人士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下决心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为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周恩来、陈云也在座谈会上讲了话。随后，全国工商联学习了毛泽东的讲话，并听取了陈云、陈毅的报告。发表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为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贡献力量。并在工商界组织了广泛的传达和学习。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陈云作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并且决定：“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台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台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成为我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城市。1月末，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武汉等全国所有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数的99%、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2%、资金的93.3%，实现了公私合营。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表明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从而使这些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单个企业台营的公私共有变为完全由国家支配，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国家能够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对企业实行经济改革。而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只表现在一定时期取得相应的定息。第二，工人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资方从业人员变为企业的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能再以资本家的身份来行使职权。第三，由于定息制的实行，使资本家所有权和资本家经营权（或企业管理权）相分离，从而根本改变了原来资本所有权的性质。资本家已不能决定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原来占有的资本已不能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工人的劳动已不再是为资本家创造利润，而是同国营企业职工一样，除以按劳分配的原则领取自己应得的部分外，就是为社会主义创造财富。资本家根据核定的资方股额领取的年息为5厘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原有股金的多少，而同企业的盈亏不再发生关系。一旦定息取消，这些企业就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了。

截止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共为24亿元，年息5厘，每年付定息1.2亿元，从1956年1月1日算起，共付10年，计12亿元；付给资本家的高薪8.5亿元；连同从1953年至1955年“四马分肥”（指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按所得税、福利费、公积金、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进行分配）阶段，支付股息13亿元，国家共支付33.5亿元。

我国三大改造的成功，使我国的经济制度和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主要的所有制形式，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三大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尽管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存在“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毕竟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从 1953 年开始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进展顺利，到 1957 年超额完成了。

基本建设方面：五年内，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550 亿元，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 493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 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588.47 亿元。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的投资占 88.8%，轻工业的投资占 11.2%。五年内，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达 1 万多个，其中限额以上工矿建设项目 921 个，比原计划增加 227 个。其中大部分已建成并投入生产。我国过去所没有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仪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填补了我国工业中的空白，增强了基础工业的实力，开始改变了我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地质勘探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已探明的煤矿储量约 544 亿吨，铁矿储量约 56 亿吨。这些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工业生产方面：由于新建企业一批批地投产，尤其是原有企业生产潜力的发挥，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1957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52 年增长 128.3%，平均每年递增 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25.4%；消费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 12.8%。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由 1952 年的 5.2%，提高到 1957 年的 9.5%。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加强了。在工农业生产总产值中，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43% 提高到 1957 年的 56.7%。我国主要重工业产品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钢 31%，电力 21%，煤 14%，石油 27%，机器制造 31%，水泥 18%。我国的钢产量，1957 年达到 53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69%，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5.8 倍。原煤产量达到 1.3 亿吨，比 1952 年增长 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2.1 倍。发电量达到 193.4 亿度，比 1952 年增长 16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3.2 倍。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起，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得到改进。工业技术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957 年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到 17.5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 2 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达到 1019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 66%。基本建设的技术力量有了迅速的增长。“一五”期间工业生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801 页。

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农业生产方面：1957年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

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超过“一五”计划原定指标，棉花总产量达到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猪、中、羊肉的产量达到398.5万吨，比1952年增长17.7%。五年内，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1810万亩。水利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建成大型水库13座，其中主要有河北的官厅水库，安徽的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五年内，造林面积达到21102万亩，提前完成了造林计划。

交通运输邮电方面：到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900公里，比1952年增长22%。新建铁路33条，恢复铁路3条，修复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共约1万公里。主要铁路干线宝（鸡）成（都）、鹰（潭）厦（门）、黎（塘）湛（江）、集（宁）二（连浩特）等铁路都先后建成通车。武汉长江大桥也提前建成，于1957年10月15日通车。公路方面，到1957年底，通车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通车。五年内，内河通航里程增加52%，航空线路长度增加1倍，增辟了国际航线。邮电业务量，1957年比1952年增长72%，1952年全国大约只有59%的乡通邮路，到1957年底通邮的乡已达99%。

商业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1957年比1952年增长71.3%。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粮食和其他几种主要商品，实行统购统销，保证了工业生产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全国物价基本稳定，给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进出口贸易总额，1957年比1952年增长62%。在进口贸易额中，生产资料占93%。随着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工矿产品在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18%，上升到1957年的28%。

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一五”期间，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高等学校，1957年已发展到229所，五年内共招生56.3万人，毕业生26.9万人；1957年在校学生数44.1万人，比1952年增长1.3倍。中等专业学校，五年中共招生111.9万人，毕业生84.2万人；1957年在校学生数77.8万人，比1952年增长22.3%。普通中学，五年共招生874.9万人，毕业生43.05万人；1957年在校学生数为628.1万人，比1952年增加1.5倍。小学，五年共招生8800万人，毕业生1852万人；1957年在校学生数为6427.9万人，比1952年增长25.7%。

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加2倍多。特别是自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订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后，我国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如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等，在这一时期，从无到有，开始创办，为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准备了条件。

五年中，出版、广播、电影、戏剧等文化艺术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共摄制故事片126部，科教片121部，美术片35部。其中有27部影片、16名电影工作者，先后在8次国际电影节中获奖。五年中，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很大发展，爱国卫生运动取得显著成绩，医疗预防网迅速扩大，1957年已达到县县有医院。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五”期间，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有了提高。1957同1952年相比，全国消费基金增长36.8%，按人口平均计算增长25.3%。到1957年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1957年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职工的年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205元，比1952年提高38.5%。五年内，国家为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达到103亿元。国家投资新建的职工住宅面积，累计达9454万平方米。农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1957年全国农民收入比1952年增加将近30%。五年中，农业税的征收额一直稳定在1953年的水平上，使农民负担相对地减轻。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支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15.4%，到1957年下降到9.6%。同时在工业产品价格基本未变动的条件下，国家适当地提高了苦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以1952年为100，1957年全国农产品采购价为122.4。“一五”期间，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多增加收入100多亿元，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更加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更加紧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其原因：第一是因为建设规模宏伟，国家的建设资金不足，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益；第二是由于技术力量和经验缺乏，因而要求要把有效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首先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第三是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特别是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都是技术复杂、投资较大、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项目。建设这些项目是全国的需要，非一省一地力所能及，必须由中央及其有关部门集中统一管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在：计划体制上，统一计划工作的领导。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中共中央要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建立计划委员会。这样，就逐步形成由国家计委、中央各部计划司、各省市自治区和县级计委、地方各级计划处（科）、企业单位计划科（股）所组成的自上而下的计划机构体系。各级计委在业务上同时受上级计划机关及国家计委的指导。国家实行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与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从而加强了经济工作中的直接计划管理工作。

财政体制上，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奠定了中央集权型的财政体制的基础。实行绝大部分财政归中央，“统收统支”。一年后，改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即由中央、大行政区、省（市、自治区）三级财政。大区撤销后，改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县（市）三级财政。由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但绝大部分资金集中在中央。这种财政体制，侧重于集中统一，又保持一定的分散性和灵活性，从而能够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从“一五”计划时期实际执行的结果看，中央支配的财力约占75%，地方支配的财力约占25%。

工业管理体制上，1954年前，除华东地区外，基本由各大行政区管理。大区撤销后，主要工业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形成以“条条”为

主的企业管理体制。到 1957 年，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从 1953 年的 2800 多个增加到 9300 多个，其产值占中央和地方管理工业的 49%。与这种企业管理体制相适应，实行由中央统一分配生产资料的物资管理体制。从 1950 年起，国家对煤炭、钢材、木材、水泥、机床等 8 种主要物资实行计划供应。“一五”期间，统配物资由 112 种增至 231 种，部管物资由 115 种增至 301 种。

商业流通体制上，建国以后，首先从上到下建立起国营和供销合作社的商业体系。国营商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各专业公司对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实行物资大调拨和资金大回笼。

1953 年改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国家从 1953 年起，根据不同商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分别采取了统购统销、派购、议购等不同购销形式。对外贸易，始终实行国家统制政策，进出口业务均由国家所设外贸公司负责。

劳动工资体制上，首先，国家对人力、物力统一调配。

1953 年 11 月 24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为妥善的、合理的解决干部问题，规定了统一调配，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一五”期间，国家还逐步扩大统一分配范围，从大专毕业生到中专、技校毕业生，到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和工人，都陆续实行统一分配。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原私营企业的职工也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由国家统一安排。这样一来，自行就业、自谋出路完全被统一分配所代替。这就形成了统包统配和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的劳动体制。工资管理上，建国初期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

1954 年后，着手实行全国工资制度的统一。

1956 年国务院颁布了工资改革方案，规定工资一律按货币单位计算。并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标准、定级、升级等，均按全国统一规定执行。

这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当时物资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对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主要技术管理干部，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家包揽过多、统得过死，不利于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弊端在“一五”计划末期已开始显露出来。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1956.9——1976.10）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1956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标志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了，中国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同时，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有把握在1956年提前完成。

在国际上，1956年是多事之年。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报告对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观点。在国内问题上，报告强调恢复和加强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在24日深夜，赫鲁晓夫向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突出地批判了个人崇拜，指责斯大林滥用职权，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使肃反扩大化，此外，还提出了斯大林在农业、卫国战争、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苏共二十大，尤其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西方帝国主义者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信仰危机，大批党员纷纷退党。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长期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农业，轻工业，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加剧。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工人罢工、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并出现骚乱。10月，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布达佩斯等地出现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插手下，导致暴力活动升级。所有这些严重事件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困难。

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于4月和12月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表示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对于苏联的一切经验，别的国家不应该原样照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论述了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错误的问题。特别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不同意全盘否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定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帮助了敌人。

在国内国际形势产生变化的背景下，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要课题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 1956 年初开始，我国进行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地发展科学文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教育、科学、文艺等部门负责人等共 1279 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向会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分析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学习改造，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提高，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报告正式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成为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分析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明确提出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会议建议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为主任，集中几百名优秀科学家编制 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起了积极的作用。会后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农业是关键。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从 1955 年 11 月开始与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征询了中共党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1956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这个纲要草案，25 日，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农业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其中心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在这时候，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以此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力求在工业和文教建设上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中存在着一

片面追求速度的做法，但是从总体上看，这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向。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国家经济的情况和问题，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在 1956 年初，刘少奇听取了工业、交通部门的工作汇报。从 1956 年 2 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 34 个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由毛泽东总结成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在 4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围绕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注意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在“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有 5 个关系。毛泽东强调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但鉴于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现象，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不要像苏联那样，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政治方面谈到了 4 个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 1951 年和 1952 年的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肯定现在还有反革命，但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在是非关系上，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犯了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之一。报告同时还向全党、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了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在讨论十大关系问题时，针对建国后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方针，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联合召开的报告会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是人民内部的民主自由在科学文化工作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鼓舞，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周恩来于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政治方针。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周恩来的这个思想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一系列正确方针的制定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11年，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至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建国以后，党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放在重要地位，使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望超额完成任务。1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56年党员人数比七大时增加了8倍，达到1073万，党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为了全面地总结11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制定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

会的代表 1026 人，候补代表 107 人。50 多个外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和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毛泽东在会前的预备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在大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他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现在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还存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严重缺点。必须用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这些缺点。他还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还听取了朱德、陈云、董必武等 68 位代表的发言和 45 位代表的书面发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八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这主要有：

（一）正确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变化，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大会强调：虽然还存在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八大确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

（二）通过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鉴于 1953 年和 1956 年初发生两次盲目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偏向，八大系统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经验教训，提出在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保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八大根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强调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要求 1962 年的钢产量达到 1050 万吨到 1200 万吨；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

有制；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要求1962年的粮食产量达到5000亿斤左右；努力培养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要求“二五”计划期间，职工工资平均增长25—30%。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原则，主要有：要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注意把国家的集体利益和人民的个人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全面安排和综合平衡，注意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克服中央过分集权的现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的方针，实行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即：既要以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为主体，又要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既要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又要有自由生产作补充；既要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又要以自由市场作补充。

（三）提出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八大指出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改进国家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要求认真地、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大会要求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改变中央对地方限制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的现象，以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大会认为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协的作用。大会提出健全国家法制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迫切任务之一，必须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维护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秩序。

（四）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确定了执政党的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八大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很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产生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为此，必须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73名。9月28日，举行了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结果是：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7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6名，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八大的功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想还不够成熟，八大的正确方针在党内未能牢固确立，一些重要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或者没有充分地坚持下去，因此，八大以后，我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

八大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继续进行。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上，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针对彼匈事件，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人民对于领导人员的监督。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苏两国的具体情况，强调坚持中国自己的特点，反对一切照搬苏联。全会还听取了周恩来作的《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放慢一点，八大和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指标经过研究可以修改。周恩来鉴于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提出1957年度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他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全会的赞同。

八大以后，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探索。在“一五”期间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有其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中央集权过多，国家对企业管理过严过死，地方缺乏自主权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1957年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三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是把管理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三个文件后经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会议通过，于1957年11月15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在农村还开始进行了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工作。1957年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规定社员自留地不得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10%。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三个指示，调整了高级社的经济管理体制，规定：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做好生产管理工作，要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调整社队的组织规模，认为一村一社比较适宜，生产队以20户左右为宜；贯彻互利政策，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鼓励社员发展畜牧业等等。

在个体手工业、个体商店发展问题上，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之后，自由市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活动明显活跃。

《人民日报》在1956年12月21日发表社论《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指出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人民需要，增加市场商品供应，另一方面扩大城市就业人数，对国家有利无害。

1956年12月，毛泽东与工商联负责人和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提出：地下工厂（指自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原料，有销路，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这种做法称为“新经济政策”。同年12月29日，刘少奇也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毛泽东：《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6年12月7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3—1956）》，第3。

1957年4月6日，周恩来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八大以后党和国家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其思想是可贵的，它表明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这种改革和探索未能深入下去。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出现动荡。这些国家都曾学习苏联，照搬苏联的模式。在经济上片面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未得到应有提高；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强调高度集权，挫伤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在政治生活中，大搞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击、迫害主张独立自主道路的干部群众，同时党政机关和企业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种种现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终于酿成了彼匈事件。对于事件的起因，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波兹南事件后指出：把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通过事件的分析，绝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匈牙利事件的起因也主要是由匈牙利执政党的错误引起的。事件发生后，匈牙利党未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加上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煽动和利用，局势日益严重。波匈事件的发生表明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在我国国内，1956年秋至1957年春，城乡少数地区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闹退社等严重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其自身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的缺点未能很好解决；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势头带来一些问题；某些地区的机关和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在这些事件中，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如：石家庄一个学校部分毕业生因暂时不能分配就业，组织了示威游行。但是也有个别事件是坏人捣乱引起的。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社会矛盾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另一方面普遍大量存在、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人们去思考并努力解决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点是什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问题的处理与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它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涉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认真的富有成果的探索。

1956年4月5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明确指出：社

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其中大部分阐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论十大关系》在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学说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使之更加具体化了。9月，中共八大正确地论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此后一段时间，主要是在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探索研究中。

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提出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的科学概念。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一种是“敌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当时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时，强调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上述理论探索的基础上，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更明确提出了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后，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继续阐发了这个问题，而后对讲话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使之更系统化、理论化。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这篇重要文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结合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明确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各种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与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第二，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

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为了正确区分这两类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具体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还指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敌我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

第三，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政策。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提倡和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在经济工作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维护民族团结，克服大汉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在肃反问题上，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待少数人闹事问题，不采取镇压办法，要克服官僚主义，要把闹事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

第四，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继承八大关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进而还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这里，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公开发表之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毛泽东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整风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的情况下，在整理讲话稿时加进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等话。这段论述同八大精神，同原讲话稿不大协调，理论上也有不妥之处。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公开发表的讲话并未改变原讲话的基本精神，其主题、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都没有大的变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社会

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根源、性质和解决的方针、方法，从而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这一理论对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四、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员人数从1949年的450万增加到1957年的1272万。多数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中担任领导工作。广大党员对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工作勤勤恳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益加强。但是在一些党员中思想认识跟不上日益发展的新形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断滋长，少数人甚至沾染上了旧社会的不良习气，滥用党的威信，单纯靠行政命令办事，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有了新的滋长。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党的八大郑重提出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的思想作风，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除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宣传、文教部门的同志参加外，还吸收了100多位党外人士参加。3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整风就是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使几亿中国人生活得好，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在讲话中，他还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和此前不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引起极大反响。中共中央在3月和4月间，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执行情况。各民主党派也召开会议，积极讨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党内外群众对党的工作和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些情况说明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整风创造了条件。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而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指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 2 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 3 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整风的主题。各级党委要按照两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总结和改进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

《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而不要开批判大会，或者斗争大会。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5 月 1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随后，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的两个讲话，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讲明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从 5 月 8 日至 6 月 3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 13 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有 70 余人次发言。从 5 月 15 日至 6 月 8 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 25 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有 108 人次发言。从 5 月 4 日至 23 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 9 个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报纸对发言作了报道。同时，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卫生界也先后召开座谈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言向党提意见。

中国共产党提出整风以后，广大党内的群众和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揭露出许多问题。5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认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揭露出来，很好。这表明党对批评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在众多的批评意见中，有些提得很尖锐，但绝大多数人是抱着善意诚恳的态度向党提意见，许多意见是正确的。这对于党进一步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极少数右派分子借整风之机，鼓吹“大鸣、大放”，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欺骗和煽动一部分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什么“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并声言“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等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措施反击这股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社会上陆续出现的各种激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对当时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指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大约占1%、3%、5%到10%。党内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跟社会上的右翼分子相呼应，联成一起。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文章还指出：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运动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击右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在肯定前一阶段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90%以上是诚恳的、正确的以外，指出：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要放手让他们发表言论，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月中旬以后，在一些机关和高等院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迅速出现并蔓延，报刊上一时尽是反面的意见，这样就加剧了全国性政治空气的紧张，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5月25日，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这个指示还具体部署了反右派的步骤。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从此，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也就主要地变成了反击右派的斗争。

反右派斗争首先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和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民主党派，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科技界、卫生界中进行。采用的方式是前一段出现的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反右派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强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整风运动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青岛会议以后，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反右派斗争由原有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省市以下机关、工商界和中小学教职员中。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

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9月12日，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一场全民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展开。虽然中共中央曾通知，在工农中不划右派，但在反右派斗争高潮影响下，一些工农群众也成了批判斗争对象，不少人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成为专政对象。此后，整风反右运动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于1958年夏天宣告结束。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确实存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势力和思潮。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是极少数人，对他们的批判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阶级斗争和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没有能够谨慎地把握斗争的发展，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据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62000余人。到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达55万人，其中除极少数真正右派外，绝大多数属于错划。凡被划为右派的人轻则受到处分，重则开除公职以至劳动改造和判刑。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首先，一大批出于善意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和爱国民士受到打击，使他们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这对他们个人和国家都是一大损失。其次，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氛，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损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执行，堵塞了言路，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再次，造成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肯定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错误地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在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提供了依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有了发展。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党员和干部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眼光而不善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应用新的工作方法观察处理问题，而且使用了“四大”的形式，容易造成紧张气氛，把在历史转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个历史教训应该认真吸取，同时这也说明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是十分艰难的。

第二节 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纠正失误中的曲折

一、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5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一股逐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激励下，各部门纷纷提出超过原计划指标的新的经济计划，其中尤以基本建设为甚。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是112.7亿元。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可是1956年初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导致了各方面的紧张。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提出要纠正急躁冒进。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强调：“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5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为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会上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9月，中共八大肯定了上述经济建设方针。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确定1957年经济工作采取“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毛泽东表示同意。这样，1957年的经济工作注意加强综合平衡，适当调整了发展速度，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避免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一年财政收支增长，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0%，弥补了1956年经济工作的不足。

但是，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掀起高潮后，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认识出现了变化。在整风过程中，一些党外人士对1956年的冒进引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紧张的局面提出批评，这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认为是右派言论，遭到错误批驳。与此同时，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进了工作作风，使工农业出现迅速增长的新形势。针对这些情况，国内许多人认为经济建设可能出现比“一五”计划高得多的发展速度，一些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的方针。此时，毛泽东认为国内出现了很好的形势，而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使建设速度放慢了，因此，他相信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1957年9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其开端是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全会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这次全

会讨论并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基本通过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讨论了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等问题。所有这些继承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继续。但是，全会也开始出现偏离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使“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

第一，全面肯定了反右派斗争。全会肯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不恰当估计，认为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是“极力猖獗、极为狠毒的”，进而确定整风运动在原有基础上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全会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肯定毛泽东在会前提出的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作用。

第二，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会前毛泽东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上在小组讨论中，对此进行了争论。不少同志不同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认为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是正确的，应继续坚持。但是，毛泽东在10月9日的会议上作了结论，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三，开始对1956年的反冒进展开错误的批判。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是右倾，是促退。他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这样，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转而强调速度，强调快。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九省二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他认为冒进与反冒进是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会议在讨论第二十五年计划和1958年的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苦战3年基本改变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地方工业产值在5年至10年内超过农业产值；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完成的任务要在5年至8年内实现；在7年内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反冒进，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他还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据此，会议讨论了1958年经济计划，提出了第二本

帐,其经济指标比 1958 年 2 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制定的第一本帐有大幅度地提高。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6.1%提高到 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10%提高到 33%;粮食产量由 3920 亿斤提高到 4316 亿斤;钢产量由 625 万吨提高到 700 万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基本观点已经有了,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他在会上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此外,他还提出两个剥削阶级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以上会议不断加剧的对反冒进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形成这样一种认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是应该肯定的,综合平衡积极稳步的发展则要否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八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政治、经济指导方针上的一系列举措,对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977 人,列席代表 389 人。主要议程是: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谭震林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增选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在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等 117 人作了大会发言,有 145 人作了书面发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几个报告并作出相关的决议,增选王任重等 25 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指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规定了它的基本点,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有很大的片面性。它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速度,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这条总路线成为指导“大跃进”的总方针。

第二,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会议对 1956 年反冒进进行了

严厉批评，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等做法持批评和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保守派”，说他们是举“白旗”，因此要“拔白旗，插红旗”。这种做法大大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造成浮夸不实之风泛滥。会议断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认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根据这个思想，会议正式提出“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议甚至还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1956年9月八大一次会议时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其中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形势就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

第三，重新分析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结论。会议完全肯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接受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意见，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从这种认识出发，会议宣布：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关于主要矛盾的改变和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范畴，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党在工作重点和主要矛盾这两个问题上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状态，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八大二次会议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由于会前和会议期间，连续不断地指责批判正确的主张，使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损害，造成“左”倾思想很快发展，并得不到迅速的纠正。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1958年6月1日创刊号正式出版。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使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会议以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二、“大跃进”的发动和全民大炼钢铁

“大跃进”的发动是从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开始的。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掀起农业生产高潮。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的社论，认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应该和可能更快些”，指出：“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大跃进”。10月25日，农业发展纲要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后正式公布。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通过这些社论，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大跃进”的号召。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反对右倾保守，推动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

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在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目标。毛泽东在征得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意后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中，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天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动员了六、七千万人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这实际上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从酝酿发动进入了全面开展阶段。

“大跃进”的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经济计划，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农业方面，原定用12年时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但成都会议提出争取7年实现，而各省市又层层加码，有的提出5年、3年，河南省则提出1年实现。6月，华东协作区召开农业规划会议，对粮食产量提出不切实的指标，要求今明两年粮食产量达到每人平均1000—1500斤，3至5年内达到每人平均2000斤。据此，中共中央在6月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可增产1000亿斤，达到4700亿斤。

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开来，这成为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显著特征。在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不断报高产，放“卫星”。如：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130434斤；青海柴达木蹇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这一时期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6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宣传报道。在普遍存在浮夸风的情况下，农业部公布1958年夏收粮食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上年增长413亿斤，增长了69%。浮夸风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它使许多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进而造成全党和全国的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引发了全民大炼钢铁。

为了推动“大跃进”的开展，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7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和有条件的省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比较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个目标，从6月初到6月15日止，将中央各部门所属80%的企、事业单位共880多个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还下放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劳动管理权、财政税收权和商业、银行管理权等权限，还允许各地发行地方建设公债。经济管理体制的下放，原本是调动地方积极性，更好地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这种下放出发点是为了全面推进“大跃进”，其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中的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职工队伍和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此后，各地先后掀起了群众性的大办工业的运动，其中又以钢铁生产作为重点。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和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后，追求钢铁产量的增长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年3月成都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的第二本帐为700万吨。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提高至850万吨。6月，各协作区钢铁规划会议竞相提高计划指标，冶金部经过汇总向中央提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超过3000万吨，到1962年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0万吨。为此，1958年必须达到1000万吨以上。6月19日，毛泽东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后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但是，7月份的产钢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只生产70万吨钢，1月到7月底累计产钢380万吨多，同1100万吨的计划相差约700多万吨。8月16日，毛泽东感到产钢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实行党委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等问题，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40项决议。会议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出现“大跃进”，粮食总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棉花将达7000万担，比上年增产1倍以上。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会议认为我国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注意力应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决定当前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生产和机械生产，并正式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1倍，达到1070万吨。此外，会议还确定了一批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和文教事业的高指标，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由于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的高指标，以及建立人民公社的要求，会后全国迅速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使国民经济陷入混乱之中。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掀起高潮并成为“大跃进”的中心。然而，在4个月时间里生产620万吨钢（前8个月生产了450万吨），从当时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采矿、能源等生产能力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全国各地采取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例如：

（1）各地区、各部门把钢铁生产放在首位。凡与大炼钢铁在设备、材料、

能源、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其它工业部门，一律“停车让路”，保证钢铁生产的需要。（2）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除了原有大中型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钢炼铁以外，全国动员大批群众采取土法炼铁、炼钢。到1968年9月，全国有5000万人直接从事冶炼工作，建立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小高炉、土高炉60万座。到12月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万。同时，尚有2000万人从事找矿、挖煤、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工作。（3）不断追加投资，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1958年基建投资总额为267亿元，比上年138亿元增加97%，相当于“一五”期间投资总额550亿元的一半。

经过几千万人4个月的日夜苦战，到1958年底宣布全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但是，其中300万吨不合格，无法使用。

钢铁生产指标虽然完成了，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高潮的“大跃进”运动却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加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及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严重失调；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造成1958年农业丰产而没有丰收；经济效益极低，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尤其矿产和森林资源损失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村广泛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天，全国动员和组织几千万农民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这期间，为便于农田水利建设，部分地区出现了农业社之间、乡之间以及县之间较大范围的协作。这种协作关系是正常的。但是，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由此认为，原有的农业合作社规模过小，应把小社有计划适当地合并为大社。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文件下达后，各地很快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最早并大社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和平舆县。4月，遂平县嵎山卫星社成立，它由27个农业社合并而成，拥有9369户。辽宁和广东两省步伐也很快。辽宁省将全省9272个农业社合并成1461个大社，平均每个大社2000户左右。农业社合并以后，各地采用的名称不同，有“农场”、“大社”和“集体农庄”等。6月间，公社的名称才逐渐出现。如：6月中旬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成立了名叫“红旗共产主义公社”的大社；6月底辽宁省安东县前阳地区成立了“前阳公社”等。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陈伯达另一篇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中转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以后，河南遂平县嵎山卫星社根据毛泽东的话，正式成立河南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全县也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此外较早成立的还有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他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在视察山东时，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的消息公开报道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许多地区相继出现小社并大社和大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所有制方面“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方面，“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不成熟的地方暂时采用原有的按劳计酬的制度，但不是“各取所需”。决议强调：“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决议。全国各地在原有大社转公社的基础上，未经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指规模和经营范围大。原来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4000—5000户的人民公社，一般一乡一社。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社会基层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任务，这同农业合作社有重大区别。所谓公，指集体化、公有化程度高。除了原有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有财产归公社所有外，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私有房基，林木等均为公社所有；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社队内部贫富拉平，大搞平均主义；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幸福院、幼儿园等公共事业，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公社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往往无偿调拨，甚至对社员的财物也无偿占有。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基层生产队没有自主权，取消了生产责任制，造成生产积极性降低，劳动纪律松弛。为了适应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国家将农村中原属于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一些企业划归公社管理，这样损害了国营企业，削弱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还造成农村商品流通的混乱。

人民公社实行的一系列做法超越了我国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种超阶段的空想。它不仅没有保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相反却把农业合作化后期发现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扩大了。在公社化的过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严重泛滥，大炼钢铁、

大办工业等运动加剧了对农村人力、物力的无偿调拨，这样进一步助长了农村中的“共产风”，加上农业高估产带来的高收购，使我国农村经济陷入了混乱状态，粮食、油料、副食品供应出现严重不足的局面，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存在一种共同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经济，摆脱长时期“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感触最深，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存在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建设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离开了这些，仅仅凭借一种愿望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走向反面，最终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忘却了谦虚谨慎，滋长了骄傲自满，忽视了实事求是，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造成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这种失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咎于他，党内许多领导干部都有责任。正如邓小平所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四、教育文化领域“左”倾思想的泛滥和对“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思想在教育文化领域也有反映。

教育工作方面，1958年3、4月间，教育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主题是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会议提出：大力开展识字运动，大办各级各类学校，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普及办学，贯彻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等具体要求。

1958年4月15日至24日和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研究了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这次会议的内容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写进在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历史地看，这个教育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忽视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重要任务。指示还提出了教育发展的一些具体要求，例如：全国各大协作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有条件、自愿的青年受到高等教育。这些要求是不切实际，难于实现的。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教育领域开展了“大跃进”。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情况下，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否定课堂教学的必要性，忽视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贬低专家、学者、教授的作用；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使学校盲目发展，1958年全国高等院校增加到791所，比1957年净增562所；大办业余教育、工农大学，大抓扫盲工作，河南登封县两天内建立工农大学44所，入学人数达11.7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1/3以上。上述做法没有使教育事业真正得到发展，相反，却导致了教育工作的极大混乱。

“大跃进”的做法也影响到了文化领域。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与会者提出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要放“卫星”。

10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要求群众文化活动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跳舞，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据此，一些地方提出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等的口号。作家被迫创作大批反映“大跃进”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除了教育文化领域“左”倾思想泛滥以外，在理论学术方面“左”倾思想也有表现，这集中反映在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上。

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在1954年即开始注意中国人口问题。1957年6月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发言。《新人口论》共讲了10个问题，主要内容有：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人口增长率在20%以上，而我国的资金积累不够快，1956年的积累只有国民收入的21%，“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人口发展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量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就会表现出许多不适应，表现出许多矛盾。他疾呼：“控制我国人口，实属刻不容缓”。对于如何控制人口，他提出：实行定期人口普查，以此制定人口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恋晚婚晚育等。《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分析论证而得出的结论，实践证明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新人口论》却遭到了批判。

在人口问题上，毛泽东在1956年和1957年曾提出计划生育、节制人口的思想。但是，在“大跃进”形势下，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除了党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客观上助长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1958年5月，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以后，首先在北京大学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而后一些全国性报刊陆续载文加入批判，把他的人口控制思想错误他说成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待众多的批判言论，马寅初针锋相对与之论战。从1958年到1959年，他发表10余篇文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并表示“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

者们投降。”康生由此部署更大规模的批判马寅初的运动，指责“新人口论”是“借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强大的压力下，1960年1月，马寅初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久，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剥夺，长期与外界隔绝。

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我国人口迅猛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五、炮击金门和西藏平叛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坚持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依据1955年3月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向台湾当局提供军援、武装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军从，并长期支持以金门、马祖等岛屿为前哨据点，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

1958年7月，美国派兵在黎巴嫩登陆，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企图进行战争挑衅，公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国民党军连续组织军事演习，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国民党空军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骚扰活动。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7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7月1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具体布置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为了反击国民党军对大陆的挑衅，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于1958年8月23日开始向金门岛猛烈炮击。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2海里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大小金门岛、马祖列岛、大担岛和二担岛等均为中国内海岛屿。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不可动摇，尤其不能容忍在大陆内海中存在着象金门、马祖岛屿这样的直接威胁。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中国的内政。但是，美国于8月24日命令第七舰队采取“预防性防御措施”，27日又命令美国军队协防金门、马祖。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受权发表声明：确保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美国已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9月7日起，美国军舰开始为蒋介石集团到金门的船只护航。杜勒斯的声明和美国的武装挑衅受到苏联、朝鲜等国的谴责。美国的盟国中许多国家也表示不愿卷入台湾海峡危机中去。在内外压力下，美国改变做法，私下劝说蒋介石集团从金门、马祖撤军，利用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历史上曾被日本割占的事实，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这引起蒋介石集团的不满。

为了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领导人及时调整政策，决定暂缓收复金门、马祖，让其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中，以利于蒋介石同美国“两个中国”的图谋作斗争。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没有美国军舰护航的条件下，暂停炮击7天。

13日，国防部再次命令停止炮击两星期，并指出：“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因美舰护航，受命恢复炮击。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与蒋介石会谈，逼

迫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但由于前一天的炮击，会谈未取得结果。

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劝告蒋介石集团不要过于依赖美国，要千万提防；同时宣布单日炮击，双日停止；希望蒋介石集团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随人俯仰，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同美国的斗争，使美国的战争政策遭到破产。美国只要不把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地区，就无法摆脱被动的状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美国宣布从1958年12月10日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台湾海峡局势由此缓和下来。

西藏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遵照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大团结、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积极扶助西藏发展经济文化，同时考虑到西藏的特殊历史情况，在社会制度（农奴制度）改革和藏军改编问题上准予暂缓执行。1956年中央宣布在1962年以前，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和藏军改编。同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原有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寺院的收入未予变更，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分裂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者，为策划“西藏独立”多次进行叛乱活动。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平叛，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在拉萨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武装后，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达赖喇嘛原定3月10日到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礼堂看戏，这是他自己在一个多月前提出的，日期也是他定的。到了这一天，西藏叛乱集团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的反动口号，并当场打死反对叛乱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藏族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等人，还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驻拉萨的机关。叛乱分子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持”出拉萨，于19日夜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全面进攻。20日，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下讨伐叛乱分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于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被“劫持”，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在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之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叛乱分子，到11月叛乱集团的主要力量被歼灭。

平叛以后，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长期奴役西藏人民的农奴制度，广大农奴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到1961年，民主改革胜利完成，西藏从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主席。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

六、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

北戴河会议以后的两个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相继到各地调查

研究，发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一些错误，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等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可行的方针政策。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中心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会上，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针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4日，毛泽东在听取一些省委书记议论十年规划文件时说：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关于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批驳了陈伯达等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他说，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建议党的各级负责干部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会上，毛泽东亲自和与会者一起认真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武昌会议。为了进一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同时为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继续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指标问题，地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会议还提出要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期间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准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

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共中央纠正这一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乱现象的成果。

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决议》强调：“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

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统一全党的认识。

《决议》还规定：社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等）和存款永远归个人所有；社员可以保留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还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决议》还批评了浮夸风，认为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相容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定降低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的500亿元降为360亿元，钢产量由原定的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但是，粮食生产指标未能降低，仍定10500亿斤。

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被抑制，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共产风”和向农民征收过头粮的现象仍然存在，党同农民的关系依然紧张。1959年2月，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这种情况后，认为只有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才能纠正“共产风”。据此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中央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应当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他说：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因此，有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为了纠正人民公社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他认为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毛泽东还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提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共 14 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个文件还规定：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管理区（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召开多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宣传和贯彻有关人民公社的新精神和决定。毛泽东几次给各级干部写信，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

上海会议。195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上海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1959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着重解决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问题，其主要内容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时期；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对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帐目要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凡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劳动力、土地、房屋、生产工具、资金、家畜家禽等要退赔；公社的全部劳力，用于农业生产的不得少于 80% 等等。这些规定对各地整社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全会还讨论通过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将基本建设投资由 360 亿元降到 260—280 亿元，钢产量仍为 1800 万吨，但内部说明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

在全会上，毛泽东提到工作方法问题，如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波浪式前进，解除封锁等。他还提出要学习明朝官员海瑞敢讲真话，要有象海瑞批评嘉靖皇帝那样的勇气。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作《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作《关于 1958 年国家决算和 1959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代表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大会通过的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仍然是高指标，其中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 41%，农业总产值增长 39%，钢产量为 1800 万吨，煤产量 3.8 亿吨，粮食产量 10500 亿斤，棉花产量 1 亿担。

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4 月 17 日至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进入 1959 年的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造成的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工农业生产问题严重,轻工业品、副食品供应短缺。鉴于这种情况,陈三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专拨一部分原料生产日用必需品;精简上一年多招收的工人等措施。同时,他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落实钢铁生产指标,提出钢产量指标由 1800 万吨降至 1300 万吨。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确定当年钢产量为 1300 万吨。为了纠正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方面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写了一篇《党内通信》。他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他强调各级干部都不可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农村整社过程中,农民群众要求恢复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对此,5、6 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把闲散土地利用起来,所收庄稼不征公粮,不归公有。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规定公社、生产队生产的一、二、三类物资,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可拿到集市上交易,社员家庭生产的产品亦可在集市上出售。此时,中共中央还明确: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它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从 1958 年 11 月以来的八九个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紧张的形势也得到初步的缓和。这期间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长远的意义。但是,毛泽东等充分肯定“三面红旗”,这就使得纠“左”的措施,未能完全落实,也不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倾错误。

七、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指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6 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为了进一步总结 195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于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 19 个问题要与与会者讨论。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会议分成六个大组进行讨论。讨论中大家原则上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部分同志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存在的问题,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要求深入地进行这项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对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不满,不愿多讲缺点,多听批评,认为纠“左”过了头,是泼冷水,是右倾。7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组长会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一些干部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说法。他强调总路线、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他宣布会议到 15 日结束。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西北组多次发言和插话。由于他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发言中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尖锐。他担忧一些人“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愿听批

评意见会影响对“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于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1958年以来，“成绩确是伟大的”。其次总结了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我们所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普遍滋长，“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彭德怀建议系统总结一下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甚有益处，这样做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的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他给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自己意见的做法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

7月1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者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讨论中，有些人反对这封信，认为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较多的人表示基本同意这封信的内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但对一些提法（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表示不赞成。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在讨论中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张闻天在发言中还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他反对那种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主张“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党内民主作风方面，他认为“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牛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以及张闻天等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自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一直在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他坚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1958年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对于彭德怀等提出进一步深入纠“左”，从指导思想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的要求，毛泽东认为这不是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怀疑和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右倾的表现。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他们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还逐一批判了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观点。7月26日，毛泽东在李云仲给他的信上写了两千多字的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毛泽东还说这个批语是他23日讲话的补充。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开始对彭黄张周进行错误的揭发批判。

8月2日至1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历史上的是非，搞“新帐老帐一起算”，把彭德怀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

同盟者”。会议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干部”。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议决定把彭黄张周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职务，以观后效。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八届八中全会还根据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调整 1959 年的计划指标，如钢产量降为 1200 万吨，原煤产量降为 3.35 亿吨，粮食产量降为 5500 亿斤，棉花产量降为 4620 万担。但是，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又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下，以跃进的速度立即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庐山会议以后，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这场运动的重点虽是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军区、各省地具领导机关，但也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全国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 300 多万人。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是建国以后国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它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政治上，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以致国家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助长了说假话、搞浮夸、不敢坚持原则的不良风气，也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得以发展。理论上，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视为“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察觉并开始纠正的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并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八、继续“大跃进”的错误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 1959 年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调整以后不久，在“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的口号下，计划指标又一再加码，要求尽快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提前两年实现原定“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

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1959 年 10 月决定增加 63.6 亿元，达到 311.6 亿元，实际增加 96.6 亿元。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增加到 1000 多个，增加了 230 个。

在工业交通生产上，10 月份提出更快跃进的要求，号召“第四季度继续鼓足干劲”，“争取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争取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以比 10 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等等。到年底，通过苦干蛮干，钢产量完成 1387 万吨，但却挤掉了其他产品的生产。

在农业方面，将纠正公社化以来“左”倾错误过程中变动和改进公社所

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做法称之为“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同时，不顾 1959 年全国耕地 1/8 (2 亿亩) 受灾的情况，于 10 月决定农副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的速度由原定 10% 左右提高到 15%。实际上，1959 年农副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

进入 1960 年，“大跃进”仍然在继续。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估计 1960 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情况可能比 1959 年更好。会议确定了 196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为 1840 万吨，粮食产量 6000 亿斤的高指标。会议还提出 8 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这次会议以后，经济计划指标不断加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纷纷出台。1960 年 3、4 月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 29%，农业总产值增长 12%；钢产量增长 38%，达到 1840 万吨，粮食产量增长 10%，达到 5940 亿斤，铁路货运量增长 33%，达到 7.2 亿吨等。由于 1959 年估产偏高，同经核实的 1959 年的数字相比，1960 年的计划指标增幅更高。即使这样，这不过是“第一本帐”，当时还有更高指标的“第二本帐”，如钢产量规定完成 2040 万吨。为完成这一高指标，又重搞“小洋群”、“小土群”。当时要求在 1960 年内全国所有有煤铁资源的县、市至少搞一个以煤铁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基地。还提出要搞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等。

大搞全民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是 1960 年“大跃进”的一个特色。1 月，各地区、各部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运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高速度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据 24 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从 1960 年 1 月到 3 月上旬，仅工交部门的职工就提出革新建议 2530 多万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达 965 万件。这当中，由于急于求成，缺乏科学态度，出现许多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的现象。

农村中“共产风”再起，普遍推行公共食堂。1960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中说：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丢掉这个阵地，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据统计，1959 年底全国农村开办公共食堂 391.9 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即使这样，仍要求争取 80% 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 90% 以上更好。这种做法脱离农民现实生活水平，违反自愿原则，给农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引起农民很大不满。

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在 1960 年 3 月向各地提出的要求。除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应一律挂人民公社的牌子。据统计，到 1960 年 7 月底止，全国 190 个大中城市已建立人民公社 1064 个，参加公社的人口达 5500 多万人。

总之，1960 年“大跃进”的继续，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严重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

1958 年到 1960 年的“大跃进”，在国家动员空前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在亿万人民艰苦努力，辛勤工作的情况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据 1964 年统计，建国以来到 1964 年为止，在新建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主要是重工业部门，属于三年间开工的占 2/3 以上。

1958 年至 1960 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在 1950 年至 1979 年的 30 年间新

增加的生产能力中所占比重：炼钢占 36.2%，炼铁占 32.7%，采煤占 29.6%，机制纸占 33.8%，棉纺锭占 25.9%。这三年间还设计建设了一批重点工程，如大庆油田的开发，原子能技术的突破，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落成，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与施工等。但这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功劳。如果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还会更大。正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经济活动中脱离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大刮“共产”风，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生产力受到巨大破坏，加上这期间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地撤退专家、逼我还债等客观原因，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三年间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三年平均积累率高达 39.1%（“一五期间平均积累率为 24.2%）；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从 1957 年到 1960 年增长 1.3 倍，而农业总产值则下降 22.7%；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三年间生铁产量增长 3.5 倍，铁矿石增长 4.8 倍，而轻工业产值比重由 55% 下降到 33.4%，重工业则由 45% 上升到 66.4%；财政收支不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比例失调，出现了巨大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第二，生产大幅度下降。其中农业生产急剧下降，1959 年粮食产量仅为 3400 亿斤，比 1958 年实际产量 4000 亿斤减少 600 亿斤；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到 2870 亿斤，跌至 1951 年的水平；1960 年棉花产量为 2125.8 万担，也跌至 1951 年的水平。工业生产中轻工业生产严重下降，1962 年与 1959 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下降 35.2%，棉布产量下降 66.6%，糖产量下降 69.1%。

第三，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由于生产下降导致市场商品供应紧张。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 19.4%，其中农村人均减少 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 70%。许多地区因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上述情况表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面对严峻的现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已势在必行。

第三节 战胜严重经济困难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一、农村政策的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逐步清醒过来。为了克服严重困难，纠正错误，中共中央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并首先从农村开始。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

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承认“有过许多错误”，如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他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固有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全力保钢，计划指标不再搞第二本帐，加强农业战线，保证粮食生产。会议重申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不再讲3、5年内向社有制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工业部门应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

从10月开始，在农村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其中重点肃清“共产”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项工作，中共中央于11月3日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坚持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紧急指示信》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护，对扭转农村形势起了重大作用。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制定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肯定《紧急指示信》是完全正确，合乎实际的，进一步布置了整风整社工作。它强调：彻底纠正“共产”风等五风；彻底清算平调帐，坚决退赔，还必须向群众作检讨；提高粮食统购价格；社员的自留地适当扩大，由每人平均占当地土地的5%增至7%；在各方面调整和压缩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等。在会上，毛泽东说：这三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有助于落实农村政策的调整工作。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工业的调整

1960年7、8月间，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时，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对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巩固、提高”。8月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汇报时，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上“充实”两字，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9月30日，在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认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会议确定1961年经济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支援农业；会议要求深入贯彻《紧急指示信》，继续做好整风整社工作。

八字方针以调整为重点，主要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特别是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同时还要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尤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八字方针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方针，它的确定对于后来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巨大的作用。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在进行调整工作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作风上的转变和改进，为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要变化提供了前提。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了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搞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率领三十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赴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中，毛泽东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进行解决。鉴于《紧急指示信》并未完全解决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现象，毛泽东于3月间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草案经过群众讨论和试点，做了几次重要修改，于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修正草案。它主要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各级规模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原称生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的领导不可管得太多太死，不许瞎指挥生产，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生产大队是公社中独立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修正草案中还提出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样改变了原草案中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规定，实际上停办了公共食堂。6月19日，针对《紧急指示信》发布以来农村退赔工作不彻底的情况，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强调：公社化以来无偿占用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须彻底清算和退赔，并规定了退赔的具体做法。此后退赔工作进一步开展，先后向农民退赔了250亿元。在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毛泽东于9月2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建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队（指

小队)而不是大队。1962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至少30年不变。这个指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农村政策调整起步之时,工业的调整成效不大。这主要反映在工业和基本建设方面指标没有退够。1960年下半年仍然坚持原定钢产量指标,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导致其他部门生产被挤,造成恶果。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1961年的计划指标仍然偏高,如钢产量为1900万吨。然而半年执行的情况,钢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1961年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工业问题,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指示》还要求在工业管理方面,改变过去一段时间里权力下放过多、过散的状况,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的领导。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标志着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和八字方针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会后,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确定的1961年的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产量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产量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

工业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由于“大跃进”给许多企业带来管理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等问题,1961年6月17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李富春、薄一波主持制定有关工业的条例。他们率工作小组对许多工矿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1961年9月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这个条例规定: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其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各级的责任制;发扬民主,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讲求经济效益。这个条例的制定是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它用条例的形式总结了建国以来管理工业的主要经验,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它的试行对工业贯彻八字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和批转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等等。

这些条例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

在经济工作进行调整的同时,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

1961年上半年,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科技界的意见,提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7月,这个草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试行。《科研十四条》认真总结了建国以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经验教训,针对“大跃进”中曾经发生过的错误,规定了各项正确的政策措施,

主要有：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讨论；要划清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一时难以断定的，先以学术问题来处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培养出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1年初教育部召集部分高等学校负责人和教授座谈会，研究草拟高等学校的工作条例。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后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9月15日下发试行。《高教六十条》制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主要内容有：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处理好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

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各地试行。

在文艺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认真听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在周恩来具体指导督促下，于1961年8月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力文艺八条）。这个文件经反复讨论于1962年4月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文艺八条》总结了近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检查了缺点和错误，提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文学创作题材应丰富多样，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开展文艺批判，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等重要措施。

上述一系列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使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在总结经验中逐步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这对于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贯彻执行上述条例中，调整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一个中心问题。在制定和执行科学、教育、文艺方面的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批转《科技十四条》时指出：近几年来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要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这些提法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势必需要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作出科学判断。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在3月5日讲话中说：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和报告实际上是继承了1956年1月关

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的思想，它对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端正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内有少数人不同意或明确反对这种观点，这就造成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认识在以后又出现较大的反复，并影响到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七千人大会

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起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干部对于当时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对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不够坚决果断。因此，1961年的调整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步子不大，尤其是工业战线调整的成效甚微，整个国民经济仍处在严重困难之中。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动员全党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更坚决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故通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前一阶段主要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1月27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讲话，对书面报告草稿作了解释、说明和补充。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广泛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书面报告的定稿，作为会议正式文件下发。1月29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开“出气”会。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也在会上作了讲话。

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书面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中，列举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时指出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1961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生产以及畜牧业、副业、渔业的生产还没有恢复过来；1961年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多；市场供应仍然紧张，人民的吃穿用感到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这种严重困难形势的出现，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还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在全国的部分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湖南一个地方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书面报告列举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

对于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问题，会议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书面报告指出：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

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都表示要承担责任。

会议认真分析了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首先，书面报告提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泽东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其次，书面报告提出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而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在讲话中集中谈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此外，会议提出分散主义的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只反右不反“左”等倾向也是导致犯错误的原因。

书面报告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归纳了16条内容，主要有：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不能要求过多过急；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不是平均主义。

会议对1962年的生产任务和全面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并提出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10年规划。会议强调：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

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方面的调整工作作出新的显著成绩。会议提出了1962年经济建设方面的10项工作，主要有：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等作物；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生产。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发扬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以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这对于进一步清理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努力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三面红旗”仍然原则上肯定；在成绩与错误的估计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仍有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在对1958年以来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中，仍坚持对彭德怀原有的错误结论，不给他平反。这样，使得“大跃进”和“反

右倾”的错误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

五、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和进一步的探索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共中央反映，发现 1962 年当年财政有 20 至 30 亿元的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尚有很大的逆差。这个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切实贯彻八字方针，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故称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中心议题是讨论 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认为当时财政经济困难十分严重，经济正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其中主要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的财力和物力。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提出了 6 条办法：

（1）把 10 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提出从 1960 年算起，大体要 5 年的时间作为恢复阶段，在这个阶段采取两条办法：一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二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2）减少城镇人口。

（3）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要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

（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如增加大豆和有关日用品供应等。（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以上六点，是克服困难的重要办法”。他的讲话得到会议的赞同。在经过毛泽东同意后，陈云的讲话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各部门，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5 月 7 日至 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强调必须退够才能完全摆脱被动的局面，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

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全国迅速地坚决地开展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并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从 1960 年的 388.69 亿元削减至 1962 年的 71.26 亿元；积累率从 1960 年的 39.6% 降至 1962 年的 10.4%；1962 年的基建项目为 2.5 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为 1003 个，比 1961 年分别减少 1 万多个和 406 个。工业战线实行关、停、并、转，降低发展速度，调整内部结构。1962 年 5 月调整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由原定计划草案的 950 亿元调为 880 亿元，钢产量由 750 万吨调为 600 万吨。从 1961 年算起，到 1962 年 10 月止，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减少了 4.4 万个。

第二，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从 1961 年初到 1963 年 6 月，全国共

精减职工约 2000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

第三，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第一线，到 1962 年农村劳动力增加到 2.1278 亿人，超过了 1957 年。国家增加农具、农药、化肥的生产和供应，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削减粮食证购量，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第四，加强金融管理，稳定市场，回笼货币。

1962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收回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严格信贷和现金管理。同时，大力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清理拖欠贷款和扭亏增盈；在稳住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继续对 10 种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由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很快取得成效。到 1962 年 8、9 月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到年底，粮食产量达到 32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50 亿斤；1962 年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余 8.3 亿元，结束了 4 年连续赤字的情况；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

在 1961 年和 1962 年调整经济工作的同时，政治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1962 年 4 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并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 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对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以来，一些地区和部门重视不够，进度很慢。鉴于此，通知提出对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人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这样，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展开。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 600 多万党员、干部得到了平反。

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 1959 年国庆前夕已经开始分批进行，到 1962 年大部分已摘去帽子。尽管摘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未从根本上澄清是非，但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1962 年 3 月，刘少奇召集第 18 次最高国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者有也很少。周恩来在 3 月 27 日至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近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还强调，要不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贯彻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态度，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十分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采取更为有效的农村经营管理方式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安徽省在这方面首先进行了大胆探索。1961 年，安徽省宿县、全椒县等地的农民提出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的办法，即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安徽省委支持农民的这一举动，起草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很快这一做法在安徽迅速推广，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 85.4%。同时，广西、广东、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河北、甘肃和东北三省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区也先后采取了这种办法。到 1962 年 7 月，全国大约 20% 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中共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与产量联系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支持过这种主张。邓小平在1962年7月一次讲话中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是适应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的，是符合大多数农民的要求的。它可以被看作是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

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10年，是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其中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际间各种力量分化改组，中国的周边局势趋向紧张，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军事威胁、战争挑衅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如此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方针，以增进中国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维护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50年代中期以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积极声援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交往。从1957年到1965年间，中国同亚非21个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1963年4、5月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强了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后访问了非洲10国，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这期间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随后又访问了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次14国之行程，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0年间，中国还进一步开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代表经过谈判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加强与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964年4月，中日双方就互设贸易代表机构问题达成协议，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设立“高崎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中国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使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和增进了相互间的交往。

在同周边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互谅互让的平等协商，从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签订了协定或条约，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相邻的亚洲大国，两国人民在长期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从50年代末中印关系出现了波折。中印边界问题是两国间存在的

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国间有长约 2000 多公里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存在一条根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范围而形成的传统习惯边界线，其东段沿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中段沿着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沿着喀喇昆仑山脉。英国统治印度后，于 1914 年背着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诱迫西藏地方当局用换文方式制造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土地 9 万平方公里。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对此均未承认。1959 年 8 月以后，印度军队多次侵入中国领土，引起边界武装冲突。

11 月 7 日，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印度拒绝并继续使用武力，侵入中国境内。从 1961 年起，印军不断入侵，在东段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在西段设立侵略据点。

在印度不断挑起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一再强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印度决心走军事冒险的道路。1962 年 10 月 20 日晨，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伤亡严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收复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为了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 11 月 21 日宣布从 22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 12 月 1 日起，从 1959 年 11 月 7 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随后，中国政府将全部被俘印军和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交还印方。中国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为重，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的行动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称赞。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一方面它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军事冒险政策不但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在其盟国中引起了强烈不安，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反对这一政策。在这种情况下，1958 年 9 月 9 日美国表示准备“随时”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级会谈。9 月 15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复会。美国对会谈毫无诚意，企图用让出金门、马祖，换取中国同意对台湾和澎湖不使用武力，实际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断然不能同意。此后，中美会谈未达成任何实质的协议，两国之间的僵局一直延续多年。从 1961 年起，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次年成立“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不断增兵南越，镇压越南南方人民，并准备袭击越南北方。为了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从 1965 年开始，中国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部队，到 1968 年 3 月止总计达 32 万余人，同时给予物质援助总值达 200 亿美元以上。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同美国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中苏两国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友好的。但从 50 年代后期起，中苏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

1957 年 11 月 2 日至 21 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苏，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两党尚能协调立场，互有妥协，共同提出会议宣言，并获得会议通过。1958 年苏联提出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企图损害中国的主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了这种要求。苏联领导人大为不满。随后，苏联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步骤。1959 年 6 月，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在 1957 年 10 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

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不问是非曲直，于 1959 年 9 月发表指责中国、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众。

1960 年 4 月，为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的批评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6 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入党布加勒斯特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散发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会谈中，苏共又和其他几国共产党对中共横加指责。中共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会谈之后，苏联对中国进一步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1390 名，废除 257 个科技合作项目，撕毁 343 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和物资。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进一步破坏了两国关系。

1960 年 11 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前，苏共散发长达 6 万字的更加粗暴攻击中共的信件，挑起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激烈争论。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共影响的一些国家共产党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共于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3 月陆续发表七篇文章，回击了苏共的攻击，阐明了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这是中苏论战的先兆。

1961 年，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军用物资贷款。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农副产品偿还，至 1964 年全部还清本利共计 14.06 亿新卢布的贷款。1962 年苏联驻新疆机构策动和诱骗塔城、裕民、霍城三县 6 万居民逃往苏联，后又制造伊犁暴乱事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1963 年 7 月 6 日至 20 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地全面地攻击中共，挑起中苏大论战。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中共中央从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开始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1964 年 10 月，苏共中央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等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苏共新领导声言对华政策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

1965 年 3 月，中国和朝鲜、罗马尼亚等七国共产党拒绝出席苏共召集的以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入党会议的筹备会。

1966 年 3 月，中共未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中断。此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军队，致使中苏两国关系全面破裂。

中苏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以老子党自居的局面，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反对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这对于各国共产党摆脱苏联的控制，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失误和不足，特别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这成为导致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四节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

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采取切实可行的调整方针，到196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开始趋向好转。在这种形势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未能从根本上纠正，由于党内存在恢复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存在意见分歧，也由于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变故、争端以及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些方面有些激化，毛泽东又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造成“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严重干扰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问题、粮食问题、商业问题等。8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由此，会议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也就成为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前还在北京举行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多次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经过他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会上毛泽东还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人中进行教育，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年年讲，月月讲。

关于“大跃进”以来经济困难形势的估计和对一些地区农村群众实行包产到户的态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刘少奇、陈云等在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够。对待包产到户问题，邓子恢，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表示过赞同的意见。但是，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的影响，把党内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他批评邓子恢等入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1962年6月彭德怀向中共中央递交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全会期间，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同意。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力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全会决定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习进行审查。会后还撤销了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上述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种种批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使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更

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也使七千人大会以后逐渐恢复的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又受到损害。

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工作，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全会继续坚持八字方针，提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全会继续落实了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即原生产小队)，至少30年不变；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应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等。这些规定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讲话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同时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实际工作中的“左”工作，他提议将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高级干部，不向下传达。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会上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能够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这说明“左”倾错误虽有发展，但尚未支配全局。

二、“四清”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的同时，从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部分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起，统称为“四清”运动)。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期间，一些地区的基层单位在经营管理方面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农村中，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不健全，长期帐目混乱，财物不清。一些干部存在公私不分、多吃多占、瞎指挥、强迫命令等不良作风，少数人甚至依仗权势欺压群众。对待这些问题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清理整顿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却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并由此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

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1962年秋冬以后，一些地区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风整社。河北省保定地区进行了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即“小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小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规定在县级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五反”运动。此后，许多地区开始训练干部，进行“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文件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进行猖狂进攻，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要不了很多时间，就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因此，《前十条》强调必须抓紧阶级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并认为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此外，《前十条》还提出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等政策。

在主持制定《前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修正主义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还在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深感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性。

1959年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中央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且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前十条》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因此它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文件精神，各地调整部署，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作了准备。

在运动的试点阶段，多数单位开展得比较好，但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在运动中发生打人、罚站、罚跪、乱搞斗争和经济退赔面偏宽等现象。鉴于上述问题，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9月，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批准发出。《后十条》充分肯定《前十条》，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其指导思想是“左”的。但是，它也规定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运动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等。这些政策对于限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维持正常生产工作有一定的作用。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有一大批农村的县社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些地区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屡有发生。一些试点单位总结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或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如天津小站公社3个党支部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等。此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把农村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刘少奇在1964年春节期间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根据这种情况，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进行夺权斗争。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成为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

争的先声。9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四清工作队总结的桃园大队社教经验，主要是先搞“扎根串连”，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四清”由原来的内容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桃园经验”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各地提出的问题，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后十条》）。这个文件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提出运动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第二个《后十条》的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这以后，全国动员上百万干部参加工作队从事社教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在基层开展“夺权斗争”，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严重混淆敌我界限的严重后果。

为了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来的经验教训，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这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他在会上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刘少奇的提法，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此外，毛泽东对刘少奇强调的运动采取“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做法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内最高领导层中认识分歧的公开化，影响是深远的，它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纠正了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的做法，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但是，《二十三条》仍然存在严重错误，它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说这是“十几年来我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它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二十三条》还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并规定“四清”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二十三条》。各地根据其精神，调整运动规划，整训工作队，解脱大批基层干部，使部分地区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此后，至1966年春，全国大约

1/3 的县社进行了“四清”，城市中仅小部分单位开展了运动。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缺点不足，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运动中却存在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本身是正确的。然而在认识和实践中没有摆正它的位置，过分夸大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进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造成运动中“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方面，把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斥之为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制止，并且把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合称为“三自一包”，作为“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加以批判。同时还批判企业注重经济核算、注重物质利益和经济做法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更为严重的是，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认为全国有 1/3 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还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甚至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然而也要看到，这场运动是在局部地区开展的，而且是通过组织有领导逐步开展的，运动中纠正过一些偏差，工农业生产尚未受到很大影响，社会也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错误批判。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艺界根据全会精神检查了工作。1963 年 3 月，经请示中央决定停演“鬼戏”。5 月，《文汇报》发表江青组织编写的文章，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剧中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无端指责该剧影射攻击共产党，要向共产党复仇，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1963 年下半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进行了多次批评。12 月，在一个批示中，毛泽东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根据这个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进行了整风学习，总结检查工作。

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在审阅《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时又作了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些批评和指责不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不符合文化界的实际情况的。批示下达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文艺界开始第二次整风运动，从 1964 年 7 月一直持续到 1965 年 4 月。运动中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文艺界人士进行错误批判，并且改组了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在文艺界整风的同时，在全国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进行公开批判，如《李慧娘》，《谢瑶环》、《怒潮》、《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应该说，个别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确有缺点，这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解决。但当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错误

地认为这些作品是文艺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许多作品被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同时，一些文艺理论观点、文学思想也受到公开批判。

从1964年夏开始，对文艺界的批判进一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了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两部书。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重视物质利益、重视利润等经济理论观点。此外，还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

随着文艺、学术领域批判的加紧，知识分子再次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受到伤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无法认真遵循，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遭受挫折。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曾引起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的不满，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也有所觉察并试图作某些纠正。

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文化方面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努力未能奏效。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浪潮，并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三、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十年建设的成就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仍然继续进行。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这时，有些领导人认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又可以转向加快发展了。对此，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确实出现了明显好转，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业结构不平衡、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也有不少问题。会议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会议强调3年的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要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要比1957年的水平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原料、材料、燃料的节约要达到或超过历史上最好水平。为实现上述任务和目标，必须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在继续调整的3年中，在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1963年3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托拉斯——中国烟草公司，集中管理全国的烟厂。后在全国

又试办一二十个托拉斯，初步取得了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经验。

1964年5月以后，美国、苏联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在此情况下，备战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开始布局，一些新的建设项目被停建、压缩或分往三线，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

1965年6月，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以后，沿海一些工厂开始迁往内地，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加紧进行，在西南和西北地区有计划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食油、钢材、有色金属等战略物资。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3037人。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几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报告提出了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要求1965年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为从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准备。报告根据毛泽东提议，明确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在庄严场合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未能按计划实行。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彭真、刘伯承、李井泉等18人为副委员长；杨秀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任命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等16人为副总理。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政协副主席郭沫若作的关于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全体列席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最后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到1965年底，经过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

（一）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据统计，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84亿元，比1962年增长55%，工农业总产值1963年—1965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5.7%，超过了“一五”期间年平均增长10.9%的速度。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有了增加。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890亿斤，比1960年增加1000多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水平。钢产量达到1223万吨，比1960年增加703万吨，比1957年增加688万吨。此外，原油、发电、原煤、化肥、汽车等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也基本上实行平衡发展。

三线是指从战备出发，根据我国地理区域划分为战略后方的地区。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及豫西、晋西地区。

1966年同1960年相比，农业和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47.9%上升到69.6%；重工业比重则由52.1%降低到30.4%。

（二）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65年我国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1962年增加463亿元，比1957年增加479亿元。1957年积累率为24.9%，1959年和1960年分别高达43.8%和39.6%。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积累率降到10.4%，也是不正常的。1964年和1965年积累率回升到22.2%和27.1%，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职工工资逐步提高，1965年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农民收入也有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接近或超过1957年。

（三）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市场供应显著改善。国家财政收支在“二五”期间有172亿元的赤字，而1965年财政收入473亿元，支出466亿元，结余7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5年达657亿元，比1962年增加53亿元。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困难时期的高价商品已改为平价，外贸方面，1965年进出口总额达118.4亿元，其中进口55.3亿元，出口63.1亿元，外汇收支恢复平衡。

总而言之，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正确的，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1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1958至1960年间犯了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但是，由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努力，在八字方针指导下，用5年时间克服了困难，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10年间各项工作的主导方面。

具体说来，（一）工业建设发展迅速，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初步建立了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1966年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工业总产值1966年比1956年增长170%，1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103%。（二）交通运输、邮电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0年间新建通车和部分通车12条铁路干线，公路通车里程1966年比1956年增加317300公里，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邮电通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建设。

（三）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成效，农产品产量有了增加。从1958年开始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理了淮河、黄河、海河、长江的部分支流及珠江等河流，提高了各大水系的防洪蓄水、灌溉农田和供居民、工业用水的能力。10年中，虽然农业生产出现低谷，但各种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粮食产量达到21400万吨，比1956年增长11%。（四）科学、教育、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科技方面，我国科技工作者最早育成矮秆水稻；地质勘探方面，在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工业方面，我国自己创造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新技术；在医学方面成功解决了烧伤面积达98%的伤员治疗问题；基础科学理论方面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教育工作方面，从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培养毕业生近140万人，为1950年到1956年7年间的4.9倍。此外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0年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和曲折。这当中既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许多产生于实践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宝贵经验，又有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经过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做法。这是10年探索同时存在的两个发展趋向。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表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的纠“左”和1960年冬天以后5年调整工作中的探索；错误的趋向表现在1957年夏天以后“左”倾思想有了明显发展，这主要指经济建设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10年中，两个发展趋向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是共存于同一个探索过程中的。有时正确的趋向占上风，有时错误的趋向占上风，有时两个趋向在不同领域中并存。总起来看，10年中错误发展趋向的不断发展压倒了正确发展趋向，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林彪集团的覆灭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导火线

1966年是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种矛盾、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积累的结果，首先，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直接原因；其次，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步发展，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三，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和助长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也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其四，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存在一种脱离实际、带有空想色彩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扫除实现这一思想的障碍；其五，“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国际上看，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这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震动，提高了“防修”的警惕性，并且在国内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作出科学的准确的判断，而是把党内外正常的不同意见和争论看成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阶级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从国内来看，一方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只有在探索中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从而使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弊端集中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思想不易在短时间内清除，由此，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的倡议，于1960年底写成的。翌年初开始上演。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并不担任重要职务的江青在1962年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4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1965年2月，江青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错误指责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反映”，并断言《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后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未研究讨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抵制姚文元文章。《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主要报纸没有转载。直到11月30日，在了解姚文元文章背景后，《人民日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编者按语，强调：《海瑞罢官》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时进一步说：姚文元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更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色彩，造成批判运动的范围迅速扩大。

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极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调。

1964年5月，在他“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下，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1965年11月，林彪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实际就是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个人崇拜，宣扬现代迷信。在1966年，林彪更进一步神化毛泽东，把毛泽东著作说成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受到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抵制。为此，林彪、叶群勾结吴法宪、李作鹏等制造伪证，诬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

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表示对罗瑞卿的不信任。因此，罗瑞卿受到错误的批判，在12月8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被调离军队领导岗位，并受到隔离审查。在此之前，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无中生有的罪名而遭免职。

到1966年初，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波及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为了研究解决学术批判中的不正常情况，提出一个明确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在讲话中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提纲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运动，强调：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提纲还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这个提纲得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2月8日彭真等人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随后，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将提纲转发全党。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

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就在中共中央研究拟定“二月提纲”，对学术批判加以某些限制之时，江青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还批判了所谓“黑八论”，提出创立样板戏，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任务。毛泽东对这个《纪要》作了三次修改。4月10日中共中央将《纪要》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领域阶级斗争过于严重的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纪要》的制定过程，还是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利用的开始。

《纪要》的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1966年3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说彭真追查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是“整到主席头上来了”。由此，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3月30日，毛泽东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他还点名批评由邓拓、吴晗、廖沫沙撰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撰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等问题。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5月8日，江青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发表，公开发起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批判，把他们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其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一时期，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已经扩展到政治领域，针对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党内外产生强烈的震动，这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的指示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会上林彪毫无根据地提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会议由此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

所谓“黑八论”指：“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

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据此，《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还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并列举其所谓10条主要错误，指责它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时，《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通过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系统地提出了“左”倾方针和理论，由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通知》中反映出来的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和要求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散布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他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对会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5月7日致信林彪（后被称为五·七指示）。他在信中勾画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与“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除了以一业为主外，兼学其它，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的设想。这些设想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根据会议决定，5月28日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因此，一开始它实际上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采取一种异乎寻常的措施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开展起来。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康生派人授意下，贴出一张诬陷和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即在北京大学内引起强烈反对。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报道，控制了全国主要的舆论工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毛泽东批准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是“反党集团”。号召群众把“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又公布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文化大革命”。

上述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的反响。各地的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他们冲击学校党政机构，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并波及机关、工厂，使局势日益紧张。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6月上旬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以往解决基层问题的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驻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协助领导运动，同时拟定了《八条指示》，规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等，以求控制住局势。

运动一开始，由于各单位的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向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采取态度也不同，因此，群众中出现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并展开激烈斗争。一部分群众和工作组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产生分歧，导致一些单位发生驱赶工作组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驱赶工作组的人，并给他们加上“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这样做并未缓和“造反”群众和工作组之间的矛盾。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方面向中央提出撤回工作组的建议，并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另一方面收集材料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片面的汇报。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发现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式，不符合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意图。7月25日，他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

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会后，各院校抛开工作组、抛开党委搞“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从此开始。

为了排除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高等院校代表47人列席会议。

全会开始时，刘少奇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一些中央部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错误。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十分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还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里毛泽东还针对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指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中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指的是刘少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再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越来越明确。8月17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很快“炮打”中央合党政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的浪潮波及全国。

8月8日，全会在不能进行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又一个充满了“左”倾错误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件规定：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依靠的力量，要求“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运动的方法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运动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正确领导”。这个文件没有对“走资派”、“左”派等提出明确的判定标准，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文件虽然也规定“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但它实际上推动了一场盲目的、自发的、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那些正确的规定并不能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任何约束力。

全会从8日起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揭发批判。12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7人扩大到11人，增加陶铸、

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排列名次居毛泽东之后列第 2 位，刘少奇由第 2 位降到第 8 位。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原来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提及。

通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完成了党内的组织手续。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三、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

1966 年 5 月 29 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学生为保卫毛泽东、保卫红色政权而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6 月初，北京其他一些学校也出现红卫兵组织。但由于人们对它持有异议，因而没有得到发展。6 月 24 日，他们写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以后又写出“再论”和“三论”，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大字报还引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红卫兵的言行完全符合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8 月 1 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说：你们的大字报“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的文件，很快传遍全国。8 月 18 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煽动性的讲话，号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 8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 8 次接见了 1100 万师生和红卫兵。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全国城乡。

从 8 月 19 日开始，北京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他们在“破四旧”的名义下，斗争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民主人士和一些群众被当作“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而遭到任意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有些人甚至被施以酷刑，致伤或致死。红卫兵中一些人肆意焚烧中外古典著作，捣毁珍贵文物，破坏名胜古迹，造成许多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他们随意更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医院的名称，如将北京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北京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上海《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天津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等等。

在“破四旧”的同时，红卫兵又进行了全国“大串连”。9 月 5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让外地学生和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性大串连随即开始。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鼓动“造反”，“炮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 年 6 月 24 日），《红旗》杂志 1966 年 11 期。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 年 7 月 27 日），《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1 期。

打”当地党政领导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加剧了全国的动乱局面。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这时期大量印制《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至1969年3月，毛泽东像章制作了22亿个，全国人口平均每人3个有余。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突出特点。

红卫兵运动初期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粗暴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甚至一些红卫兵的普遍不满。群众组织中间开始发生分裂和改组，打着各种旗号的派别展开激烈的派性斗争。这种情况的出现，当时被指责是“走资派”暗中挑动群众斗群众。

10月1日，林彪宣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意见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这个紧急指示，认为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运用。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广泛流行，更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

为了进一步排除所谓“阻力”，解决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问题，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他点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派工作组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把红卫兵的破坏行为竭力加以吹捧，把人们担心社会发生动乱说成是什么“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林彪在会上讲话，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还鼓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合理的”。25日，毛泽东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红卫兵的冲击“我看有好处”。他估计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这次会议以后，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煽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各级人民群众团体，使这些机关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各级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均陷于停顿。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一些群众被扣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而遭受批斗、抄家和监禁。整个社会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这个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加紧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迫害。10月18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大街上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2月，江青等人鼓动清华大学“造反派”上街，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林彪、康生等人捏造事实，诬陷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搞“二月兵变”，使贺龙惨遭迫害。12月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力等人突然对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终年73岁。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进行攻击，指责他用生产压革命，是“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林彪、江青一伙还指使戚本禹把“文化大革命”前夕刚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指使一些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三线绑架回北京，对他进行连续不断地批斗、折磨。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很好。1966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各项指标较上一年同期有显著增长。“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工业交通系统、基本建设单位和广大农村开展运动持慎重的态度。

1966年7月2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原来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后，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这些文件和讲话暂时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工农业生产的冲击，保证了经济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

但是，10月以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红卫兵去工厂、农村串连，使工交系统和广大农村也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中，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冲击。为了稳定工交系统的形势，根据周恩来指示，负责工交企业工作的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了工业交通座谈会。与会者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应与文教部门、党政领导机关有所区别。会议提出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应由党委统一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单位与单位间进行串连等。

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汇报。林彪在讲话中否定工交座谈会，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修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改变了原有的部署，规定在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人可以进行串连，也可派代表到学校进行串连，学生可以到厂矿进行串连。由此，“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工业、交通、财贸、商业服务各个部门。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改变了原定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部署，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还规定在农村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建立发展红卫兵；生产队之间和公社之间可进行串连；“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等。这个指示下达后，“文化大革命”深入农村。

1969年11月30日，陶铸遭受迫害，在安徽合肥逝世。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惨遭迫害，批斗中肋骨被打断，造成肺部重伤，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动乱的局面，不仅在政治上产生严重混乱，而且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和干扰。在非常严峻的环境中，周恩来努力设法在取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尽力维持国家一些尚能工作的部门继续行使职权和进行社会生产活动，以减轻动乱造成的损失。但是，天下大乱之势已经形成，它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控制，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破坏。

四、“全面夺权”和二月抗争全国陷入内乱和国民经济急剧恶化

1967年1月，由上海扩展到全国的一场“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阶段。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为首者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事王洪文。他们宣称“要夺权”，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在遭拒绝后，王洪文纠集几千人到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要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当上海市委出面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铁路运输被阻断达30余小时的“安亭事件”。12月1日，“工总司”围攻《解放日报》社。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制造了10万人围攻上海市委院内2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员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这个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策划夺权。4日和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大权。6日，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大会，批斗了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此即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派”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1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造反组织发出贺电，说他们的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此，在很短时间内，全国掀起夺权之风，造成全国更大规模的动乱。黑龙江“造反派”夺权以后，宣布成立全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革命委员会”。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公开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此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后权力机构统称“革命委员会”。为了使各地夺权斗争顺利实现，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毛泽东和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应当依法惩办”。之后这一条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有不满的，也是现行反革命。这个规定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月23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和援助地方“造反派”夺权。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三支两军”。这一做法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

全面夺权加剧了全国的动乱，各地武斗盛行，党政机关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这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抗争。1月19日至20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同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叶剑英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这便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责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会上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狡称：群众不答应。谭震林气愤地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向江青汇报，并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评，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责令他们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判这些老同志。同时，江青、康生一伙还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在二月抗争被压制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揪叛徒”的恶浪，更进一步打击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各级领导干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诬陷“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件事在30年后重新提出，完全是康生等人阴谋陷害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全国到处掀起“揪叛徒”的恶风。到4月7日止，短短三个月，各地揪出所谓“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有自首变节

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达 5200 余人。

1968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毫无根据地说：“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由于中共中央几个错误文件，以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许多过去已经作出正确结论的问题被统统推翻，重新审查，甚至无中生有，栽脏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在“揪叛徒”的高潮中。林彪、江青等人发动了一场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运动”。1967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给刘少奇扣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指责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4 月 6 日，经江青策划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刘少奇。5 月 8 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把刘少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说成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11 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单位深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期间，全国报刊大量刊载批判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 5 月至 9 月，仅中央和地方报纸发琴的批判文章就达 150 多篇。

在“大批判”不断升级的同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也愈演愈烈。1967 年 7 月 18 日，江青等人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污辱，逼迫他低头弯腰长达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8 月 5 日，又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8 月 7 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泽东提出辞呈，并明确表示：“我已失去自由”。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尤其是开始全面夺权以后，各地造反群众组织围绕夺权问题分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或几派，在针对打倒什么干部、解放什么干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借机分裂群众，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导致造反组织间长期对立，并进一步演变成武斗，以致形成“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局面。

1967 年 7 月 14 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着手解决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后称“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之间尖锐对立的问题。同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名义由四川抵武汉。他们违背毛泽东、周恩来促使两派群众联合的部署，四出活动，支一派，压一派。这引起“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的不满。7 月 20 日，“百万雄师”的群众和支持他们的部分解放军上街游行示威并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斗。这就是“六·二 事件”。林彪、江青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撤销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职务，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 年 12 月 6 日。

在北京进行批斗。同时对武汉群众进行迫害，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撤销番号。湖北全省因此事件被打死、打伤、打残的干部、军人、群众达 18.4 万余人，其中武汉市被打伤打残的有 6.6 万人，被打死的有 600 多人。

“七·二 事件”以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武斗和打倒一切，进行全面夺权。7 月 22 日，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说：“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就是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25 日，林彪、江青利用“七·二 事件”煽动群众“揪军内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还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此后，各地接连发生冲击军事机关和军队领导人的事件。8 月 7 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安）检（察院）法（院）”。之后，全国各地掀起“砸烂公检法”的浪潮。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公检法机关，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全国公检法机构及其各项正常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造成社会秩序严重失控。

在 7 月至 9 月间，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从使用拳头、棍棒、梭镖，发展到使用步枪、机枪、火炮甚至坦克、装甲车，造成了“全面内战”的局面。贵州、四川、湖南、浙江、广西、河北、北京等地动用枪炮，死伤数十人、数百人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抢银行、抢仓库、劫车船、冲监狱等严重违法事件。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

“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江青一伙还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事部门，兴风作浪，使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外交纠纷不断发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1967 年 8 月 7 日，王力煽动外交部造反派打倒陈毅，夺取外交部的大权。某些外交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使违反纪律的事情屡有发生。更严重的是，8 月 22 日发生了万人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面对全国范围的严重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7 月至 9 月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又强调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他还批评红卫兵有可能犯错误。8 月底，经毛泽东同意，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968 年 1 月又将戚本禹隔离审查。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全国，这对于缓解对干部的批斗和迫害，抑制全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纠正某些极“左”的做法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局面的出现，使国民经济急剧恶化。这表现在：第一，国民经济处于无计划的状态，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基本上瘫痪，1967

年原定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被废置。第二，建国后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被废止，并被斥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泛滥一时。第三，大批工人停工“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导致工业交通部门生产下降。工业总产值 1967 年为 145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4%，1968 年为 1380.3 亿元，在上年下降基础上又下降 5%，仅力 1966 年的 81.8%。第四，在农村进行所有制的“升级”、“过渡”，把农民的家庭副业统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业总产值 1967 年为 651 亿元，比上年有微弱增长，1968 年为 6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仅为 1966 年的 99%。随着生产的下降，国民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在 1967 年和 1968 年也锐减。这样的经济状况必然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系统化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一系列“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这个理论的提法有一个酝酿过程。1967 年 5 月 18 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第一次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概念；1967 年 5 月 27 日，《红旗》杂志第 9 期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进一步提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1967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发展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到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篇文章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文中把“理论”归纳 6 个“要点”，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原话。毛泽东在陈伯达、姚文元送交的信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这表明，这个理论的提法虽不是毛泽东概括的，但确是他同意的。此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了其特定的含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的主要论点是：

- (1) 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
- (2)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 (3)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 (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 (5)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文章认为，这个“理

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更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它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划分的科学含义，背离了依据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阶级的原理，背离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和职能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组织经济建设和进行文化建设的理论，背离了关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述。这个理论没有科学地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极端扩大化的论述，并由此主观臆断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概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出现的，是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相联系的。这个理论的系统化标志着“左”倾错误有了新的发展，也表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达到了顶点。

六、“复课闹革命”“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各级各类学校先后都“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到处串连，到处点“火”，到处设联络站，进行夺权活动和派性斗争，造成国内形势急剧动荡。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成为这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为此，中共中央于3月7日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提出“复课闹革命”是摆在中小学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3月19日，中共中央又下发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但是，由于各地夺权斗争愈演愈烈，动乱局势日趋失控，“复课闹革命”和停止串连的指示并未得到贯彻执行。

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讲话之后，为了稳定局势，“复课闹革命”的应急措施再次提出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此后，大部分中、小学校开始复课、招生，这有利于缓和紧张的局势，但是，由于动乱的局面正在发展，一些地区武斗事件时起时伏，除了少数学校外，大专院校中多数学校并未复课。社会上仍有相当多的学生未返校复课。

1967年10月以后，一些地方的群众在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之后，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错误表示不满并进行揭露批判。1967年底到1968年初，上海一个群众组织指责江青讲的“文攻武卫”和毛泽东讲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相矛盾；北京的部分群众公开揭露了张春桥大叛徒的真实身份。同时，也有人所谓“二月逆流”翻案；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大多是司局长和驻外大使）贴出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要陈毅回部工作。上述情况大都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的斗争，这些活动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就未曾停止过。这刺痛了林彪、江青等人，他们认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于是，以极“左”面目出现，鼓吹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打击反对“左”倾错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1968年3月，林彪和江青合谋诬陷军队领导干部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指责他们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据此，3月22日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军队内的所有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3月25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会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这一事件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精心策划，阴谋篡夺军权的重大步骤，它使林彪一伙在军队内获取了更大的权力。“杨、余、傅事件”后，林彪、江青还乘机煽动追“黑后台”，把矛头直指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对他们进行围攻和迫害。

林彪、江青诬陷打击杨、余、傅，目的在于反对所谓“右倾翻案风”。1968年3月下旬以后，中央和各地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在反“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姚文元于1968年5月13日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呈毛泽东。这时，毛泽东认为群众组织中两大派仍不能实现“大联合”的原因是群众组织里混进了坏人。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这个材料，要求全国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从此，“文化大革命”实际工作的重点由整“走资派”逐步转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打击群众组织中的“坏人”。“清队”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政策界限的模糊和长期派性的存在，一大批群众被“清理”，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反“右倾翻案风”和“清队”进行之际，一度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起，派性斗争、武斗事件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局势再度恶化。破坏交通运输、抢劫银行仓库、抢劫援越物资。破坏公共设施和民用建筑、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的严重事件时有发生。为此，毛泽东再次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恶化的局势。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即“七·三布告”），24日，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恢复铁路交通运输，交还被抢夺去的物资、现金及武器装备，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惩办。这些措施制止了广西柳州、桂

林、南宁地区和陕西等地的武斗和严重违法事件。

与此同时，为了制止武斗，整顿学校的秩序，毛泽东决定向学校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8年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武斗最为激烈的清华大学。蒯大富等人指挥武斗人员抗击宣传队员，当晚打死队员5人，打伤731人。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5人。在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警告和批评了他们。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宣传队才得以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决制止武斗”，26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引述毛泽东的最近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截止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逐步扩展到全国城乡，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也采取这个做法。“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等单位以后，教学、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一月风暴”开始，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止，全国除台湾以外，

29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这当中林彪、江青一伙乘机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安插亲信、骨干，攫取了相当大一部分党、政权力。

为了总结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为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共中央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还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的问题让会议讨论。由此，会议又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对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剥夺参加会议的权利）进行围攻，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

会议通过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由江青、康生等人亲自控制的专案组从1967年3月起对刘少奇进行审查。他们采用种种非法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栽脏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会议未经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错误地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

外一切职务”。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在会上表决时拒绝举手。这样最终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因此案而受牵连被判刑的达 2.8 万人。刘少奇在受审查期间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并遭受长期折磨。1969 年 10 月 17 日他在重病中被押往河南开封，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开封含冤逝世。

会议充分肯定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各项部署，并根据“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准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召开九大的决定、代表产生办法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2 人，代表党员约 2200 万人。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代表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4 月 1 日大会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大会主要议程有 3 项：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的气氛，大力赞颂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大批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上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也看不到任何严肃认真的讨论。

九大的政治报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所作的错误解释和教条化的引用，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和在其指导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报告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第一次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以及 3 年的实践，竭力鼓吹它的“丰功伟绩”，认定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告以大量篇幅对虚构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攻击，把刘少奇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报告还规定了今后的任务是“认真搞好斗、批、改”。九大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由此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了。

九大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不符合实际的阐述，认定“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总纲中还肯定了所谓“基本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这部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罕见的。党章还砍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使得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同时也砍掉了新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所有这些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4 月 24 日，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约占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 32%。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被排斥在外，而林彪、江青的不少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还

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八、“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以“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改造一切，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全国建立一种新秩序，以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其中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意向。“斗、批、改”运动的主要内容不同于《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虽针对工厂而言，但实际包括全国各个领域。

“斗、批、改”中，毛泽东亲自抓“六厂二校”的点，并且把他们的经验推向全国。“六厂二校”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广泛发动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带动各项工作。

“大批判”被认为是为“斗、批、改”开路。这种“大批判”目的是彻底否定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批判中采取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全盘否定的做法，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把建国以后1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统统视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第一次提出批判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它说：“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事实表明，刘少奇从未宣扬过“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虽在1958年8月讲过党员

“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要自觉地作党的“驯服的工具”，但主旨是正确的。其他几论纯属捏造。除此以外，报刊上还大批所谓“人性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福利主义”、“洋奴哲学”、“智育第一”等等。“大批判”持续时间很长，它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混淆了是非观念，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极大混乱。

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样在全国开展了一场“一打三反”运动。据统计，到11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万余人，其中判死刑的9000多人。运动中，清除和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把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中早已查明的历史问题重新拿出来进行审查，借机对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员干部进行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要将反革命清理出来。由此在全国开展了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事实是，在1967年8月，北京曾出现过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后很快查清并予以揭露。但在“清队”中，却将这个北京的小组织放到全国范围去追查。1968年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造成这一斗争严重扩大化，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中一项重要任务。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社论认为“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这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10月16日，《人民日报》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按照这个精神，党的各级组织逐步开始重建。这个过程中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发展经济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则没有提及。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其结果是把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党员开除出党，把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吸收入党，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破坏了党的建设。

“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的做法实际上只是简单地削减机构和人员，没有提高工作效率的相应措施。国务院原有90个机构，1970年6月决定精简为27个，原有机关工作人员53748人，决定编制定为9710人，这样国务院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精简和下放的名义下，大批干部、教师、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分批被派到各地的“五六”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人员长期被排除在各种业务活动和科学文化工作之外，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给国家的现代化造成重大损失。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此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23万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炼，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是，上山下乡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后果，它造成我国“人才深谷”现象的出现。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100多亿元，造成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也给一些地区的农民、知识青年家长带来负担。而对广大知识青年个人来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的不幸则更多。

在“斗、批、改”中，还进行了所谓“教育革命”。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加了一段话，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以后凡仿照上海机床厂办起的各类学校都被称为“七·二一大学”。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同意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这样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院校停止招生达4年之久的情况结束。但恢复招生时废除了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以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2—3年。同时规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社会上形成“走后门”上大学的不良风气。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张春桥等起草并经毛泽东同意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错误地全盘否定17年的教育工作，压制了教育战线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斗、批、改”没有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相反却引起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造成各方面的混乱。以后，由于发生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斗、批、改”运动未能深入进行下去。

九、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抢班夺权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成员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聚合而成。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以后，林彪集团权势达到顶峰。九大党章规定林彪为“接班人”；林彪集团其他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邱会作等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掌握了军权。随着林彪集团权势的扩大，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同时他们担心“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超过自己，于是采取阴谋手段急于抢班夺权。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出于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下一步转向政府重建问题的考虑，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利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机会，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不顾中央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毛泽东的意见，坚持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从3月至8月间，毛泽东先后6次讲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而林彪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林彪的真实意图是：由于毛泽东已表示不当国家主席，他就可以取而代之。正如叶群在1970年7月对吴法宪所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因此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并非仅仅是文字之争，而是一场斗争的前奏。这时，受江青等人压制的陈伯达倒向林彪集团一边，支持吴法宪并替林彪到处游说，扩大影响。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会议第一天，林彪抢先在全体会上发表讲话。他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换了一种说法，他说：“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林彪的讲话对其亲信来说是一个号令。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由陈伯达编选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在发言中，他们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大讲“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这时，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他们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当晚，华北组发出载有陈伯达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引起会议的强烈反响，从而造成了一场混乱。

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为毛泽东所察觉。8月25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随后，全会开展了对陈伯达的批判，同时也批评了吴法宪等人，挫败了林彪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

9月6日，会议恢复原定议程，讨论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

进行必要筹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当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经过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集团篡夺最高权力阴谋的斗争，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武装政变及其覆灭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

197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出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要求知情人检举和揭发他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首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和耐心的挽救工作。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陆军三十八军委员会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12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他一方面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对“四个伟大”的批评实际上间接地批评了林彪。1971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的批语中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在一些文件上作出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即他自称的“甩石头”。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0 年 12 月 22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这在当时被称为“挖墙角”。会议最后由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

1971 年 1 月 24 日，华北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的开展。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批评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黄、吴、叶、李、邱等在林彪的支持下，在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在华北会议后，经毛泽东亲自指出，黄、吴、叶、李、邱才在 3 月勉强作了检讨。为了打破林彪集团对军委办事组的控制，4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这在当时叫“掺沙子”。4 月 15 日至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要求他们用实际行动改正

“四个伟大”指林彪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称呼毛泽东。1966 年 8 月 31 日，在接见来京的红卫兵和群众大会上，林彪第一次使用“四个伟大”。从此“四个伟大”风靡全国。

错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势力的同时，也希望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是，林彪等人毫无悔改之意，他们加紧进行阴谋活动，决心铤而走险，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来达到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目的。

早在 1969 年 10 月，林彪授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下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一切。这样林彪便亲自掌握和控制了空军。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曾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10 月，以林立果为头组成所谓“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秘密文件。1971 年 2 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由林立果于 3 月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秘密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571 工程”纪要》（“571”即武起义的谐音，意为武装起义）。这个纪要分析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形势，规定了实施政变的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B—52”是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军事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者制造“割据局面”。他们阴谋杀害毛泽东，或者在广州另立中央。

正当“联合舰队”成员加紧进行武装政变的准备工作之时。1971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地巡视，沿途同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他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责林彪等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认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毛泽东还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并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他已不再把林彪看作接班人，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1971 年 9 月 5 日、6 日，林彪在北戴河接到有关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密报以后，连夜加紧策划，决定对南巡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立即发动武装政变。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 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份手令加紧部署。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由江腾蛟指挥采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的专列，杀害毛泽东。

9 月 3 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9 月 10 日下午，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到达上海。在专列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后，毛泽东于 9 月 11 日下午命令专列离开上海，昼夜兼程，于 12 日下午平安抵达北京。林彪集团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计划宣告破产。林彪集团在阴谋谋杀毛泽东的同时，还准备带领黄、吴、叶、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当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周宇驰等人安排了 8 架飞机，准备南逃广州时用。同时派 256 号三叉戟飞机送林立果到山海关，以供林彪、叶群使用。12 日晚，周恩来得悉 256 号飞机私自调往山海关后，

立即向吴法宪查问并下令这架飞机没有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四人联合下达的命令不准起飞。周恩来采取的这些措施，打乱了林彪等人南逃的计划。12日深夜，林彪判断南逃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决定北叛，立即飞往苏联。

13日零时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256号飞机在没有做好启航准备的情况下仓皇起飞，外逃叛国，在飞经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时飞机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这就是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它给野心家制造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失望之中。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逐步从“文化大革命”极“左”的狂热中觉醒，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持厌倦、怀疑、责难和抵制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的持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江青集团的覆灭

一、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一度纠正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作出了努力，使各方面工作出现好转。

为了清查林彪集团的罪行，消除和减少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71年9月18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高级干部通报了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情况。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9月日以后10天内拒不向中央揭发交代问题，而且销毁罪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逐级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基层传达。从1971年12月11日至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算林彪的两面派手法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结合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加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党的领导的教育等。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教育一些犯错误的人，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林彪一伙极“左”的真面目，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下，对林彪集团罪行的批判不可能深入彻底。

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也吸取了某些教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他在周恩来的密切协助下，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平了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4月上旬，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下令把中央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从各地“五七”干校调回北京。4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以后许多老干部或其家属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查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在一些信件上作了批示。周恩来根据批示，加紧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安置了工作。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1972年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的招待会。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发林彪的信上写了批语，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1973

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尤、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7月，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9月29日为贺尤平反并恢复名誉。上述一系列做法在国内产生重大反响，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鉴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对各方面实际工作的破坏，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希望各方面工作走入正轨。这一努力是1967年2月前后老一辈革命家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继续。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许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情况，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他鼓励各级干部要敢于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指示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意见写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和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的某些措施，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时期，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他采取措施纠正了某些具体错误，对批判极“左”思潮起初也是支持的。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因而又采取种种措施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攻击一切妨碍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们此时竭力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人民日报》3篇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工人群众的名义写文章攻击3篇文章是大毒草，并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势必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最终不能容忍对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批判。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左”，他断定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只准批极右，不准批极“左”。这样，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被迫中断，而江青一伙愈加得势，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二、国民经济的回升与畸形发展

1968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基层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1969年4月又召开了中共九大，国内政治形势稍

趋稳定，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动乱已经十分厌恶，和苏联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等原因，从上到下都有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搞好生产的愿望。

1968年底，周恩来指示即刻着手编制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1969年2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下达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个《计划纲要（草稿）》由于是临时班子仓促起草的，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所以比较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难于实施，但它毕竟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的状态，使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下，1969年的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并缓慢地回升。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了7.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同1966年相比，粮食为98.6%；棉花为89%；钢为87%；原煤增长5.6%；原油增长49.4%；发电量增长13.9%，1969年财政收入虽比上年增加45.8%，但仍未达到1966年水平。

上述情况说明1969年主要经济指标除少数外，大部分仍然相当于或低于1966年的水平。如果与计划指标相比，除原油外，几乎全部未能完成计划。这表明1969年的经济回升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和解决。

进入1970年，国务院于2月15日至3月21日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经济形势初见好转过于乐观，会议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要求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会议规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1969年增长17%，基建投资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6500亿斤；钢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煤达到4亿吨—4.3亿吨等。

为了完成1970年度计划指标，使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本年度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根据战备的要求，优先照顾和重点安排内地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中，内地建设占55%。（二）稳定落实农村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提出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发展的措施，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搞好农业机械化等。（三）大力支持地方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和建立地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将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有的实行双重领导。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政策措施，1970年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大部分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1966年的指标。

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1965年5月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

1970年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依然持续，“左”的错误还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在这一年的经济工作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基建规模偏大，积累率过高，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内地建设过急过快，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企业下放一哄而下，缺乏统一组织指导，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等等。

1971年至1975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四五”计划强调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四五”计划的第一年1971年的经济计划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制定过高的指标，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建设。这样造成这一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供应紧张，货币发行量增加，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周恩来发现了“三个突破”的问题。在1971年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起草了《会议纪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若干措施，要求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但张春桥借口《纪要》长了，不好发，阻止文件下发。这样，到1972年底，虽然采取了措施，但“三个突破”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相反还有所发展。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除了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国家库存，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一个窟窿”。

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的具体措施，提出调整“四五”计划过高的计划指标，大力加强农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精简职工人数。

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主要工业和农业产品都有所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成为这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在长期动乱的局面下，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勤奋工作，使我国的工业交通、重点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严重干扰外交工作，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从1968年起，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主管外交工作，并较快地纠正了偏差，消除了不正常状态，外交工作才走上正轨。从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的步骤实现了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一）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中国和苏联存在边界问题，但在两国友好时期，边界地区是安宁的。

60年代初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开始挑起边界事件。1964年2月至8月，在中国倡议下，中苏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但谈判未取得结果。1964年10月以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大量增兵中苏边界，不断进行边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同时派兵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联出动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两次侵入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名。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主张两国的“官方代表在最近期间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对此，中国政府于5月24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并申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这是软弱可欺，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强战备，一方面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与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达成谅解，认为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10月，双方在北京恢复了边界谈判。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先是反对讨论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后虽同意讨论这一问题，却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而这个问题是柯西金在北京与周恩来会晤时同意过的。这样，中苏边界谈判历时近9年，未取得任何结果。

从60年代以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向外扩张。中国始终坚持在两国关系和整个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策，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阻挠，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6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贯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注意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中国在国际上得到很多的支持。同时，中国注重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

1964年1月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内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智利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在联合国各成员国中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为了继续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在1971年8月2日抛出“双重代表权”方案，即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台湾当局的代表权。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

1971年9月22日，美国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次关键的程序性表决中遭到失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决定把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前讨论。10月25日，经过激烈的辩论，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

得的巨大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及影响。

（三）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建交进入 70 年代，国际形势在战后 20 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结束长达 20 多年的敌视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美国方面来看，在美苏两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占有优势，而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陷入困境，已处于劣势。1969 年 1 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主张利用世界上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以维持均势，从而确保美国的霸主地位。他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抗衡苏联，并谋求从越南脱身。从中国方面来看，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咄咄逼人。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同时，为了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为了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尼克松上任伊始，指示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 年 7 月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1970 年 1 月经美方首先提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向中国转达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信息。

中国对美国的表示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7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并同他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12 月 18 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 年 4 月，中国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7 月 9 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来到北京。7 月 16 日（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于 1972 年 5 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访问中国到达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尼克松。接着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

28 日，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有：双方同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双方还认为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和进行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并同意为此提供便利。

《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际，日本国内各阶层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猛增。

1972 年 7 月，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表示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

要任务。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在大平正芳外相陪同下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接见，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日，日本方面宣布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一页。

70年代初以来，中国同西欧（包括北欧和南欧）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1969年前，西欧国家中，只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和法国先后同中国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没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4个小国外，中国同所有西欧国家建立或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70年代初，中国还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同上述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

（四）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显著成就，是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从1970年到1979年，中国同亚非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三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的同时，也注意维护和促进第三世界各国间彼此的团结，支持各国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多少年来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70年代前期，毛泽东根据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指出：“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又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构想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它强调在世界反对霸权的斗争中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并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策略，对于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需要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和补充工作，确定今后的任务和方针政策。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中共十大的召开作准备。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十大的有关文件。

7月10日，中央专案组提出《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

告》。报告概述了林彪集团的罪行，分析了林彪叛党叛国的历史根源。中央专案组建议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关于九大路线；（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三）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报告批判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露了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报告提出当前要抓紧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搞好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报告还强调：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删除了有关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规定，还删去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样的话。但又增加了一些错误内容：党章的总纲中规定“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敢于反潮流”精神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写入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和党的基层组织任务中把“批判修正主义”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作为第一条，放在重要位置。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124名。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一些野心家、投机分子和帮派分子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江青集团在中央领

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中共十大继续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使“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因林彪集团被粉碎而得到纠正，相反却延续下去。江青集团在十大上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继续带来了灾难。

五、“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动乱的再起和国民经济的再次恶化

林彪事件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许多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持厌倦、怀疑、观望和抵制的态度。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虽然被打断，但很明显这种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所以采取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感到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同中国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的斗争有相似之处，批判林彪联系批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并肯定法家的历史作用，可以达到深入挖掘林彪集团的思想根源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此，在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的问题。

林彪叛国以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和孟子某些言论的材料，上报毛泽东。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明确表示“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

21日，他接见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江青一伙在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后，通过直接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修正主义回潮”，同时指令两校的“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1月18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于是在全国展开。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权势，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

1974年1月24日，江青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大会。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在会上俨然以“批林批孔”的领导者自居，和姚文元、迟群、谢静

宜等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大会前后，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以个人名义给军队和地方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进行夺权活动。

江青集回利用控制宣传舆论大权之机，操纵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池恒”等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影射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是“搞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这些文章大批“周公”、“宰相”，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6月14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大儒”。随后，江青又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江青还别有用心地授意写作班子写文章吹捧吕后、武则天，为其篡权制造舆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借机大反所谓“复辟回潮”。1973年12月，江青一伙利用编造的北京市的一个小学生对教师不满的日记大作文章，把这个小学生吹捧为“反潮流典型”，掀起批“师道尊严”、“反右倾回潮”的浪潮。1974年1月，他们又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女生因未答完英语试卷遭老师批评而自杀的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在教育领域大批“右倾回潮”。在文艺方面，把晋剧《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把宣传教师是辛勤的园丁的湘剧《园丁之歌》说成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张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全国动乱的局而再次出现。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的组织，拉山头，打派仗，搞打砸抢，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各级领导班子再次瘫痪。历史科学领域受影响最深，整个中国历史被歪曲成“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凡是历史的进步都是法家的功劳，凡是历史的倒退都是儒家的罪过。一切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都被封为法家，在历史上的反面人物都是儒家。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如“尊老抚幼”、“尊师爱生”等统统被否定，代之以“斗争哲学”，培养了一些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的情绪，使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同志关系遭到践踏，使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准大大降低。

“批林批孔”运动还使刚刚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人喊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使得一些企业领导不敢大胆抓生产，因此导致工业生产的下降。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00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0.4%，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2%。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此时却不愿再次出现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为了制止混乱的局面，扭转生产下降的势头，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许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组织和搞串连活动。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达到篡权的图谋有所觉察，对他们进

行了多次批评。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他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六、“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失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实际上并未停止阴谋活动。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人帮”认为四届人大是进行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妄图利用这次会议由他们出面组阁，窃取更多的权力。

1974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后病情加重，住院治疗。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工作。“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伺机对邓小平进行攻击。他们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故意制造事端，对邓小平进行围攻。邓小平理直气壮，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四人帮”经过密谋，于10月18日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派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造谣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四人帮”组阁的阴谋。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20日，毛泽东又让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再次提出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工作的支持，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2864名。代表不是自下而上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而通过所谓“民主协商”产生出来的。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朱德主持了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抱病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展示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一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报告还提出：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王的方针；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张春桥向大会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把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并把这条基本路线列入大会通过的宪法的总纲中。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部宪法还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国家保障群众运用这种新形式”。这样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 22 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 12 人为副总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的确定，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虽然张春桥等人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七、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开展全面整顿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方面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有力配合下，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一）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生活。为了解决这一影响大局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于 2 月 25 日至 3 月 8 日召开了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两步走的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是大错特错。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解决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军工作组，会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调整和充实了问题严重的铁路局的领导机构，使铁路运输状况在一个多月内迅速好转。到 4 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

路局都疏通了，全国 20 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为提高。

（二）工业生产方面。铁路的整顿工作带动了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 年的前 4 个月，全国钢铁欠产达 195 万吨。5 月 8 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29 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的现象；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特别注意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明显回升。其它工业部门在钢铁工业整顿的带动下，也同时进行整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经济形势日渐好转。1975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自 3 月份以来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等在 5、6 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

（三）农业方面。1975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9 日，国务院先后在山西昔阳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着重强调搞好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邓小平还强调整顿工作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认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政治任务。会议要求到 1980 年，全国 1/3 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会议积极的方面在于使全党和全国都重视农业，大抓农业。会后，各地区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会议宣传的大寨所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四）军队工作方面。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整顿问题。邓小平于 7 月 14 日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根据会议精神，压缩了军队的定额，安排了一些军官转业到地方，并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这样稳定和巩固了军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五）科学技术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大部分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因此，科技工作急需整顿。7 月，中共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并听取了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于 9 月 26 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提纲强调科技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要充实加强科技队伍；加强理论研究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强调要解决科研人员生活中的困难，不懂行、不热心、有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要办好教育，培养科技事业的后备人才。这个文件在当时未能正式下除以上几方面整顿工作外，文艺、教育工作也进行了整顿。7 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邓小平利用这个时机开始抓文艺工

作整顿，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一些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作品，如电影《创业》、《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又重新公演。教育工作方面，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着手整顿教育。他在不同场合发表许多讲话，针对“四人帮”破坏教育工作，提出“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一讲就是两个，一个是十七年，一个是七二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从10月起，在周荣鑫主持下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报请中央批准后全面开始教育的整顿。

在全面整顿过程中，为了清除阻碍整顿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思想理论问题上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

10月中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文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文章还抨击了“四人帮”散布的“左”倾观点，提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此外，邓小平在9月27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他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还强调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罪行。

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全国的形势日趋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实质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对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全面整顿取得的成绩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鼓舞，他们又重新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的。但是，毛泽东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支持整顿的，所以一旦整顿工作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就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并从理论上作进一步地思考，加上“四人帮”顽固地阻挠、抗拒和反对，使整顿工作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在长沙又同周恩来谈及这个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说明他原有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得到进一步发挥。可以看出，他希望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办法来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这样做从理论上和根本制度上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他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泽东的谈话。由此，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掀起。

“四人帮”不甘心“组阁”失败，他们利用一切时机来达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以掌握更多权力的目的。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33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作了断章取义的引证，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四人帮”还借此运动大批所谓“经验主义”。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文中张春桥还叫嚣要全部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这时期，“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了“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和搞宗派活动。他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由邓小平主持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此后一段时间，“四人帮”的活动有所收敛，这对当时的整顿工作是有利的。

但是，“四人帮”的野心不死，他们仍在竭力寻找时机。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教师的要求，谈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姚文元闻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评论《水浒》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这样，“四人帮”策动了一场“评《水浒》运动”。这时，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宋江”、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江青在这期间到处散布“评

《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再次散布说“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她所说“架空晁盖”实际上是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后，斥责她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批评又一次抑制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自1971年冬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联络员进行联系。此时，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

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这种歪曲挑拨式的汇报，同意他的观点，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据此，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刘冰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曾于1975年8月、10月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正常现象。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认为信由邓小平转交说明“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后，率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至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他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对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决策上的错误，更猖狂地攻击邓小平，反对整顿工作。他们把整顿工作说成是“复辟”，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说成是“还乡团”，还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

公式，把四个现代化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他们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在搞“修正主义”。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人们广泛拥护。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这场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否定了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一批坚决执行正确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帮派人物和造反派头子又被任用，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使全国局势再度陷于混乱。由于这场运动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经过这场运动，人们更加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一股长期蕴藏在心中的憎恶和愤恨的情绪即将迸发出来。

九、四五运动 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9时57分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动仁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遵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1月21日和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觊觎总理职位的野心没有得逞。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他们凭借控制新闻舆论大权之机，大量压缩、砍掉有关怀念周恩来的报道和文章。更有甚者，在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他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无视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真实感情，继续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13周年的新闻稿。“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刊载这条消息时，将文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删掉。

25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中竟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北京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罪恶的痛斥。4月4日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不顾禁令来到广场的人次达200多万，敬献了2073个花圈，形成了花山人海的壮观场面。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主持下开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

认为这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会议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收走，守卫花圈的人被抓走，异常气愤。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并高唱《国际歌》。群众同部分民兵、警察、战士发生了冲突，广播宣传车被群众砸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晚上9时半，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以及5个营的卫戍部队，奉命手持木棍、铁棒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这就是“天安门事件”。

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现场报道”，诬陷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当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它反映了全国人心的向背，表达了人民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信念。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在全国又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地组织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邓”文章，继续鼓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这样做是要整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实现由他们掌权的目的。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朱德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京津。这次地震损失巨大，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震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同时各地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积极以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受灾地区。但是，“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8月下旬，“四人帮”开始将邓小平在1975年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3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组织上百篇文章进行批判。但此时这种批判已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们广泛抵制。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使人民群众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前途深为忧

十、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在毛泽东病危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8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向上海民兵发放枪支7.42万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又发放子弹600万发，炮弹1.5万多发。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擅自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中共中央的领导。“四人帮”还指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为江青上台大造舆论。9月28日，张春桥向他在上海死党传话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9月29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猖狂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痛疽。9月下旬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多次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和步骤。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9月16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公开发表。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人，实际上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信号。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在多数同志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晚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10月7日凌晨，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

决定。这个决定后由 1977 年 7 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追认。

从 10 月 7 日到 14 日，中共中央分批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乱时间最长的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粉碎“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大悲剧。在思想上，“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是非，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处泛滥，在一系列理论、政策上造成严重的混乱；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据统计，“文化大革命”10 年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迫害的共有 729511 人，其中 34800 人被迫害致死。在经济上，“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损失，10 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 5000 亿元，这相当于建国后 3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80%。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教育、科技事业遭到破坏，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在组织上，“文化大革命”全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破坏，由此造成派别林立，以帮代党，以帮代政，严重地分裂了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他们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虽遭受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作为发动和领导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他虽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对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中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正确的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第三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1976.10——1993.11）

第一节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一、揭露批判“四人帮”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真是人心大快。

“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是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江青反革命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势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顺应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其反革命帮派体系，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罪行。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三十战役进行。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为配合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分三批下发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经过广泛的调查、取证和核实，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了王、张、江、姚丑恶的历史以及销毁历史材料、迫害知情人的罪行。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集中揭露了“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理论、反革命路线及其严重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并把这一群众运动同进一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起来。中共中央还要求把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在揭批斗争中，把机关整顿好，把厂矿、企业、社队、商店、学校整顿好，把各行各业整顿好。到1978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揭批查工作基本结束。

1977年7月举行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1980年11月5日，特别检察厅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人提起公诉（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法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罪事实：

(1) 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2) 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3) 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4) 策动上海武装叛乱。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审判，至12月29日，第一、第二两个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10名主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此期间，共开庭42次，有49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审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并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是正义的判决，人民的胜利。这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对江青、张春桥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刑罚，依法改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二、“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和经济建设中的新冒进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党内外许多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正当的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共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华国锋即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继续沿用“文

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他甚至编造理由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许多老同志的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会后，许多老同志纷纷呼吁，要求中央正确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华国锋迫于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呼声，不得不考虑解决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但要求邓小平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被邓小平所拒绝。

针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于4月10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作了准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与此同时，华国锋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要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后，邓小平继续反复多次地讲“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

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也使国民经济从瘫痪、半瘫痪状态中走了出来，这是成绩。在这样的关头，本来应该用一定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但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经济建设中出现新的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5.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6页。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5.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36页。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7.21），《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9—44页。

错误，其主要原因是华国锋继续过去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针。

从 1976 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如要求在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1978 年 2 月，华国锋向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提出国务院《关于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这个规划，到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 2.5 亿吨。从 1978 年到 1985 年的八年期间，在全国形成 14 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按照十年规划，到 1985 年粮食产量要达到 8000 亿斤；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 85% 以上；按农业人口达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要建设 12 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这个十年规划纲要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指标订得过高，基建投资安排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就草率决定。这个十年规划纲要虽然只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了坏作用。

华国锋这时看到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不要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这当然是对的。但他由此出发，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结果造成 1979 和 1980 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困难局面。所以被人们称为“洋冒进”。这时的“洋冒进”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相比，虽然社会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出发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这次“洋冒进”是以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措外债为特征的。“洋冒进”发生于国民经济在十年动乱的大破坏后亟须休养生息之时，正如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洋冒进”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当然不能改善、而只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

总起来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因此这两年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

在全国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取得初步成效的形势下，为对“四人帮”作出组织处理和让邓小平等老同志及早出来工作，健全、充实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并且准备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于 1977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十一大”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当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8月12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议程有三项：（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这对于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继续揭批“四人帮”，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的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未能完成从理论和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8月19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选举结果：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十一大之后不久，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华国锋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表明华国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提法。

1978年2月、3月间，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活动。它的恢复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重要的意义。

与全国政协会议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上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四人帮”还在猖獗的1975年初产生的，提前换届显然是完全必要的。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向会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词。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飏、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等13人为副总理。

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两次会议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而担任党的主席的华国锋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原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

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四人帮”把它搞得混乱不堪，十分需要拨乱反正。现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错误倾向依然存在。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最后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这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也在若干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场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来。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他批评一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同志，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邓小平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说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下决心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写的，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文章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邓小平在长春、沈阳等地视察期间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

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五、教育和科技战线“左”倾错误的纠正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他以科教为突破口，对科学和教育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科教战线出现了完全新的面貌。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对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怎样估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得到解答，大家不满意的是在教育方面。”“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应该怎样估计，邓小平说：“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强调要“尊重教师”、“尊重人才”。

推翻所谓的“两个估计”，对长期受到“两个估计”严重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是一次大解放。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揭露了“两个估计”出笼的经过，提出“十七年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等问题，全面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否定了“两个估计”。

1977年底至1978年初，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

经过充分的筹备，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是我国科学界的一次空前盛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充分调动科

邓小平：《高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9.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123页。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8.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5—55页。

技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了。他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科技事业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是对科学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又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大会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不久，4月至5月间，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他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我们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全体代表讨论了《1978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以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在全国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学校。经国务院批准准备高等院校都恢复了原有职称，并分期分批进行了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的工作。

1978年5、6月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践踏社会主义，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并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协会也将陆续恢复工作。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它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六、放宽农村政策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

“文化大革命”在经济领域内留下的后遗症主要是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1976年，是“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破坏最严重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年只增长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7.5%的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没有完成原订计划。国家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1975年减少39亿元；财政支出806.2亿元，比1975年减支14.7亿元；1976年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由于“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同正常情况相比，工业总产值损失1000

亿元，钢少产 2800 万吨，财政少收 400 亿元。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铁路堵塞的问题。1977 年 3 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 1977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 1977 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会议还提出，要着手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比例关系不很协调的问题，要搞好企业的整顿。但是，当时对“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在经济领域内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针和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而是急于求成，要“大干快上”，继续沿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老路子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虽然如此，1977 年国民经济仍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1977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49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国民收入为 26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4.3%。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虽比上年增长 1.7%，但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 1.2%。

1977 年 11、12 月间，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长远规划问题。会议所确定的生产建设指标和奋斗目标，超出了现实的可能性，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这种高指标、大计划，助长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在 1978 年 2 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国务院关于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虽然，当时全党还没有认识“洋冒进”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已经从实际出发，寻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新途径新办法。

为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978 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方针”。5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起草的。在文章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曾与研究室负责同志作过谈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他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制度，如考核制度、奖金制度、稿费制度等，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开滦煤矿坚持按劳分配促进生产发展和黄浦港装卸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的消息报导。在农村，中共四川省委在 1977 年底全面清理、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重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1973 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这个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加快了秋种的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产到户。农民群众创造的这

些办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并在滁县、六安专区进行了试点。不到3个月，全省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4.1万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15.2%。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对农村也采取“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15%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这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试验。

1978年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农业总产值达到1459亿元，比上年增长9%。其中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比上年增产44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棉花产量达到4334万担，比上年增产236万担。工业总产值达4231亿元，比上年增长13.5%（轻工业增长10.8%，重工业增长15.6%）。其中原煤产量6.18亿吨，比上年增长12.4%；钢产量3178万吨，比上年增长33.9%。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较快增长，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对外贸易有显著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情况有所改善。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1978年，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做法，已经开始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1978年的国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二、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效益不高。四、急于引进，引进项目总规模超过了我国的承担能力和消化能力。五、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全国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六、经济效率很差。全国约有1/3的企业经营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

第二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会上，陈云发言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他提出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很大”；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陶铸等也不是叛徒，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中央专案组是文化革命时期成立的”，“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象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0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应根据这两个决定的精神，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给以重新审查，“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给以应有的批评。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到会的许多老同志还提出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重大的是非问题，要求中央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胡耀邦就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很大，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在12月13日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七·七”决定是指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1940年中组部决定是指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11.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1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认为，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应该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就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根本问题上重新恢复和确认了中共八大的正确估计，从而解决了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全会指出我们必须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切实注意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些思想，是党摆脱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影响、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还提出了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

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要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全会还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会后，中央政治局任命胡耀邦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二、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

三中全会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党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不少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诽谤毛泽东思想。有的人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政治势力相勾结。在党内有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而且直接或间接地给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 1979 年 3 月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同时，着重尖锐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回答了我国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讲话对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纠正“左”的和有的错误倾向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平反“文革”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措施。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虽已局部地进行，但进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从 1978 年 11 月中央工作会议起，到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其中“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主要有：“天安门事件”，“武汉‘七·二一’事件”，“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中宣部‘阎王殿’”，“‘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中联部和整个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全国统战工作部门“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总政‘阎王殿’”，“杨余傅事件”，“‘三家村’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等等。中共中央撤销了关于教育工作“两个估计”的文件和《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否定了以上海夺权为标志的所谓“一月革命”。中共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受迫害的党、国家、军队领导人和老干部、老同志平反，其中重要的有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谭震林、邓子恢、黄克诚、罗瑞卿、贺龙、李立三、瞿秋白等。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5 月 17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从而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冤案得到平反。

中共中央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其中主要的是，为 1955 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

分子的人平反；为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等等。

1982 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

到 1982 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有 300 多万名干部的冤假借案得到平反。

党在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的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其一，右派摘帽和错划改正。从 1959 年到 1964 年先后五批摘掉约 30 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 1978 年 11 月，全国各地摘帽工作全部完成。随后，进行错划改正工作。改正工作到 1980 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 97% 以上。

其二，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后，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土改时，给地主、富农划定成分是必要的；由于情况变化，改变他们的成分，也是必要的。

其三，从 1979 年 1 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此外，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

其四，1979 年 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规定》指出，在原工商业者中，不要具体划分谁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谁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从 1979 年起，他们填写现在的成分时，是干部就填“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的就填“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其五，1956 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是不妥当的，从 1979 年 11 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 1981 年，原 86 万工商业者中的 70 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分。

其六，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定学术和技术职称，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

其七，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推动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和文教、科技等领域积极发挥作用。

其八，1980 年到 1981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问题的会议，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中央和一些地方还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同志摘帽子。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 1979 年 6 月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

其九，党的宗教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很大摧残，公开的宗教活动几乎全部被停止。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堂庙观陆续修复和开放，宗教政策得到落实。

其十，重申党的侨务政策，保护和褒扬侨胞爱祖国、爱故乡的热情，鼓励他们为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贡献。

上述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落实，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调整国民经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党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陈云、李先念在1979年3月14日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六点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当时，李先念还说：只有解决好这个重大比例失调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开端。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指出：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比例失调，比一九六一、六二年严重得多。邓小平也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4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调整国民经济问题。李先念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当时经济战线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方针任务。他指出：多年来造成的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业和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第二，轻、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第三，燃料动力工业同其它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第四，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第五，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等。他指出：“我们这次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

李先念、陈云：《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79.3.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第69—70页。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4.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3页。

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总之，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由原订的5—6%调整为4%，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由原订的10—12%调整为8%。6、7月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作了说明。报告第一次明确宣布：在我们国家里（除台湾外），已经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但国内阶级斗争还存在。我们的方针是：承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同时承认今后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会后，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在全国正式展开。

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在开始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时，党的各级领导大多对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行动迟缓。从1979年至1980年10月近两年的时间内，调整收效不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基本建设总规模没有退下来。此外，国防战备费、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又增加了。这样，生产建设的安排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超过了国家的物力和财力，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消费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这使货币流通量接近引起经济危机的临界点。物价上涨已影响到人民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经济进行大的调整，整个经济就要发生危机。那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和职工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就会失掉，甚至会引起政局的不稳。

为了消除国民经济中潜伏的上述危险，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陈云在会上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重要讲话，他分析了经济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工作的许多重要意见，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11月28日在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和陈云上述讲话精神，赵紫阳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1981年调整工作的总的要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4.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4—139页。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求三条：一是基本上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二是基本上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三是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百分七十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但是要把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调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为了搞好调整，克服当前的困难，必须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邓小平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方向上有任何改变。为了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总之。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这都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我们的事业一定胜利。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国家计委同有关部门对198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来的6955亿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见增长速度由原来的5.5%减为3.7%。其中农业总产值由原来预计增长4%提高为5.6%，工业总产值由原来预计增长6%减为3%。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由原来的2390亿元增加到2473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8%，重工业由原来的2860亿元减为2637亿元，比上年减少1.2%。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年预计减少40%。行政管理费用由62亿元减为57亿元，减少3%。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费略有增加。

经过全党全国的努力，上述调整计划在1981年年底基本上实现了。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贯彻执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490亿元（按1980年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5%。由于农业和轻工业有较快的增长，重工业由于进行调整而使发展速度有所下降，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农业总产值达到2312亿元，比上年增长5.7%，其中粮食32502万吨，比上年增产446万吨；棉花296.8万吨，比上年增产26.1万吨。工业总产值达到5178亿元，比上年增长4.1%（轻工业增长14.1%，重工业下降4.7%），基本建设规模有所压缩，投资构成有了调整，投资效果有所提高。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8亿元，比上年减少111亿元，财政收支状况有了好转，基本上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全年财政总收入1064.3亿元，总支出1089.7亿元（包括国外借款收支），财政赤字由上年的127.5亿元减少为25.4亿元，对外经济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提高。这一

年，全国城镇共安排 820 万人就业，但是，1981 年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在大幅度紧缩支出的条件下实现的，因而是不够巩固的；二是一部分消费品的增长还赶不上人民需要的增长，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因而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三是经济效益低下的情况还没有多大改变，有的甚至还有下降。这些情况说明，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虽然有所缓和，但还没有根本消除。

1981 年以后，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取得了新的成就。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保持较快速度（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8.2%，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 7.1%）的条件下，比例关系逐渐协调。在工农业的关系上，农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年平均速度达到 7.9%，这是 30 年中少有的。在工业内部，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高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基本上扭转了过去重工业增长过快的问题，在农业内部也开始扭转了长时期里“以粮为纲”、片面发展的问题。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有改善，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

1982 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 270 元，比 1978 年增加 1 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 500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 1978 年增长 38.3%。

四、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1979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决定》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此进行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各地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逐步地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开始时，大部分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当时党内外不少干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疑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离开了社会主义。

198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座谈会纪要。《纪要》强调要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同时也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

1981 年 12 月，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全国农村已有 90% 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

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更加适合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和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所以，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纪要》还指出：“不论实行何种类型的承包责任制，土地的承包必须力求合理”，“严禁在承包土地上盖房、葬坟、起土。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否则，集体有权收回；社员无力经营或转营他业时应退还集体。”《纪要》还强调：“要把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当前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紧紧跟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它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远比农村改革复杂。城市改革是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1978年10月，四川省首先选择了6个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

1979年四川省试点的工业企业扩大到100个。根据四川省试点的经验，全国于1979年5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扩大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等5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试点。

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发展到6600个，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逐步推开了，到1982年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只是城市改革的单项改革，而没有城市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企业自主权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落实。这样，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湖北沙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2年3月又批准在江苏常州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但是，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条块分割等矛盾不如大城市突出，为此，在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在四川重庆进行大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在3个试点城市的带动下，其它城市也积极进行了改革的探索。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94页。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994—999页。

五、加强党的建设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在对城乡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吸收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恢复党的“八大”决定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中央书记处。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万里、王任重、姚依林、彭冲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这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改变个人交班、接班，实行集体接班的重大决策。全会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为贯彻五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又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主要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十年动乱期间，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纪律松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还滋生了腐败现象。必须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举行首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进一步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问题。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重申“文革”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章程。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发这一规定时，强调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共十二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力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陈云在同年11月中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尖锐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党风建设。

消除个人崇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后，这个方针的执行是有成绩的，但是仍存在一些过于突出个人的现象。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于1980年7月30日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

着手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其核心则是权力过分集中。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980年8、9月间，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等问题。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建议，通过决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大会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大会决定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增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副委员长，杨尚昆兼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这次会议，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方面，又迈出了一步。

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在干部制度方面迈出改革的步伐。中央强调，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就是革命化，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是党为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在稳定地向前发展中保持路线政策的连续性而采取的一项有战略意义的步骤。

六、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和政策革命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国防部长徐向前也发表声明，从1979年1月1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同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时，进一

步阐述了党对台湾的政策。他说：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他指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可以采取独特的模式，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即使武力统一，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他说，搞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是赞成的，愿意的。中国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 and 人民来决定。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统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现在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这个希望，台湾当局完成不了这件事情。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2）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9）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九条方针的提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10月9日，在北京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作重要讲话，以共产党负责人身份邀请蒋经国等先生回大陆和故乡看看。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落实了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亲属的政策。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4237名，全都宽大释放，并给予政治权利，作了妥善安置。1981年12月，全国台湾同胞首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就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都被迫停止了活动。

1979年6、7月间，在北京召开五届政协二次会议。邓小平致开幕词，他指出：建国三十年来各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

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1.93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04—906页。

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1979年10月，我国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分别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各自的章程，各自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各民主党派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积极开展工作。

经过几年功夫，被林彪、“四人帮”摧残的统一战线，开始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统一战线范围扩大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增强了。

1980年8月28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1981年12月至1982年1月，全国统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纪要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统一战线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共产党还存在，就要坚持党与非党的合作，坚持统一战线。”“今后，我们党和党外朋友的关系，应当成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会议强调全党都要重视统战工作，继续肃清“左”的影响，防止和克服关门主义，尽快切实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平等地位，使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七、中美正式建交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在对外工作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打开了新的局面。

1977年8、9月间，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10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访问日本，23日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对日本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次历史性的友好访问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正式生效，使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7页。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1982.1.2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75—1085页。

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且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自1978年起越南当局掀起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运动，驱赶大批华侨回国。中越关系恶化，我国被迫决定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之后，越军不断侵犯我国领土，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毁我村庄，杀我军民，破坏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制造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2月17日，我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奋起自卫反击。从2月17日起连续打下了谅山等20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在这些地区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3月5日，新华社奉我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宣布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已达到预期目的，从即日起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并且再次建议中越双方迅速举行谈判。3月16日，边防部队全部撤回我国境内。这次反击战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1979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此条约是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同年4月11日生效的，将于1980年4月11日期满。

1980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对我国进行访问。中意两党恢复关系。之后，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因为拨乱反正，既是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是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纠正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彻底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但是这样做，又势必涉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问题。而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197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建国以后的历史进行

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1980.5.3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56—457页。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3.30），《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9页。

了初步的总结。从同年 11 月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开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从 1980 年 3 月到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了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

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三条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也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决议草稿先后经中央书记处、党内 4000 余名负责干部、50 余名老同志、中央政治局数次讨论修改，广泛集中党内外正确意见，使草稿日臻完善和成熟。

1980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对《决议》讨论稿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并要求调整他担任的职务。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且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决定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同时，决定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在过去的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建议六中全会继续选举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对《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

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简略地回顾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下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论述，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作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55—257 页。

为历史伟大转折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五年，并作出基本估计。《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 124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党的领导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上发生过主观主义的偏差，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或忽视、否认成就及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都是错误的。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的内容（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四、关于政策和策略；五、关于思想工作和文化工作；六、关于党的建设）以及贯串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

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决议》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这样一个强国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是：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使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并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三中全会之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全会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第三节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的提出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全国3965万多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和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致开幕词。开幕词回顾了党的历史，论述了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他说：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他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还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一）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报告回顾了过去六年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战斗历程，对比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满怀信心地宣告了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胜利实现。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0—373页。

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指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 年的 7100 亿增加到 2000 年的 2.8 万亿左右。实现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就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报告还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报告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报告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报告最后强调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审议和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 1977 年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还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大会确定，从 1983 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 210 名，候补中央委员 138 名，组成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同时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72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32 人。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机关。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

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在党的十二大后两月，1982年11月至12月间在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叶剑英主持开幕大会。

彭真受叶剑英主任委员的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说，这次宪法的修改、讨论工作前后进行了两年之久，是做得相当认真、慎重和周到的。1980年9月10日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于1982年2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这个讨论稿经中央各方面各部门负责人的多次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支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在全国讨论基础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又作了一些修改，并于11月23日通过，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宪法修改草案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宪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彭真就宪法修改草案的基本内容，联系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对六个问题作了说明：

- (1) 关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2)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3)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4) 关于国家机构；
- (5) 关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6) 关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个宪法修改草案12月4日正式通过。新宪法有序言、四章138条。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新宪法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

赵紫阳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六五”计划把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具体化了，是一个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规划。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710亿元，比1980年的7159亿元增加1551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由2187亿元增加到2660亿元，工业总产值由4972亿元增加到6050亿元，都是平均每年递增4%，在

执行中争取达到 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 5%，重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 3%。到 1985 年，全国粮食产量计划达到 36000 万吨，比 1980 年增长 12.3%；原煤 7 亿吨，增长 12.9%；钢 3900 万吨，增长 5.1%。“六五”计划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安排 2300 亿元。“六五”计划安排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 15.9%。“六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等决议。

1983 年 6 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力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乡镇企业的兴起

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并确定发展农业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在 1983 年 1 月 2 日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农业发展规划、农村发展道路、稳定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及农村领导体制等 14 个问题作了规定。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一）稳定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的体制。文件说：稳定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力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键是，通过承包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文件指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在政社分设后，基层政权组织，依照宪法建立。（二）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走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道路。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只有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根据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正确方针，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调整购销政策。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实现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商业经济形式并存，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总之，“就是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强调必须根据党的十二大的战略部署,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在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的同时,要大大加强和改进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当前,要进行一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两不变(公有制、责任制长期不变)、三兼顾(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教育。要使“一要吃、二要建设”的思想深入人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

上述政策经过一年的试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村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1983年农业总产值3121亿元,比上年增长9.5%,超过计划增长4%的指标;扣除农村队办工业产值368亿元,比上年增长7.9%。粮食产量38728万吨,比去年增长9.2%;棉花463.7万吨,比去年增长28.9%。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较快,加速了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农民生活有较大改善。

为了发展农村已经开创的新局面,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实践证明中共中央1983年1号文件所提出的基本目标、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央决定把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农村工作的正式文件,继续贯彻执行。《通知》指出:“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通知》对农村经济政策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应当积极支持;供销社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下去,要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信用社要进行改革,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继续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改善农副产品收购办法;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额外负担;……等等,总之,要继续放宽政策,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商品生产。同时,《通知》指出,党在农村的政策越放宽,商品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是我们党的长期战略方针。

继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之后,2月2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国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营社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2年12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52—269页。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1983年1月20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70—280页。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24—438页。

会急需的行业，农村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由于贯彻了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的方针，1984年农业生产继续大幅度增长。1984年农业总产值（包括村办工业）为3612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大大超过计划规定4%的速度。扣除村（队）办工业，农业总产值为3062亿元，比上年增长9.9%。粮食产量40712万吨，比上年增长5.1%；棉花607.7万吨，比上年增长31.1%。农村多种经营日益扩大，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农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到1984年，全国已有99.96%的生产队实行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在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全国出现了2482万个专业户和重点户（其中专业户42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3%），占全国农户的13.6%，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

从1982年之后，农村实行政社分设，恢复农村政权组织。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业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2223亿元增加到1986年的394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达10%。粮食的年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1986年的3.9亿吨。棉花的年生产量也由1978年的216.7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354万吨。

农村改革的另一个大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显示出它特有的生命力。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乡镇企业要在发展方向上给予积极引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兴办，不仅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在提供财政收入、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1984年3月1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39—441页。

出口创汇、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城南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系统地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二）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总之，我国的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三）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决定》指出，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必须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系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价格体系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我们要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四）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

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五）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同时，在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决定》还指出，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六）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技术交流，《决定》还强调，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到 1987 年（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的那一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

1987 年同改革前的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 77.6% 下降到 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 22.4% 上升到 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 5.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 54.6% 下降到 38.7%，集体商业由 43.3% 下降为 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 2.1% 上升到 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 15 万人增加到 569 万人。据 1987 年 6 月底统计，我国已批准建立的“三资”企业 8516 家，协议合同外资金额达 171.76 亿美元。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到 1987 年，全国已有 80% 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1987 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 120 种减少到 60 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40% 下降到 17%，国家统配物资由 259 种减少到 26 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 188 种减少到 23 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 76.6% 下降到 31.2%，由银行筹集的从 23.4% 上升到 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第四，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从 1979 年到 1987 年的九年里，价格改革是按照“调放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就是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九年来价格改革的主要情况：

（1）农副产品的价格改革。1979 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粮油统购价格提高 20%，超购加价由 30% 上升为 50%，棉花统购价格提高 15%，超购加价 30%，生猪、鲜蛋收购价格提高 26%。1980 年又对少数产品的价格作了调整，如棉花统购价又提高了 10%。

1979 年 11 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零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 30% 左右，同时给予居民以物价补贴。

1985 年，粮、棉实行合同收购制，价格改为合同价。合同外收购，是参照市场价格，由国家与农民协商确定。这一年还放开了肉、禽、蛋、鱼、蔬菜等副食品的价格。这次放开价格，在大中城市物价上涨的幅度较大。这次价格放开也给居民以物价补贴。

(2) 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1979 年后，原材料价格改革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部分产品价格；二是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按市场价出售。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双轨制”。实际上，一种生产资料往往有国家定价、地方定价和市场交易价等多种价格。

(3) 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有升有降地调整了消费工业品销售价格，同时逐步放开小商品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定价。(4) 交通运输和旅游服务收费也作了局部调整，通过价格改革改变了单一的国家定价方式。我国的价格形式已从基本上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价格改革，缩小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比价)、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市场供应。几年来的价格改革存在问题也不少，主要是物价上涨过猛，要把我国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五，改革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

1985 年 1 月 5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 1985 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

1986 年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探索，明确了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政策范围内，把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分配形式和办法。1985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三部分。1986 年 9 月，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对劳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企业新招收的工人开始实行合同制。

此外，在财政、金融、税收、商业流通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虽然在着重强调放开搞活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是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积极的转变。

四、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沿海经济特区的飞速发展

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

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初，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邓小平考察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3月，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到1984年底，全国共对外开放99个城市、130多个边境贸易站口。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1985年以前，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主要进行以创建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1986年起，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1985年8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1986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又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下放就不怵，不存在收的问题。”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同日，还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在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海南经济特区是我国第五个经济特区，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主要“特”在三十方面：

(1) 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

(2) 建立多元化经济所有制结构；(3) 对外交往自由。

1990年1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央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成为九十年代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浦东新区就是“新”在把扩大开放和发挥上海的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开发浦东新区这项宏大的跨世纪开发工程，按照总体规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八五”期间为开发起步阶段；第二步，“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第三步，2000年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

从1980—199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是探索和开拓的十年，也是进步和发展的十年。特区建设取

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1983.7.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页。

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984.2.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1—52页。

邓小平，《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1985.8.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3页。

邓小平：《视察天津时的谈话》（1986.8.19—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5页。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年来，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286.85 亿元，新开发土地面积近 80 平方公里，兴建了一批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到 1989 年底，累计建成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4178 个，占全国外商投资项目的 26%；实际利用外资 31.2 亿美元，占全国的 25.7%，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目前已占深圳、汕头特区工业总产值的 63% 以上，厦门已接近一半，珠海也达 30%。1989 年深圳等四个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 227.17 亿元，比建特区之初增长 14.6 倍，平均年递增率为 32%；已建成投产的工业企业达 3000 余家，特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办特区之初的 550 元增长到 3000 元左右。据统计 1989 年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外贸出口总值达 37 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9%；1990 年前三个季度，出口额达 55.5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4%，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特区生产的产品已有 60% 用于出口，出口商品达 800 多种，并涌现出近百家出口创汇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外向型企业。

深圳，昔日的边陲荒滩小镇，如今已是一座新型外向型的现代化城市。深圳经济产生了飞跃。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生产总值、预算内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以 48.3%、24.9%、69.2%、59.8% 高速递增，1989 年分别达到 97.8 亿、5600 元、214.5 亿、18.77 亿元。年累计完成基建投资 182.53 亿元。竣工面积 2206 万平方米。开发新城区 61 平方公里，能源、交通、电讯、供水、排污等建设初具规模。工业产值、出口总值平均每年以 69.2%、725% 递增，1989 年分别达到 116 亿元、21.74 亿美元。十年来，全市共与外商签订各种协议合同 6922 项，协议投资 55.9 亿美元，实际投资 27.9 亿美元。三资企业 2585 家，“三来一补”企业 5000 多家，内联企业 3900 多家，形成了深圳外向型经济格局，经过十年的建设，深圳工业出口产值已达 6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 58.4%；出口的工业产品已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73%，其中，深圳产品在出口总产值所占比例已达 63%。

珠海经济特区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初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昔日经济落后的边陲渔镇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再经十年努力，到 2000 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81 年 11 月，汕头经济特区创建时，面积仅为 1.6 平方公里，切成 5 小块逐片开发，昔日的荒滩、沙丘、烂泥塘，已初步建成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综合性外向型新城区，现有 6 个工业区和 5 个商业住宅综合区，工业产值从 1982 年的 40 万上升到 1991 年的 35 亿元。特区自产产品的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 70% 以上，外汇基本平衡。三资企业产品 80% 出口。已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设厂，产值约占特区工业产值的 70%。从 1991 年 11 月 1 日起，汕头特区正式扩大到全市（234 平方公里）。

厦门是我国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厦门经济特区建立十年来，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艰苦努力，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商和港台客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上千家新企业办起来了，成群的高楼大厦建起来了，商业贸易繁荣起来了，初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对带动闽南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推动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促进祖国统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对外政策的调整

为了实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祖国大统一，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有创造性的方针。

关于“一国两制”的设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从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

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谈话中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即九条声明），虽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已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法律效力。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题。（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

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6.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

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2.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页。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6.22、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59页。

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鉴于两岸的现实状况，中国政府主张在实现统一之前，双方按照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方针，然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在采取何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承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块总面积为 1076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英国在十九世纪通过同清政府签订的三十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强行割占和租借去的。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英国对香港的永久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恢复对香港的主权，是需要同英国政府谈判的，这是一个外交问题。在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后，国家对香港地区实行什么政策，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国两制”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 1997 年的日益迫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 1983 年 6 月，双方主要就原则问题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 1983 年 7 月至 1984 年 9 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 9 月 24 日会见她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

见《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1993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

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但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建议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題。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4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1983年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从1983年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些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日，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是行得通的”，“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继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政府于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同时，还作出使澳门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安排。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

“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对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15页。

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12.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103页。

而且对解决国际上类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国际争端，同样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邓小平在 1984 年 2 月 22 日说：我们提出台湾和香港问题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侍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

6 月 22、23 日，他又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邓小平在 1980 年初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八十年代国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为党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新的思路。

以后，邓小平在同外国客人的谈话和其他场合，反复说明，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危险的观点，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点变化。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1987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6 月 4 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根据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下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结论。1987 年 5 月 12 日，他在同西欧客人的谈话中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量的变化，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对外事务方针的一个出发点。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估量是正确的。

说战争可以避免，这是说世界战争；说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这是说需要一切和平的力量去努力争取，实际上在世界上局部的战争每年都在发生。为了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贯方针。

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顺从任何外国的指挥棒。在新时期，独立自主的政策具体地表现

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1984.2.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9 页。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6.22、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9 页。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1.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05 页。

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5.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57 页。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3.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05 页。

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1987.5.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3 页。

为不结盟政策。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同外国党的关系。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要遵循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范围内，不仅改善和加强了同一些党已有的友好关系，而且恢复了同一些党已经中断的关系，并同一些党建立了新的关系，根据四项原则，本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互相了解和合作的精神，我党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友好关系，我党还同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友好进步的政党进行了交往，发展了关系。到199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二百七十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

中共十二大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和改善了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我国领导人出访了日、美、英、法、西德等许多国家。金日成、齐奥塞斯库、里根、密特朗、撒切尔夫人、中曾根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来我国访问。中国和第三世界各国向来保持着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解决南北问题要靠南北对话，同时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

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发展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按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共中央建议“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

进一步的改善，到 1990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 16000 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 11000 亿元。在这五年中，我国财政总收入将达到 9000 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增长 40% 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将新增 5000 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新增额多 60%。我国人民的消费将由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过渡。“七五”期间要求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7% 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7% 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7%。

会议增选中央委员 56 人，候补中央委员 35 人，中顾委委员 56 人，中纪委委员 31 人。

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了四点意见：（一）关于形势和改革；（二）关于“七五”计划；（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四）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说，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思想政治工作 and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他说，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他提出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1985 年 9 月 24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 22 人组成。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全会增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 11 人组成，胡耀邦任总书记。同日，召开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国务院对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综合平衡，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 年 4 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七五”计划规定，1990 年工农业总产值，按照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 16770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38%，平均每年增长 6.7%；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按照 1985 年价格计算，达到 11170 亿元。比 1985 年增长 44%，平均每年增长 7.5%；1990 年国民收入生产额达到 9350 亿元，

比 1985 年增长 38%，平均每年增长 6.7%；1990 年全国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到 517 元，平均每年增长 5%。1990 年，粮食产量达到 42500—45000 万吨、棉花 425 万吨、钢 5500 万—5800 万吨、煤炭 10 亿吨、电力 5500 亿度、原油 1.5 亿吨。“七五”计划的完成，将使我国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七、整党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中共十二大的决定，1983 年 10 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全党 4000 万党员（其中有 900 多万干部），近 250 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都要无例外地积极参加整党。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

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又处于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整党，党内外群众必然会深切关注并寄予很高期望，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事前难以完全估计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这次整党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对整党不重视。他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这更使全面完成整党任务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次整党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区、市一级单位以及解放军各大单位；第二期是地、县两级单位；第三期主要是农村的区、乡、村。历时三年半，到 1987 年 5 月基本结束。经过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改变，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据统计，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的有 33896 人，不予登记的有 90069 人，缓期登记的有 145456 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党内受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 184071 人。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

中共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一般他说，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殊他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

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3月28日，他又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决议》还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的考验。《决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五讲四美三热爱，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2页。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1.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

邓小平：《拿事实来说话》（1986.3.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6页。

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尖锐地揭露了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混乱现象。他说，“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部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他说，“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有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他说：“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针对这次全会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在全会上发言，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他还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但是，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

这次学潮直接引发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10.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8页。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9.2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1—182页。

机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党和政府对闹事学生采取正面教育、积极疏导的方法。由于学潮波及不少城市，有的地方在学生游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堵塞公共交通，严重妨碍沿途各单位、居民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现象，还发生了少数人趁机打砸抢、污辱妇女、破坏社会治安的严重事件，在有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公开呼喊反对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事实表明，确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煽风点火，企图把青年学生推向同人民政府对抗的方向，蓄谋扩大事端，使青年人成为实现他们卑劣目的牺牲品。12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评论员文章。同日，《北京日报》发表《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

12月30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他严肃地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他坚定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

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作出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13日，上海市纪委作出关于开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党籍的决定。23日，中共《人民日报》社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方、王、刘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为党纪所不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1987年1月16日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接受他辞职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年9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

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1987年初，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这次学潮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他说：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他说：学生闹事和更换党的总书记这两件事，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3月8日，他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十年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

邓小平：《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1.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8页。

邓小平：《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1.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1页。

第四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与贯彻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并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三）审议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四）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九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也日益深入人心；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问题、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深化改革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成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围绕这一主题，认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团结全党，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早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经济和文比还不发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这已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结论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我们党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勇气。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又一次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个论断，并以“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观点，虽然不是直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从问题的实质上说明了我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理。到了1988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全面地展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讨论，是在十三大的准备过程中。赵紫阳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全篇立论的基础”。

1987年3月25日，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8月29日，他又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

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以往的认识，中共十二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概念。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下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其间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

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属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些科学论断，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据此，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他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

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大会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大会提出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同时规定了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方针。特别强调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方针。

大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大会指出，六十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大会通过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召开了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

十三大是一次加快改革开放的大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次大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勾划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确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为我国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次大会进一步实现了新老交替，从而使党的领导核心更加充满活力，有利于保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十三大以改革、开放、民主、团结的大会而载入史册。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

1988年3、4月间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开始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五年间，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最突出的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1987年又上涨了18.5%。物价上涨幅度这么大，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的加剧，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结果。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调，农业发展滞后，有限资源过多地投入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在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的紧张程度。一些单位和个人为谋取私利、非法倒买倒卖，层层盘剥，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更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

上述情况的产生，是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很快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分不开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对工作的指导上也有缺点和失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问题。但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

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夏季曾经不适当地决定全面推进价格改革。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然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价格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1988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全会决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首先，明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要压缩500亿元，大体相当于今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第三，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开辟多种渠道，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的现象，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点。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首先要坚决刹住乱涨价风；第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坚决制止高价抢购粮、棉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系；第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全会指出，治理和整顿必须同加强

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治理整顿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一定要抓出成效。务必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明年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

全会指出，要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其中要特别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全会指出，为了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

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还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按照全会确定的基本方针，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里，治理整顿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遏制通货膨胀，使 1989 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 1988 年，1990 年以后的物价上涨幅度要进一步下降；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只有实现这些目标，才能使我国经济的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 1989 年底，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降了下来；农业获得了较好收成；投资规模和消费需求有所控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货币回笼情况良好，整个经济在治理整顿中继续发展。但所取得的成效仅仅是初步的，距离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三、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

1989 年春夏之交，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从学潮到动乱，直至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严重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是从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开始的。当时，青年学生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动乱策划者和组织者以为时机已到，即大肆活动，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使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和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为。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它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 1987 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赵紫阳于会议前一

天赴朝鲜访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必须坚决制止，并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邓小平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断，并作了重要谈话。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严正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从社论发表到5月初以前，经过党和政府的大量工作，形势已趋平稳。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讲话。她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学生游行“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局势骤然逆转。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说：“对学潮的新闻放开一点，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社会秩序愈来愈混乱。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他同党的公开决裂。

20日李鹏签署了国务院令，宣布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但是，动乱的策划者继续造谣惑众，挑拨军民关系，拦阻军车，围困执

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并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6月3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冲击国家要害部门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经极大的耐心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保卫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三部曲”的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充分肯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要求全党按照原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说，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加点劲。邓小平在重要的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发表的讲话，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中全会是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审议并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二）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划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

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6 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关于党的路线和今后的工作，全会指出：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全会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议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对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

早在 1980 年，邓小平就已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此后他多次讲要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动乱平息之后，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这是对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干出实绩，取信于民。要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6 月 16 日，邓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1989 年 6 月 24 日通过），《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543—546 页。

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5.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6—301 页。

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又指出：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是江泽民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新的中央领导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第二，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抓紧惩治腐败。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

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1989年9月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动调动也就比较容易。他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他在同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地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89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

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的这一决定，表明了党中央已完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向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证明。

五、抓紧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聚精会神地抓紧了党的自身建设。

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证明，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好的，但也暴露出我们党内存在严重问题。所以邓小平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为了提醒全党认清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强调指出，分析党内状况时，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赵紫阳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正因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¹以便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以及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为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

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照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格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6.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9—314页。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9.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5页。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6.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4页。

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党的建设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切实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在1989年秋、冬和1990年，在中央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清查、清理。在清查、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后，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动乱和暴乱中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党内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清查、清理工作是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的。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一些组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目的是为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核心。

1989年12月—199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党建理论研究班。江泽民发表了《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充分认识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二）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三）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四）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六）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七）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八）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随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形势的发展，199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全会提出，今后应从七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年11月，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决定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参政议政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指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采取措施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中央大力加强了思想、宣传工作。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七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展了整顿书报刊及音像市场和“扫黄”斗

争。11月国务院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斗争（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丑恶现象）。同时号召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党的自身建设的抓紧，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

六、治理整顿和“七五”计划的完成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关于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情况的限制，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及产生的原因分析不够，因此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很多措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加上因时届年底，当年来不及采取更多的实际措施，已经采取的措施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1988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膨胀。在社会需求膨胀的压力下，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导致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多年未曾有过的18.5%的上涨幅度，这种情况给1989年经济发展带来困难。

面对1989年严峻的经济形势，3月20日，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并坚决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李鹏提出治理整顿要达到的目标是：

（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2）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明显低于1988年；（3）压缩固定资产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展了整顿书报刊及音像市场和“扫黄”斗争。

11月国务院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斗争（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丑恶现象）。同时号召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党的自身建设的抓紧，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

六、治理整顿和“七五”计划的完成

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关于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情况的限制，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及产生的原因分析不够，因此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很多措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加上因时届年底，当年来不及采取更多的实际措施，已经采取的措施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1988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膨胀。在社会需求膨胀的压力下，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导致零售物价

指数出现多年未曾有过的 18.5% 的上涨幅度，这种情况给 1989 年经济发展带来困难。

面对 1989 年严峻的经济形势，3 月 20 日，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并坚决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李鹏提出治理整顿要达到的目标是：

- (1) 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
- (2) 遏制通货膨胀，使 1989 年物价上涨明显低于 1988 年；
- (3) 压缩固定资产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秩序；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治理整顿的首要任务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具体措施为：（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1989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 1988 年压缩 920 亿元，减少 21%；1990、1991 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要维持在甚至低于 1989 年的水平。（二）坚决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坚决压缩社会集团的购买力。1989 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在 1988 年基础上再压缩 20%。（三）紧缩金融和财政，继续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要千方百计稳定金融，切实加强对各银行各种贷款的计划管理，控制住全社会的信贷总规模。（四）逐步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在控制消费需求的同时，要改进和完善工资奖金制度，逐步克服职工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五）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内的公司，逐步消除流通领域内秩序混乱的状况。切实加强对某些高收入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和部分个体工商户收入的监督与调控，推行个人应税收入申报制度。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大力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

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 年底至 1991 年三年的治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严重的不稳定状态，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为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具体说来，三年的治理整顿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效：一是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明显好转。1985 年到 1989 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平均差率为 11.8%。治理整顿以来，由于采取紧缩信贷、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团消费、加强税收等多管齐下的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总需求的过快增长，促进了供求关系的改善。1990 年供需差率缩小为 7.6%，1991 年，基本保持上年水平，已处于基本正常范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的上涨幅度连年回落，1990 年为 2.1%，1991 年为 3.5%，已进入了各方面可承受的范围。随着社会供求关系的改善，国内市场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化。

二是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经济基本恢复正常的增长。1985 至 1988 年，我国国民经济处在日趋过热的状态，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7%，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7.8%。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改变了经济过热的局

面。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1990年增长5.3%，1989—1991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恢复到与现有经济条件相应的正常增长水平。

三是基础产业得到加强，产业结构的“瓶颈”矛盾有所缓解。在治理整顿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了良好的开端。农业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业部门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受到一定限制，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改善。

四是市场商品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由于调整了经济结构，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重视，轻重工业生产增长比例日趋协调，全国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市场转旺，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大好局面。在治理整顿期间，虽然压缩了一些过快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但城乡居民继续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生活水平继续有所提高。据统计，城乡居民储蓄额三年增加了5000亿元。从治理整顿全过程上看，基本上达到既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适度增长的双重目标，从而为新的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是进出口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国家外汇储量增加，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1989年和1990年，我国出口总额登上了525亿美元和621亿美元两个台阶；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顺差，改善了1984年以来连续逆差的状况。到1991年6月底，国家外汇储备已上升到330亿美元。特别是近三年，我国吸收利用外资取得新进展。这期间，全国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8083家，比前10年的总和还多，外商实际投资额达85.4亿美元，为前10年的76.5%。更重要的是，这两年外商投资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投资导向更加合理，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型项目增多。

六是改革开放取得了比较实实在在的进展。在治理整顿中，稳步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农业方面：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服务化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在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工业方面：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到深化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改善外部环境和转变内部机制两个方面，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外，价格改革也迈出了较大步伐。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金融体制和流通领域的改革都有新的进展。与此同时，在养老、待业、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制度和职工住房制度方面，也积极进行了改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推出的力度和时机相适宜，效果是好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治理整顿任务的完成，为新的改革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经验。

综合起来看，三年的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上实现了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实现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出现了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局面，改革开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治理整顿为经济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1990年国民生产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是指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和统一的社会化服务这两个层次的结合。

产总值达到 17400 亿元，5 年增长 39%，平均每年增长 7.8%。工业总产值为 23851 亿元。农业总产值为 7382 亿元。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2502 亿元，比“六五”计划时期增加 7172 亿元。改建和扩建了一批重点骨干工程。能源、交通和运输量均有显著增加，煤产量达到 10.9 亿吨，发电量达到 6150 亿千瓦时，原油达到 1.38 亿吨，钢达到 6850 万吨，铁路货运量达到 14.6 亿吨。特别是治理整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社会供求总量趋于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农业连续两年丰收。粮食达到 8500 亿斤，棉花达到 425 万吨。科技、教育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达 720 元。“七五”计划的完成，提前实现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我国宏伟建设目标的第一步，这就为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七、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开始执行

“七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走进了一个重要阶段。

1991—2000 年，即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能否在 90 年代巩固和发展 80 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 1990 年 12 月召开了十三届七中全会。李鹏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说明》。这是一次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十年的重要会议，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在充分肯定十年成就，科学总结了多年来的经验，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了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基本指导方针，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确定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部署和措施。

根据《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经 1991 年 3 月至 4 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后正式付诸实施。

《纲要》共分为十个部分。一、序言；二、1991—2000 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三、“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四、“八五”期间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任务和政策；五，“八五”期间地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六、“八五”期间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任务和政策；七、“八五”期间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八、“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九、“八五”期间人民生活 and 消费政策；十、“八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纲要》规定了 1991—2000 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提出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一）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 1980 年翻两番。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到 2000 年，以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31100 亿元，平

均每年增长 6%。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6.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6.8%；（二）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富，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三）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二十一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四）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按以上奋斗目标的要求，到 2000 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将取得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将以新的姿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纲要》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方针。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全面贯彻这些方针，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现到本世纪末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纲要》还规定了今后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方面，（一）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的要求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发展建筑工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二）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三）继续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使我国经济增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四）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五）继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争取经过十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七）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纲要》提出的以上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是今后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具体实施中，大致分为前五年（“八五”计划时期）和后五年（“九五”计划时期）两个阶段。“八五”计划时期，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时期发展打好基础。“九五”计划时期，要在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经济素质和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纲要》详尽地规划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八五”时期，必须正确地处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整个“八五”期间，都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实条件的可能，在确保经济与社会稳定前提下，积极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促进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

“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有以下八个方面：（一）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二）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使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相适应；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改善；使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三）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四）采取适当的办法与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五）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六）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把扩大对外开放同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七）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合理的经营机制为中心，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八）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为巩固 80 年代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制定更高、更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指标：按 1990 年价格来计算，1995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23250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5%；农业总产值达 8780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3.5%；工业总产值达到 32700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6.5%；第三产业增加值，1995 比 1990 年增长 53.9%，平均每年增长 9%。五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每年递增 2%，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3.5%。五年内，要通过多种形式安置城镇就业人口 3200 万人，争取在“八五”期间把城镇待业率控制在 3.5% 以内。“八五”计划在制定规划经济高速发展的宏伟蓝图时，坚持“两手抓”方针，强调“八五”期间要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八五”计划规划在 5 年内力争在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的地区普及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占全国人口 30% 以上的地区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力争培养各类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1100 万人。到 1995 年，研究生在校生达 9 万多人，在校普通本专科生达 210 万人，同时继续采取多种途径，多种力量，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开展岗位培训。

1991、1992 年是执行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头两年，由于认真贯彻《纲要》的基本精神，继续坚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针，我国国民经济步入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生产实现适度增长。

1991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195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7%，明显超过计划的 4.5% 的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恢复到与现有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正常增长水平。1991 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经过举国上下的一致抗灾救灾，仍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好收成。全年农业总产值 80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工业生产回升较快，总产值达 282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1992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239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全年农业总增加值 58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全年工业增加值 101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二）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比例稳步增加，结构有所改善。

199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2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三）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内市场逐步恢复，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善。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1991年，全年供需差率基本保持上年水平，已处于基本正常范畴。全年物价基本平稳，1991年零售物价上涨2.9%，1992年上涨5.4%。国内市场疲软消除，出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新局面。据统计，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98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10%。

199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0894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9.8%。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储蓄持续增加。

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收入157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71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1991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9110亿元，比上年增加29.5%。

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82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4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9%。1992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15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6.8%。

八、对外经济合作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重大步伐，已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尤其是1989年以来，由于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有关涉外法规、改进各项服务，使得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表现在利用外资保持稳步增长、结构日趋合理。

1989、1990两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但利用外资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89年我国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14.9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100.6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减少28.3%和1.6%，新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779个。

1990年，中国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20.9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02.9亿美元，新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273个，比上年增长17.79%。1991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6%，实际使用金额113亿美元，增长9.6%，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实际使用金额188亿美元，增长62.7%。在利用外贸稳步增长同时，利用外资结构日趋合理。

在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上述可喜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进出口贸易活跃，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据统计，198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6%；199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199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3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199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6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3%。进出口商品结构日趋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品比例

下降，工业制成品比例上升。进口商品结构中，生产资料进口比重进一步加强，生活资料进口比重不断下降。（二）技术出口迅速发展、技术进口有所回升。1989、1990 两年，技术进口受到限制。1989 年，全国共批准技术引进项目合同 328 个，合同总金额 29.3 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减少 25% 和 17.6%。1990 年，全国共批准技术进口合同 232 项，合同总金额 12.7 亿美元，又比上年分别减少 29.3% 和 56.4%，这是“七五”期间合同金额最少的一年。到 1991 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制裁”基本上被打破，对华技术输出相应放松，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对国外技术需求日益见旺，因此到 1991 年，技术引进有所回升，全年技术引进成交 359 项，合同金额 34.6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54.8% 和 172.4%。与技术进口萧条状况相反，1989—1991 年，我国技术出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1989 年，中国签订技术出口项目合同 168 个，成交额达 8.8 亿美元，比去年增加 26% 和 405%。1990 年技术出口有了新的发展，全国共签订技术出口项目合同有 266 个，合同金额 9.88 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45.1% 和 12.4%。1991 年，技术出口项目合同共 462 项，合同金额 12.8 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72.3% 和 29.1%。技术出口结构日渐合理，以技术带动成套设备出口已成为中国技术出口的主要方式，并具有适应国际技术贸易市场不同层次的要求的能力。

（三）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取得了新成绩。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发展起来的一项崭新事业。中国对外承包劳务工程和海外企业遍及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公司开始起步，这进一步带动金融、保险、民航、远洋运输和邮电通讯等相关部门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国外经济技术合作，还学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对我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起到有益的作用。（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参与联合国多边合作等有了新的进展。在当今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中国政府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则合理安排援外支出，援外布局继续得到调整，在做好对周边友好国家及其他国家援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 年，我国同 44 个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签订了承担 73 个新项目的协议，全年，我国帮助 70 个友好国家实施了 280 个成套项目和技术项目。1990 年，我国向 73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新的技术援助，签订援款较去年增加 67.6%，全年共实施经济援助项目 258 个。

1991 年，我国新承担技术和管理合作项目 52 个。上述援助项目的建成，对受援国经济、文化、体育事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和好评。

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比较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变了“只援助、不受援”的作法，在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多边合作中，贯彻“有给有取”的方针，在向这些机构认捐的同时，也接受这些机构的援助，1989 年这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此外，我国还加强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贸易和发展会议和亚太经社理事会等组织合作。

1991 年，我国参与了国际贸易多边体系的活动取得进展，恢复了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谈判，与联合国发展一系列的多边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上述对外经济合作和利用外资的一系列经济成就的取得，标志着我国目

前已形成商品、技术、资金、劳动等对外交流全面发展、密切配合、双边与多边合作相互促进的富有生机的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格局，这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力补充，多种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8年，个体经济发展到新高峰。个体工商业活动发展迅速，规模愈来愈大，出现了一些雇工人数超过个体工商业户雇工七人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把私营企业从个体户中分离出来，确认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这样私营企业正式登上了中国经济舞台，开始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8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4万户，个体工商业户约有1000多万户，2300万人。

1989年，私营企业发展至9万户。

199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登记注册的有98万户，从业人员170.2万人，拥有注册资金95.2亿元；个体工商业户共1328.3万户，从业人员2092.8万人，拥有资金397.4亿元。1991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10.78万户，从业人员为183.9万人，注册资金123.6亿元。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2年，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又迈向另一高峰。到1992年底，全国已有私营企业13.9万户，年创产值307亿元，从业人数超过230万人；全国个体工商业户达1533.9万户，从业人员达2467.7万人。

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由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它为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个体、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为国家开辟了新税源。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我国个体经济共创工业产值4300亿元，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实力。此外，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以其灵活、适应性强、分布广及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市场观念向国营、集体企业发出挑战，促进国营、集体企业机制的转变，进一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与乡镇集体企业一道，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改变了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有力地推动了传统的自然分工向专业化社会分工的发展。此外，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极大启发了农民的商品意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促进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三）有利于拓宽就业门路，促进社会稳定。

1980—1991年的12年间，全国个体和私营企业累计吸收城镇待业人员760万人，占同期城镇新就业人数的8.3%。其中，1991年，个体、私营企业吸收了60万人，占7.8%，如果没有这十余年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待业率将在1991年的2.3%的基础上上升5个百分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合理安排了在企业转换机制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

1993年6月19日《中国工商报》：《建国以来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1993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我国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和1993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力，大大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四）有利于促进城乡市场繁荣，方便人民生活。个体工商业活动从其发展范围和产业分布来看其主要在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交通运输业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而国营和集体单位又难以顾及的第三产业，其经营服务网点占社会总数的 80% 以上。这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部分缓解了城乡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生活中的“诸”难，提高了生活质量。

九、外交工作的新格局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多变，“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世界各种力量正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中重新分化组合，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等，国际形势出现了空前的动荡与不定。“乱云飞渡仍从容”。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不定，中国政府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冷静务实策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开创了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新格局。

邓小平曾经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推行睦邻政策，大大改善和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使我国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1989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邓小平举行会晤，宣布两国从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次会晤标志着破裂了二十多年的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 年国务院总理李鹏、1991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分别访苏，使中苏两国的睦邻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后，我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的原则，同独联体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保持在各个领域里的友好往来。1992 年，中国同俄罗斯关系发展平稳，经济贸易关系出现了上升势头。叶利钦总统访华使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近几年来，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

中朝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使中朝传统友谊得到巩固和加强。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金日成主席、延亨默总理等朝鲜领导人也多次访华。这进一步密切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1992 年 8 月 24 日，我国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53 页。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9.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1 页。

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1990.7.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0 页。

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中国同日本关系的发展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总的说来是朝着恢复正常的方向发展。1990年下半年，日本率先恢复了对华的第三批贷款，在松动西方对华“制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万里委员长先后访日，日本明治天皇于10月首次访华，这使中日关系更加巩固。

中越两国以1991年11月的高级会晤为标志，结束了双方长达13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92年底，李鹏总理对越南的访问，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1990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老挝，实现中老关系正常化，1992年，老挝主席凯山·丰威汉对中国进行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在中断关系23年后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建交公报。

1991年，中国与文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同所有东盟六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标志与东盟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巩固和发展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这是31年来中国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问印度。

1992年印度总统卡特拉曼访华，开辟和发展了中印关系的新时期。

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又一主要成就是：“六四风波”后，我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的方针，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同西方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改善和发展。

1989年6月，中国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顾事实，不顾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横加指责，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难和曲折。邓小平在当时即指出：“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还强调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无可争辩地证实，中国没有被压服，也没有被孤立，反而使中国又经受一次锻炼，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对外关系有了更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后来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补本）》，第3页。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11.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346页。

邓小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1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1990.7.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

1990年，中国与西方七国的关系开始出现积极变化。继日本率先恢复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之后，西欧国家逐步恢复了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

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正常关系。

中美关系也逐步“解冻”。1990年5月，布什总统宣布决定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11月底12月初，钱其琛外长应邀访美，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及参众两院议员，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991年11月，贝克国务卿访华，经过坦率的会谈，双方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问题达成协议。但正值中美关系恢复之际，美国政府再次违反“八·一七”联合公报，于1992年9月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事件。这给正复苏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已证明：中美之间发表的三十联合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准则，只要双方高瞻远瞩，求同存异，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相互间关系，中美关系就能发展、就能前进。

1993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日下午在西雅图市的雷尼尔俱乐部江泽民和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江泽民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领导人会晤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这次会晤以后，双方领导人的交流和接触会增加，而且会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进行后继讨论。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团结，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随着世界多极化形势的发展，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1990年5月，杨尚昆主席访问了拉美的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五国。

1992年7月，杨尚昆主席又访问了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科特迪瓦三国，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杨尚昆主席在墨西哥提出了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四条原则。在科特迪瓦发表了中国发展同非洲关系的六条原则。这些原则表明了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良

三个联合公报指：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1978年12月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联合公报》。

即指：第一，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包括那些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第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不断拓展贸易往来与经济合作。第三，尊重彼此的传统和价值观，相互学习和借鉴，加强民间的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第四，在国际事务中，密切磋商，互相支持，加强合作，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共同努力。

即指：一、中国支持非洲各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发展经济所作的各种努力。二、中国尊重非洲各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三、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联合自强，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四、中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为谋求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和

好愿望，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同中东国家关系发展顺利。1990年，我国同沙特阿拉伯建交。

1992年1月24日中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中东所有国家都建了外交关系，这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近几年来，我国与南太平洋诸岛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我国与南太平洋论坛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斐济总理、瓦努阿图总理、基里巴斯总统、密克罗西亚总统先后访华。

1990年，我国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92年初，李鹏总理访问斐济，7月，我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密克罗西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等五国，进一步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1992年9月，中国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标志同不结盟运动的友好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不久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同“七十六国集团”通过密切磋商，以“七十七国加中国”方式提出不少谈判文件，促使会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国际事务和多边外交中，中国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发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合作，谋求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为推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对海湾危机的立场是有原则的、一贯的和严肃认真的。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一天开始，中国政府就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这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撤出，同时主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对中东症结的巴勒斯坦问题，中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以色列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必须得到恢复，巴、以相互承认，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和平共处，在巴尔干半岛和原苏联一些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场合多次声明原则立场，强调冲突各方面通过和谈解决争端，不能从外部使用武力，用一场战争来制止另一场战争。

近几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空前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1992年，第48届联合国亚大经济社会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北京宣言》。这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为亚大地区开创美好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6月，李鹏总理出席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原则出发，明确提出了关于加强环境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五点主张。李鹏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环发事业的高度重视与责任感。关于裁军与军控问题，我国提出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裁军原则，得到广泛赞赏。

1992年3月，我国正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这对推动该条约发挥有

发展以及实现经济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五、中国支持非洲国家作为社会平等的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六、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

即：一、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二、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但是经济发达国家负有更大的责任。三、加强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四、保护环境和发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五、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

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根据一切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根据一切国家都应有平等发展权利的原则，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一主张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特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

总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外交战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到 1992 年，我国已同 154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充分说明，中国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异同作为决定国际关系亲疏的标准，而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五节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一、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大胆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我们均很有利。从国际上看，近几年世界形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刻、最巨大的变化。旧的格局已经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矛盾错综复杂。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依然很不安宁，而亚太地区相对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增长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和机遇、困难和希望并存，机遇和希望大于挑战和困难，我国在国际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从国内来看，经过三年治理整顿，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这一切，都为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此，邓小平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从大的方面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这次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说来，谈话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他深刻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原理。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他从理论上说清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是同从建国起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个战略大目标紧密关联的。他说，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第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更加说明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尽快把我国经济发展上去，这是使社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大胆地改革，这就要求在思想上更加解放，再不能为某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僵化认识所束缚。如果我们再用僵化的态度来认识问题，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不但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会葬送社会主义。

邓小平特别重视实践，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针对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和思想束缚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担心“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

针对长期困惑我们的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过搞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话。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他讲得更加明确。

1985年10月23日，他在回答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提问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三大之前的1987年2月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把问题点破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这使我们在认识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计划与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全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十三大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促使邓小平对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从1990年开始，邓小平又重提计划与市场问题。1990年12月2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1991年1、2月间，他在视察上海时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他又讲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它已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他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10.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

邓小平：《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12.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1.28—2.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指出：“现在，有盲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结论很重要很精辟，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贯的指导思想。

第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如不抓住时机，赶快把经济搞上去，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不但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邓小平告诫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第四，要坚持两手抓。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还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他还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事业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的根本保证。

第六，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这篇谈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发表的，它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

以上引文均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1.18—2.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383页。

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党的十四大报告系统地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依据。

继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后不久，同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会议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改革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概括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在北京开幕。大会代表2000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江泽民受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二）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江泽民在报告中对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作了系统的深刻的总结。他指出：“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十四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江泽民强调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到达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他提出，只要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江泽民在报告中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阐述，并在党中央几次概括的基础上，从九个方面做了新的概括。

（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

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

（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同这条路线相适应，我们党还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备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这条路线和这些方针政策也都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江泽民在报告中还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

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江泽民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要把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结合起来。”

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即：第一，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速环境保护；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江泽民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

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

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选举出 189 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0 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08 人。中央新的领导机构实现了新老交替。

10 月 19 日，党的第十口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江泽民主持。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乔石，刘华清，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陈希同、胡锦涛、姜春云、钱琪琛、尉健行、谢非、谭绍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王汉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全会决定江泽民力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全会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是我们党历史上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选举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的十四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邓小平 1992 年初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军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93 年 3 月，经过充分的准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汇成本届大会的主旋律。大会听取了国务院总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作的《关于去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今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部刘仲藜作的《关于去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今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国务院秘书长罗于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分七部分。

（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五年。他指出五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国民经济持续发展。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接近 24000 亿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长 7.9%。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乡镇企业保持旺盛发展势头，五年间产值增长 2 倍，现已吸纳农村劳动力 1 亿多人，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工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5%。

1992 年同 1987 年相比，钢产量增长 42%，达到 8000 万吨；原煤产量增长 20%，达到 11 亿吨；发电装机增长 46%，达到 16500 万千瓦；原油产量继续增长，达到 1.42 亿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有新的发展。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长 23%，达到 11620 亿吨公里；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36%，达到 3617 亿吨公里；五年间，进出口总额增长 1 倍，1992 年达到 1656 亿美元。五年共利用外资 609 亿美元，相当于前九年总和的 1.6 倍；基本建设的技术改造取得新成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6000 亿元，一批大型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相继建成，为今后经济发展增添了后续力量。城市建设有新的进展，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成绩取得新的进步。科学技术事业成绩显著，重大科技成果比上五年大幅度增加，某些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正负电子对撞机投入使用，“银河— ”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我国航天工业进入国际发射市场。创办一批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步伐加快。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五年来国家财政和社会各方面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达 3200 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 1710 亿元。全国已有 76% 的县普及了小学教育，多数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高等教育有新的发展。教育结构有重大调整，教

育改革逐步深入，教育质量有所提高。计划生育成绩明显，体育事业有新的发展。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社会科学、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新的成绩。第三，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继续稳定和完善。在城市，为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采取了新的改革措施。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有所改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扩大，金融、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各类市场开始形成。价格改革迈出较大步伐，目前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比重，已经由五年前的 50%左右扩大到 80%左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第四，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1992 年同 1987 年相比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 910 元 达到 1826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321 元，达到 784 元。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城镇居民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市场繁荣活跃，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现在，我国蛋类、肉类、食用植物油的人均消费量已相当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城镇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 70 岁左右，这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综合反映。李鹏说，五年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在全面总结五年成就的同时，李鹏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他指出，今后五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性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他又指出，现在，国内发展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按调整后的“八五”计划，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 6% 提高到 8%—9%。就全国来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五年内，就能够实现原定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此，他强调在经济建设中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

（三）加快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李鹏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今后五年是关键时期。”

（四）认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六）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七）关于我国的外交工作。李鹏回顾了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就，重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他强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李鹏最后在报告中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开拓前进，为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大会代表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及相应的决议。“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宪法。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大会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乔石为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副总理，刘华清、张震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也在北京召开。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把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作为未来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它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邓选》第三卷，同1975—1982年卷一起，集中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邓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对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于11月2日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学习报告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学好《邓选》第三卷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统揽全党，把更大的精力集中到加快改革上来。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五十条，分十个部分。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决定》指出：党的十

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公司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

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决定》指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改革现有商品流通体系，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立适应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

赠与税。要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社会保障的不同类型确定其资金来源和保障方式”，“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必须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到本世纪末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广大农民的生活由温饱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股份合作制，进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活力”。

七、深化对外经营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决定》指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实行全方位开放。”“进一步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八、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决定》指出：“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攀登科技高峰，以实现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积极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九、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奋斗。当前，党的建设要着重抓好五项工作：

- (1) 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 (2)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 (3) 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团结，严肃党的纪律，增强全局观念，使全党在行动上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

(4) 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5) 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改变一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决定》指出：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决定》最后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必然改变旧体制固有的和体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必须从总体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十四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同心同德，锐意改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科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回答了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基本的框架，描绘了宏伟的蓝图。它必将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